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伟	朱之鑫	朱民
李扬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祥	张卓元	陈元	林兆木	林毅夫	杨伟民
周文重	赵进军	高尚全	海闻	钱颖一	郭树清	黄奇帆
辜胜阻	韩永文	聂振邦	楼继伟	蔡昉	樊纲	薛澜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战	王昌林	王晓红	马晓河	吕政	谷源洋
朱晓明	陈文玲	陈宗胜	李平	李晓西	李向阳	迟福林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高培勇
贾康	隆国强	常修泽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编辑部副主任 李蕊

• 本刊专论 •

中美应反对脱钩 加强合作 共同推进经贸磋商	曾培炎 (005)
数字化、区块链重塑全球金融生态	黄奇帆 (009)
“一带一路” 将为人类带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陈文玲 (016)

• 国际经济 •

欧洲经济形势分析及政策建议	东 艳 黄 蒙 (041)
借鉴国际组织运营模式 推进“一带一路” 城市合作	邱爱军 王 瑾 (055)
中国软件出口现状及趋势展望	杜振华 米师悦 (066)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亚太中小企业合作政策的完善 ——基于欧盟的比较分析	刘均胜 (077)

• 宏观经济 •

新时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创新探索 ——以上海市为例	李金波 李 丹 (089)
--------------------------------	---------------

• 名人观察 •

关于中美贸易与投资的几点看法	张晓强 (100)
牢记使命, 发扬莫干山精神	高尚全 (102)

关于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一些认识 范恒山（105）

• 智库言论 •

遏制金融脱实向虚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贾康与埃里克·马斯金教授的对话 （111）

当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建议 （118）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1）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6）



CONTENT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Oppose Decoupling,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nd Jointly Advance Economic and Trade Negotiations *Zeng Peiyan* (005)

Digitalization and Blockchain Reshape the Global Financial Ecosystem *Huang Qifan* (009)

“The Belt and Road” Will Bring a Better Tomorrow for Mankind *Chen Wenling* (016)

European Economic Situation Analysi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Dong Yan , Huang Meng* (041)

Drawing on the Operating Model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the Belt and Road” Urban Cooperation *Qiu Aijun , Wang Jin* (055)

China’ s Software Export Status and Trend Outlook *Du Zhenhua , Mi Shiyue* (066)

Improving Asia-Pacific SMEs’ Polici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Value Chains
——A Comparison with EU *Liu Junsheng* (077)

Innovative Exploration of Strengthening and Enhancing State Capital in the New Era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Li Jinbo , Li Dan* (089)

A Number of Views on China-US Trade and Investment *Zhang Xiaoqiang* (100)

Keep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and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Mount Mogan
Gao Shangquan (102)

Some Opinions for Building a Cross-Straits Common Market *Fan Hengshan* (105)

Containing the Trend of Finance from Real Economy to Virtual Economy and
Prevent Mitigate Financial Risks
——The Dialogue between Jia Kang and professor Eric Muskin (111)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Policy (118)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21)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6)

中美应反对脱钩 加强合作 共同推进经贸磋商

曾培炎

摘要：当前，虽然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骤增，美国甚至有人主张与中国“脱钩”，但经济全球化仍是不可阻挡的发展大势。“脱钩”实质上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极端表现，若任其发展，不论是对中美两国还是对全球，都将是一场灾难。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脱钩”损人不利己。从贸易层面看，“脱钩”将人为造成全球价值链断裂。从科技进步层面看，“脱钩”不符合数字经济时代的趋势特征。从经济治理层面看，“脱钩”有损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反对“脱钩”、加强合作，不仅是符合中美利益的唯一选择，也是整个世界的共同期盼。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中美“脱钩” 中美合作 经贸磋商

作者简介：曾培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纵观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仍是不可阻挡的发展大势，但也出现了回头潮。美国“退群”、英国脱欧、日韩经贸纷争，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和风险骤增，不排除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其中，中美经贸摩擦备受关注，美国在贸易、科技、人文交流等领域对中国发难，不乏有人甚至主张与中国“脱钩”。

所谓的“脱钩”是个臆想的说法，包含了加征关税、贸易投资脱钩，继而延伸到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和科技的脱钩。这违背了经济规律、国际规则和公平秩序，实质上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极端表现，令人十分担忧。如果任其发展，不论是对中美两国还是对全球，都将是一场灾难。

一、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脱钩”损人不利己

中美建交 40 年来，两国相互开放市场，协作互补日益密切，以贸易为载体的价值交换、经济关联的程度不断加强。在这期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约 9% 的增长，美国经济总量扩大了近 3 倍，中美经贸合作也形成了巨大的外溢效应，带动了全球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造就了跨地域的商品交易大市场、要素跨境的大流通、产业互补的大协作、利益融汇的大交集。

2018 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经贸摩擦，已对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产生了影响。中国前三季度经济增速为 6.2%，受外需相对收缩、进出口增幅收窄、企业投资趋于谨慎等因素影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美国经济也出现衰退迹象，2019 年二季度经济增速下降至 2%，长短期国债收益率倒挂，9 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下降至 47.8，为多年来的最低点。从全球看，贸易增长几近停滞，金融风险增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 2019 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3%，这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显而易见，“脱钩”也会极大损害企业和消费者利益。现在全球中间品贸易已占到贸易总额的 2/3，中美乃至全球的商品进出口贸易是按市场规则优化资源配置的，人为“脱钩”必然会增加企业产品的成本，给生产者带来损失。而关税增加、中间品价格上升、产业体系重建带来的产品销售三重成本增加，将使消费者蒙受损失。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估算，对全部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将会使美国每个家庭年支出增加约 2000 美元。此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美国国内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不是全球化造成的，“脱钩”不是治其病的药方。

二、从贸易层面看，“脱钩”将人为造成全球价值链断裂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贸易与投资相互交织，生产要素大规模跨境流动，形成了环环相扣、不可分割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供应链是商品和服务的流动，是一维的链式关系；产业链是多种供应链的复杂组合，是二维的矩阵关系；价值链是产业链各环节价值的运动、分布和延伸，是多维的立体关系。“三链”相互依存、紧密融合，共同形成了全球经济复杂交织的联系。

中美在全球“三链”中均占据重要位置，一方如果强行脱离这一体系，既伤害他人，也伤及自己。比如，美国威胁要对中国企业华为“断供”芯片，表面看是打击华为，实际上也严重损害了芯片供应商高通、博通、英特尔等美国企业。

推动中美“脱钩”，企图构建各自独立、互不兼容的产业体系的想法，忽视了“三

链”连接的复杂性，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中国制造”的背后是极具数量和深度的人力资本与要素组合，是庞大复杂的产业配套能力和体系化生产能力，是几十年来逐步积累形成的。目前很难找到其他国家有这么完整的体系，来弥补“脱钩”形成的缺口。即便找到了，也要付出高昂的企业迁移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人员培训成本、产业链再造成本等。重建“三链”体系过程漫长，中短期几乎难以实现。更何况，这种替代根本改变不了美国贸易的逆差状况，2019年上半年美国贸易逆差不减反增，同比扩大8%，就是明证。

从长期看，另建一套割裂现有国际合作的产业体系和标准规则，既不符合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规律，也必然大幅降低经济效率。美国企业和民众真的愿意承担这种高成本、低效率的后果吗？据美国荣鼎咨询公司统计，2019年上半年美企在华投资达到68亿美元，较过去两年同期均值还高出1.5%，美企已经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三、从科技进步层面看， “脱钩”不符合数字经济时代的趋势特征

以新一代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正蓬勃发展，信息传输速度超出人们想象，本质上要求互联互通与共享。数据已成为系统内和系统间连接的血液，成为“新的石油”。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全球合作的契合点。

数字经济时代的科技发展与创新是系统迭代和集成的过程，难以独立完成。即便技术端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应用场景的独立也无法真正实现。所以，新科技的开发与创新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强调合作与共享。近十年来，在全球顶级出版物发表的论文中，国际合作撰写的比重明显增加。

中美在数字经济领域具有互补和合作的基础。美国科技创新能力全球领先，基础科学研究能力强大，拥有大量高端科研人才；而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广阔，所拥有的数据量之大、数据种类之多、数据结构之复杂，使中国成为当今科技创新最重要的孵化和应用场所。中国具有竞争力的数据设备制造能力也能相助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两国加强科技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四、从经济治理层面看，“脱钩”有损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

全球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离不开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二战以来，世界总体维持了安宁、进步、繁荣。联合国、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作为全球公共产

品的组织者，推动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改善公共健康、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减贫脱贫、维和反恐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美紧密合作，健全二十国集团（G20）机制，推动全球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避免了世界经济出现深度衰退；2015 年达成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对《巴黎协定》的签署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中美加强合作严控芬太尼类物质为国际禁毒事业做出贡献。

当前，人类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和挑战，如果没有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每个国家各行其是，结果是不可想象的。中美需要携手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而不是退出或有损原有体系。这方面，中国正在尽自己力量发挥作用，比如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我们期待美国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脱钩”以自重。

18 世纪，英国对北美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直接刺激和推动了美国独立，英国不但失去了北美大市场，还培养了一个日后最强的经济大国。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出台《斯穆特－霍利法案》，对他国进口加征高关税，引发全球贸易战，不但加剧了全球经济萧条，美国也未能独善其身。

明镜可以察形，鉴古可以知今。“脱钩”还是“合作”，关键在于决策当局能否做出正确的战略判断。双方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大势，从理性客观的角度看待两国关系。中国无意挑战美国，也不想取代美国。美国也不能左右中国，更无法阻止中国的发展。两国有各自的发展目标，但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完全可以相互借力、相互成就。

刚结束的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中，双方在多个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前，从历史高度、全球视角和更长周期来看，中美可以合作、应该合作的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双方应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妥善解决经贸摩擦问题，尽早达成全面经贸协议。同时，积极开拓农业、能源资源、医疗健康、基础设施等新的合作领域，适时恢复此前建立的各政府间对话机制，加强企业、智库、大学、地方间全方位的交流。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指出，“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脱钩”、加强合作，不仅是符合中美利益的唯一选择，也是整个世界的共同期盼。

责任编辑：李蕊

数字化、区块链重塑全球金融生态

黄奇帆

摘要：当今时代是一个数字化时代，技术革新和数字化经济的全面兴起，让科技由最初的工具角色转变成驱动金融变革的中坚力量。数字化的五全基因与金融业不断碰撞融合，不仅改变了个人间、企业间、国家间的清结算方式及主权货币发行机制，还大幅提升了产业链运营效率，带来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展望未来，量化投资和智能投顾、人工智能定价和理赔核算、金融云服务、区块链存证等新金融业态正不断进化，将引领金融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关键词：数字化 区块链 科技金融 贸易清结算 货币发行

作者简介：黄奇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市政府原市长。

一、数字化的构成与颠覆性作用

数字化主要包含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技术。而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将数字化平台用人来类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没有网络，五脏六腑与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无法挂架；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神经系统、脊梁、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基础的数字化平台就已经成型了。而区块链技术，可以从脱氧核糖核酸（DNA）层面提升人的大脑反应速度、骨骼健

壮程度、四肢操控灵活性。数字化平台在区块链技术的改造之下，基础功能和应用将得到大幅度扩展。

数字化之所以能够颠覆传统，就在于它所拥有的五全基因：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上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的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每一个点，每天 24 小时不停地信息积累。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人工智能（AI）的收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而所谓“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

数字化具有的五全基因与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产生颠覆性的冲击。与工业制造相结合，就形成工业制造 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在与金融相结合的过程中，数字化拥有的海量信息、计算能力、共识机制，可以大幅度的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安全性，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坏账率和风险。

二、区块链技术的功能意义

（一）区块链技术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10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第 18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党中央对区块链技术及其集成应用的前瞻性部署，彰显了区块链技术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如果说云计算、人工智能带来了生产力的提升，大数据让生产资料分发更高效，那么区块链将可能是对生产关系的变革。从更大视野来看，人类能够发展出现代文明，是因为实现了大规模人群之间的有效合作。在此基础上，区块链技术也可能通过新的信任机制大幅拓展人类协作的广度和深度。

（二）区块链技术的基本原理

区块链技术主要运用了密码学原理、共识机制、数据存储原理。实现四大功能：一是分布存储。传统的信息存储尤其是金融信息存储是中心化的，比如账本存在银行服务

器上，资金的转移只要在服务器上做记录就可以。为了安全，银行可以设立多个灾备服务器进行分布式存储，但总体上仍能被改变，不够安全。区块链基于去中心化思路，账本记在每一个人的账本上，在电脑或是手机里建立一个钱包，每一笔资金转移，都要在参与这个服务的每一个人的钱包上记录一笔，安全性有了极大的提高。二是点对点传输。以前信息传输是终端对服务器，服务器是中心，终端是多点，终端间不相互传递信息，信息是终端向服务器多点对一点。在区块链技术中，信息传输是点对点，相互之间进行信息传输，它们都不是中心，而都是平等的节点。三是共识机制。通过算法实现共识，比如工作量是用挖矿的模式来进行衡量。四是文件加密。原来计算机处理的信息都是明文，而通过加密算法，使之成为加密文件，保护数据不被非法窃取、阅读。

（三）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从应用视角来看，基于区块链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多个主体之间的协作信任与一致行动，理论上说，可以应用到支付清算、票据、保险等金融领域以及供应链管理、工业互联网、产品溯源、能源、版权等实体经济领域。例如，利用区块链不可篡改的特点，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存证”难题提供解决方案，为实现社会征信提供全新思路；利用区块链分布式的特点，可以打通监管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实现信息和数据共享。但是，区块链技术毕竟尚处于早期萌发阶段，其理论基础、应用场景、技术安全、标准监管等还需大量完善，还不能大规模广泛使用。区块链核心原理之一是去中心化、安全，但这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不可能实现。比如，有一项服务有 1000 万人在使用，理论上区块链应该建立 1000 万个节点，如果 A 给 B 转了 100 元钱，以前服务器只改变一个或几个服务器信息，现在需要 1000 万次的信息修改和存储，存储空间、存储时间、能源消费提升了 1000 万倍，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和时间。地球资源是短缺的，时间是不可逆的，因此这个缺陷在短期内看是灾难性的。目前，比特币的钱包已经需要占用几百 G 的存储空间，一般的手机都无法使用，普通台式机的硬盘也不行。进行一次比特币转账，根本无法实时到账，必须长时间对大量节点进行存储才能完成。因此，无论是改变世界的能力，还是区块链本身的能力，作为存储方式和信息传递模式的一种，区块链在短期内与互联网的发明、存储材料硅的发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明相比都还有较大的距离，都不足以同这些划时代意义的技术相抗衡。

在短期内，区块链技术只适合少数对安全性要求极高、对时效没有任何要求的行业来进行低频度使用。比如，文物的数字身份证，将所有收藏品建立一个区块链的系统。尤其要注意的是，区块链不能和虚拟货币划等号，虽然区块链技术和虚拟货币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从目前的技术机制来看，采用区块链技术不可能实现实时转账，将耗费大量存储资源。数字货币为了实现高效率和低成本，其核心技术不会只是区块链技术。数字货币一定会作为国家主权货币，由国家背书才会有信用，才能得到广泛承认。它也应该是多种技术整合形成，做到既安全、稳定，又可以规范化管理，同时还可以实现实时到账，方便支付。

国家认真研究区块链技术，并不会推动全民炒币，更不会鼓励发行“空气币”搞诈骗，而是通过把区块链技术研究透，用于社会管理和能力提升。一旦作为国家主权货币的数字货币出台，这些破坏数字货币的信用和声誉的虚拟货币一定会被清理殆尽。因此，国家重视区块链技术，重视数字货币，恰恰不是币圈的大好机会，而是币圈的末日就要到来了。

三、数字化、区块链与金融结合可能带来的变革

区块链虽然有其短期内不能回避的劣势，但展示的前景是美好的，在某些行业和领域，可以逐步探索实践，可以作为技术组件参与到变革之中。比如，结合数字化拥有的五全基因，区块链技术与数字化金融碰撞以后，将可能重塑全球的金融生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颠覆全球个人支付方式

在数字化浪潮来临之前，我国个人支付主要通过纸币、储蓄卡、信用卡来完成。2002 年，在合并了全国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和 18 家城市（区域）银行卡网络服务分中心的基础上，我国组建了银联公司。银联创立之后，自主建成银行卡跨行交易清算系统，推广了统一的人民币银行卡标准，在传统支付领域发展迅速，促进了经济社会不断进步。但在创新支付领域如互联网支付、手机支付、二维码支付等方面进展缓慢。

随着我国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应用普及，基于手机的支付方式走进了生活的每个角落，新的支付方式已经占据主流地位。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移动支付方式已经覆盖 14 亿人。从线上到线下，从家庭日常水电气话费支付到交通、旅游、酒店、餐饮，移动支付凭借其高效便捷的支付体验，打破了传统支付方式在空间、时间上的局限性。2018 年中国移动支付规模约 39 万亿美元，而美国则是 1800 亿美元，差距达到数百倍。

随着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逐步渗透，个人跨境转账的底层技术实现方式也开始被改写。过去，个人跨境转账需要跨越支付机构、银行和国际间结算网络，整个过程由于串行处理而效率低下。而现在，区块链技术可以作为支付机构与商业银行之间的接口

技术。跨境汇款中的多方通过区块链技术将汇款报文传递给各参与方，从而实现多方协同信息处理，将原本机构间的串行处理并行化，提高信息传递及处理效率。目前已有部分企业运用区块链技术开展个人跨境支付服务，实现了任意两种货币间的无缝兑换，并且安全透明、全程可追溯。

（二）重塑贸易清结算体系

在数字化时代，不仅需要改变个人支付方式，企业间、国家间的支付结算方式也需要进行重塑。企业在开展国际贸易外汇结算时，会面临是两国货币直接支付结算，还是以美元为中间价结算的问题。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线之前，人民币跨境清算高度依赖美国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SWIFT 成立于 1973 年，为金融机构提供安全报文交换服务与接口软件，覆盖 200 余个国家，拥有 7500 家直接与间接会员。目前 SWIFT 系统每日结算额达到 5 万亿至 6 万亿美元，全年结算额约 2000 万亿美元。CHIPS 是全球最大的私营支付清算系统之一，于 1970 年建立，由纽约清算所协会经营，主要进行跨国美元交易的清算，处理全球 90% 以上的国际美元交易。SWIFT 和 CHIPS 汇集了全球大部分银行，以其高效、可靠、低廉和完善的服务，在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加速全球范围内的货币流通和国际金融结算、促进国际金融业务的现代化和规范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高度依赖 SWIFT 和 CHIPS 系统存在一定风险。首先，SWIFT 和 CHIPS 正逐渐沦为美国行使全球霸权、进行长臂管辖的金融工具。从历史上看，美国借助 SWIFT 和 CHIPS 系统发动了数次金融战争。2006 年，美国财政部通过对 SWIFT 和 CHIPS 的数据库进行分析，发现欧洲商业银行与伊朗存在资金往来，美国随即以资助恐怖主义为借口，要求欧洲 100 多家银行冻结伊朗客户的资金，并威胁将为伊朗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列入黑名单。随后全球绝大部分银行断绝了和伊朗金融机构的所有业务往来，伊朗的对外金融渠道几乎被彻底切断。2014 年乌克兰危机中，美国除了联合沙特将石油价格腰斩外，更威胁将俄罗斯排除在 SWIFT 系统之外，随后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经济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其次，SWIFT 是过时的、效率低下的、成本极高的支付系统。SWIFT 成立 46 年以来，技术更新缓慢，效率已经极为低下，国际电汇通常需要 3~5 个工作日才能到账，大额汇款通常需要纸质单据，难以有效处理大规模交易。同时 SWIFT 通常按结算量的万分之一收取费用，凭借垄断平台获得了巨额利润。

所以，在当前数字化浪潮的大趋势下，依托技术更新缓慢、安全性难以保证的 SWIFT 和 CHIPS 系统是没有前途的。在大数据平台、区块链技术的驱动之下，构建形成

一个新的清结算网络已经成为当前许多国家的共识。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信息不可篡改、集体维护、可靠数据库、公开透明五大特征，在清结算方面有着透明、安全、可信的天然优势。目前全球已有 24 个国家政府投入并建设分布式记账系统，超过 90 个跨国企业加入到不同的区块链联盟中。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正在研究建设类似 SWIFT 的国际加密货币支付网络来取代 SWIFT，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和区块链平台正在通过区块链试水跨境支付，用实际行动绕开 SWIFT 和 CHIPS 全球支付体系。

未来，建立全球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支付清算系统势在必行。一方面可以摆脱单一中心化的金融霸权行为，促进各国的金融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国际间资金结算的效率，提升世界普惠金融水平。

（三）改革全球货币发行机制

货币是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关系、交换关系所必不可少的媒介。原始社会没有货币，通过皮毛、贝壳等稀缺的物质来进行交换，但交换的媒介始终无法统一，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社会开始以黄金、白银或铜币等贵金属作为货币中介。工业社会后，商品价值量越来越大，用黄金等贵金属作为货币难以承载巨大的交易规模，纸币随之出现。20 世纪 80 年代，货币的电子化越来越发达，电子钱包、信用卡、储值卡、手机支付迅猛发展。时至今日，以比特币、Libra、央行数字货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开始出现，货币迎来了数字化时代。

那么货币发行的基础是什么呢？以前货币依靠金、银等贵金属作为锚定物。20 世纪 70 年代布雷斯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货币发行的基础变成了与国家主权、国内生产总值（GDP）、财政收入相挂钩的国家信用。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通过美元垄断了全球石油美元结算和大部分国际贸易结算，美元成为了事实上的“全球货币”。然而依赖主权信用发放的货币也面临货币超发等问题。1970 年，全球基础货币总量（央行总资产）不到 1000 亿美元；1980 年，这一数字大约是 3500 亿美元；1990 年，大约是 7000 亿美元；2000 年，大约是 1.5 万亿美元；2008 年，变成了 4 万亿美元；到 2017 年底，达到 21 万亿美元。尤其是近 10 年来，美国为了摆脱金融危机，通过国债投放货币来刺激经济发展，导致政府债务总量从 2007 年的 9 万亿美元上升到 2019 年的 22 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的 GDP。如果美国债务持续攀升，到期债务和利息消耗掉所有的财政收入，美国没有信用再发国债，融资能力将会减弱，一次新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不可避免。

如何改变货币超发的局面？在金本位崩溃之后，世界各国一直没能很好解决这一问题。虽然有学者呼吁回归金本位，但受限于黄金储量，回归金本位显然不太现实。在数

字时代，有部分企业试图通过发行比特币、Libra 挑战主权货币。这种基于区块链的货币脱离了主权信用，其实质并没有去中心化，发行基础无法保证，币值无法稳定，难以真正形成社会财富。对主权国家来讲，最好的践行货币国家发行权的办法是由政府和中央银行发行主权数字货币。在全球央行发行主权数字货币的过程中，除了要提高便捷性、安全性之外，还要制定一种新的规则，使得数字货币能够与主权的信用相挂钩，与国家 GDP、财政收入、黄金建立适当的比例关系，通过某种机制，遏制滥发货币的局面。

目前，我国央行推出的数字货币（DCEP）是基于多种技术推出的全新加密电子货币体系，区块链技术是其中一种。DCEP 将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即人民银行先把 DCEP 兑换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DCEP 的意义在于它不是现有货币的数字化，而是流通中现金（M0）的替代。它使得交易环节对账户依赖程度大为降低，有利于人民币的流通和国际化。同时 DCEP 可以实现货币创造、记账、流动等数据的实时采集，为货币的投放、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

（四）提高产业链运营效率

5G 时代，除了消费电子产品如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之外，智能家居、汽车乃至工业制造设备等各类终端都能够智能化并接入到互联网中。数字平台将进一步进化为万物互联平台，带动人类的互联网产业从 to C 型的消费类互联网发展为 to B 型的产业类互联网。其中，科技金融可以连接数据平台、金融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帮助各方优化配置资源、提高运行效率以及降低运行成本。科技金融的发展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互联网+金融”，有条件的数字化平台公司，围绕自身产业链筹建非银金融机构，独立发展金融业务。另一种是“金融+互联网”，金融企业根据产业链发展需要构建数字化平台。前几年经济有些脱实向虚，许多工商业企业、非金融企业热衷于跨界运作，以至于金融业杠杆叠加、风险累积、乱象丛生。未来，数字化平台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最合理、最有前途的模式是数字化平台与各类金融机构的有机结合，形成数字金融体系。各类机构在其中各尽所能、各展所长。数字化平台链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掌握真实的交易信息，可以与各类金融机构合作，提供以区块链技术为底层的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解决供应链上存在的信息孤岛、数据可信传递、隐私保护等问题，提升全链条融资效率，降低业务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数字化平台把控好资金来源、杠杆比率，就能大幅度降低风险，获得合理的利润，还能有效发挥普惠金融功能。

责任编辑：谷 岳

“一带一路” 将为人类 带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陈文玲

摘要：“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成为一个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平台、载体和渠道。截至目前，全球已有 136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与中国政府签署了 195 份政府间合作协议，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及其他地区组织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写入相关成果和文件中。“一带一路”已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从倡议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进展情况几乎超出预期。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共享发展、普遍安全、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既是“一带一路”带给世界的宏伟愿景，也将是通过参与国共同努力可以实现梦想。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调整和演化，各国到了与全球同频共振的时代，认识这个充满矛盾与希望的时代，站在人类道德道义的制高点上，坚定不移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迎接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

关键词：一带一路 经济全球化 融合发展

作者简介：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根植于历史，但面向未来；源于中国，但属于世界。“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

同文明，成为一个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平台、载体和渠道。在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世界上曾有 28 个国际组织和国家先后提出了类似“一带一路”的倡议、计划或规划，但是都没有像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如此大的国际影响，如此多的响应者和参与者。为什么这一倡议会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同？这项跨时空、跨世纪、跨洲际的经济合作重大倡议理论框架是什么？从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和时空维度如何实现这一造福于人类的伟大倡议和行动？这是极具挑战性的重大命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从 2013 年开始，对“一带一路”相关问题进行了连续七年的研究，在曾培炎理事长带领和指导下，课题组在 2018—2019 年开始探索研究其理论框架。研究认为，“一带一路”理论框架可以总括为：习近平主席以大国胸襟、大国责任和大国担当，顺应世界发展规律、人类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21 世纪新文明为目标，以激活历史上古丝绸之路形成的文化价值符号为世界和平发展赋能，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的互联互通为主线，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新时代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吸引更多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自发参与深度合作为推动力，沟通构建开放型世界，点燃更多国家和人民群众追求发展和幸福的憧憬，链接历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创造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愿景。

截至目前，全球已有 136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与中国政府签署了 195 份政府间合作协议，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及其他地区组织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写入相关成果和文件中。“一带一路”已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从倡议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进展情况几乎超出所有人预期。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建设一个共享发展的世界，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既是“一带一路”带给世界的宏阔愿景，也将是通过参与国共同努力可以实现梦想。

一、古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积淀了以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中国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积累了难得的历史信任

古丝绸之路是一条柔性的、弹性的、具有历史长度和跨度的、具有丰富文化“含金量”的道路，是一条和平的、互利的、在驼铃声中进行交流、交往和交易而融合的道路，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高度认知的文化价值符号。中国古代先贤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古丝绸之路作为一种文化价值符号，符合和平合作发展的大道被世界认可，起源地就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英国历史学家彼

得·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为此做出的巨大投入，都充分表明中国正在为人类的未来着想。

（一）古丝绸之路是历史镌刻着的探索人类和平交往的见证

古丝绸之路是古代东亚和地中海之间、贯穿欧亚大陆中心的一条或者多条丝绸之路为主的贸易通路。公元前 100 多年，中国就开始开辟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汉代张骞于公元前 138 年和 119 年两次出使西域；西汉时期，中国的船队就能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唐、宋、元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同步发展，唐代中国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 70 多个，中国、意大利、摩洛哥的旅行家杜环、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都留下了历史足迹；时至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到了东南亚很多国家，使东南亚地区成为中国“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则把中国与南亚地区连接起来，成为古代中国从西南进入南亚地区的便捷通道。千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

（二）古丝绸之路是多元文化相互开放并被对方接受的融合进程

20 世纪英国伟大的思想家罗素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触，已经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明的交流和人文精神的碰撞，促进了东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接触、交流、互动与友好往来，推动世界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古希腊罗马和汉代中国作为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对古丝绸之路的发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欧亚大陆物质文明发展的角度，西方学者将“丝绸之路”分为原始时期、古典时期、古典衰弱期、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兴盛期、蒙古治下时期以及蒙古帝国之后七个阶段。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与澳洲、非洲南部、美洲等历史上的孤立、半孤立文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始终通过贸易、宗教和战争保持着文明的交流，东亚、南亚、中东、欧洲等人类文明的几个“轴心地带”始终保持着经济、文化、宗教、技术和制度的碰撞与融合。古代的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像南北分列的两条纽带，贯穿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将“世界岛”上的居民紧密相连。

（三）古丝绸之路积淀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蕴

亚欧大陆是人类文明和世界主要宗教的诞生地。佛教源自印度，在中国发扬光大，在东南亚得到传承；儒家文化起源中国，受到欧洲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思想家的推崇。古丝绸之路跨越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跨越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佛教、

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众的汇集地，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人民的聚居地。2000 多年来，生活在亚欧大陆上的人们，跨越戈壁、雪山、沙漠层层地理阻隔，在这块地球最大的陆地上演了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不同文明、宗教、种族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并肩书写相互尊重的壮丽诗篇，携手绘就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丝绸之路成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融合最生动的符号化象征。16 世纪末随着地理大发现、新大陆开拓和接下来的工业革命，西方世界兴起，殖民者的刀光剑影，丝绸之路逐渐隐藏于历史学家的教科书之中。尽管丝绸之路两端的汉朝和西罗马衰落了，欧亚的物质和文化交流仍然长盛不衰，沿着古丝绸之路，基督教在欧洲和拜占庭继续传播，佛教和印度文化进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波斯商人曾经垄断过东西方贸易，阿拉伯人带来了伊斯兰教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印度洋贸易区、南中国海贸易区曾经是重要的跨国交易区域，逐渐隐没在如烟历史中的古丝绸之路一直却有着令人向往和尊崇的力量。

（四）古丝绸之路是人类生存发展能力在互学互鉴中不断进步的演进

世界文明的魅力在于多姿多彩，人类进步的要义在于互学互鉴。古丝绸之路见证了沿线国家在互通有无中、互相学习中不断提高生存发展能力的历史，见证了世界如果实现发展繁荣，就必须在相互借鉴中、在取长补短中绽放灿烂文明。沿着古丝绸之路，粮食、皮毛、药材、丝绸、茶叶、玻璃、贵金属等运往很多国家，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铁器、家具、指南针传到西方，中国的耕作技术、造纸技术、养蚕技术、冶炼技术、瓷器技术、火药制作技术等传向世界。不同国度的先进技术和产品传到中国，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传入中国，胡椒、亚麻、香料、葡萄、石榴等产品传到中国。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交流过程是自发的、自由的，也是渐进发展的历史过程，商人、传教士、游牧民、武士、密使、工匠、农业劳动者都为古丝绸之路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推动了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商品、资源、成果等实现共享。古丝绸之路创造了相关国家和地区大发展和大繁荣。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生产技术和商品和知识交流带来了观念创新，带来了人类的进步。

（五）古丝绸之路是世界经济交流的主干道和世界思想交流的集散地

在古丝绸之路上，不仅各类物资通过东西方的商队源源不断地进行交流，满足各时代人民的物质需求，而且丝路沿线的人民充分汲取其他文明的思想，形成思想上的交流借鉴与传播。世界在以陆权国家为主导的时期，经济、文化、制度影响力主要在东方，如在南中国海贸易区，中国和印度文化包括佛教、儒家思想、婆罗门教、印度教传播到

东南亚国家和东北亚的日本、朝鲜，使参与贸易的国家拥有趋同的文化和语言。古丝绸之路，出现了陆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海上“舶交海中，不知其数”的繁华。以希腊、罗马为中心的地中海文明，与中东兴起的基督教文明交汇，发展西欧和北欧；伊斯兰教推动物质文明和商业交往，建立了囊括从非洲大陆到东南亚群岛的海域；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的商人曾经活跃在从红海到印度南段的贸易航线上。当一些强国走向海洋形成以海权为主导的时期，以战争实现霸权国的替代便占了绝大多数。18、19 世纪的英国，分别战胜了原有的“海上马车夫”西班牙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成为“日不落帝国”；20 世纪美国，通过 1898 年美西战争和一战、二战国际机遇，造就了 20 世纪的全球霸权。19 世纪的法国、20 世纪初的德国、20 世纪下半叶的苏联和日本，都是“失败大国崛起”的典型，也是之后冷战思维、霸权思维、零和思维产生的历史源头。当今世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结束了几百年西方以战争实现霸权替代、转移的历史，给予世界各国通过合作发展实现人类共同进步的希望和可能。

（六）中国作为古丝绸之路起点和最重要的交往者积累了难以替代的历史信任

在 21 世纪的今天，中国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不仅继承和深化了古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而且为全球化注入了道义感召力，形成世界和平交往、平等交易、平等交换、文明互鉴的新通途。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响应者众、参与者众，还在于几千年人类发展历史的积淀中，其文化已成为一种历史基因和文化文明价值符号得到了广泛认可。畅行于“一带一路”的全球化，与西方推行殖民主义时代，中国曾经遭遇的“带剑行商”、以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掠夺型全球化完全不同；也有别于国际金融资本大肆扩张时代，寡头“大鳄”们翻云覆雨、强取豪夺的寄生型全球化。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外交新境界，不仅使中国成为第一个不依靠战争、不依靠殖民、不依靠不平等的国际贸易、金融和经济体系而成功地实现和平崛起的大国，使中国和各参与国的发展经验和机遇惠及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智慧给全球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共享发展机遇与成效将惠及世界。新的历史条件下，沿线各国政府携手为各国机构企业和人民共同提供广泛、便利、高效、优质、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为各国企业和人民相互创造价值、分享成果而提供方便和条件。“一带一路”超越了“由国家看世界”的狭隘观点，进入了“以天下观天下”的新境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新的动力和科学指引。中国以“兼世以达、独善则穷”的天下情怀，支撑“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走远，具备强大的道德道义感召力。

（七）古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带给人类的并非总是正向收益

在一些历史节点上，为了争夺财富与权力，对抗、征服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匈奴西进、十字军东征、蒙古的扩张围绕陆上丝绸之路展开；欧洲殖民者对东方财富的掠夺基本围绕海上丝绸之路布局。但是古丝绸之路每次大发展，均有一个处于高速发展的文明在推动，汉唐时期中国丰富的物质文明为推动丝绸之路发展提供了经济动力，中世纪中东的伊斯兰诸王朝成为衔接丝绸之路的中枢，近代以来欧洲各国对财富的追求不断推动欧洲各国在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扩张，进而将世界各地带入全球化时代。纵观历史，古丝绸之路带给人类的是和平、发展和进步，架起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桥梁的正是中国，而中国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并没有通过战争、掠夺、欺诈或是靠不平等的手段获得国际地位和利益。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多边互利共赢之策，是构建开放型世界造福于人类之策，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合作建设路径，将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市场的形成，促进广泛的互联互通，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进而实现文化思想交流的繁荣，推动各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如今，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带来的弊端正在持续暴露，纠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推动国际合作新思维，为不同文明提供多样性的和平、公平、共享合作新范式，是新一轮全球化必须解决的问题。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我们应该从丝绸之路的历史中汲取智慧，从当今时代的合作共赢中发掘力量，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开创共同发展的光明未来。

二、“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和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将成为具有更高境界的超越民族、国家、
意识形态造福于人类的全球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国内重要场合 100 多次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实践路径、路线图等进行详细阐述。2017 年 2 月 10 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3 月 17 日，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3 月 23 日，首次被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习近平主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今天，各国应共同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共同解决世界的难题，共同掌握世界的命运。当代国际关系中任何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都不应脱离对同伴的责任、对国际大家庭的责任、对我们居住地球的责任。

“一带一路”建设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认识跃升和伟大实践。习近平主席从哲学和价值观的高度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以此作为“一带一路”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增加了“一带一路”的道德力量和凝聚力，使“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在新时代为人类的和平发展、共享发展、包容发展和持续发展方面所提供的可供选择的经济合作方案，贡献了站在道德道义制高点上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思想品。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诠释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和文化”理念一脉相承，适应当代世界文明多样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植根于中华民族兼济天下的博大情怀和世界其他民族包容共生的文化基础之上，本质是包容互鉴的文明观、百家争鸣的文化观以及和而不同的价值观。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回顾人类发展史，人类社会演进是一个由较小群体演进为较大群体，由信息封闭逐步到信息流通释放出新一代科技革命的内在动力，由相互隔膜走向相互依存，由文化差异走向观念融合的过程。在古代国际社会的五大文明中，中国是唯一一个将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链接起来的国家，是植根于中国历史的深厚文化，给了一个伟大国度繁衍生息、生生不息的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就是一个和合天下的世界，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天下和平、民胞物与、天下一家、万国咸宁、天下和合，是中华民族往圣前贤以其对天下观的智慧卓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集中体现为“天人合一”思想：五经之首的《周易》以“天地风雷”预示人之吉凶、国之命运；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提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荀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夫是之谓人师，是王者之法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人自古信奉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哲学观。中国有“大同”理想，以“天下为公”为原则，向往富裕、公平、诚信、友爱、太平的世界。如费孝通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源远流长，无内无外、天下一家是其核心原则，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是其终极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汲取“天下观”与“和文化”的思想精髓，通过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攸关中国前途命运的

中国梦与攸关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的世界梦紧密连接在一起，使世界更多国家分享中国智慧、中国经验；既使世界发展成为中国机遇，又使中国发展成为世界机遇。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思想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过去西方国际政治学宣扬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秩序”“日不落帝国安排”“雅尔塔秩序”以及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思想基础和语言表达。从人类发展的进程来看，西方中心的国际秩序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把国际关系纳入一定的框架中，以相对稳定的规则和机制加以治理。今后的世界秩序和全球秩序将包含这个国际秩序的大部分合理因素，并根据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和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需要不断变革与调整。纵观历史，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1992年正好是500年，也是从国际秩序到世界秩序形成的500年，其根本缺陷在于排斥了占人类多数的非西方国家。500年间，15世纪有文艺复兴和新航路大发现；16世纪发生了宗教革命和教皇体系解体；17世纪形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大西洋三角贸易；18世纪，欧洲王朝体系解体，世界殖民体系形成；19世纪，东方朝贡体系崩溃，同时世界市场体系形成。世界每100年都有体系的大变化，都有前100年没有的重大特征；但是每次变化都是“西方中心”秩序的扩张，而不是形成真正平等的世界秩序。在西方主导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500年之后，“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为许多后殖民地国家和地区提供平等机会参与全球治理并在国际市场上自主销售本国产品的新机遇。这是对旧有全球化的一次大扬弃，将会推动世界从行政隔离走向互联，从民族分割走向合作，形成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全球化社会和全球人类新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一带一路”通过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实现互利共赢，是对仍在奉行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丛林法则、一家独大、赢者通吃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回应。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平等和尊重才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符合更多国家人民群众渴望共享发展机遇、创造美好家园的憧憬和期待，促使人类社会逐渐形成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让合作共赢超越20世纪至今的地缘对抗，创造出实现更高视野、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且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和理念，适应人类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新全球观”，成为21世纪的人类新文明。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并系统阐释“共同体思想”，他们把作为无产阶级奋斗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命名为“自由人联合体”。在这种共同体中，个人是世界历史性的、经

验上普遍的个人，是自由而全面发展并因此具有丰富个性的“自由人”。马克思揭示了人或社会发展的三种形态：最初的人类以“族群”为本位（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中间经过“个体”本位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进而实现以“类”为本位的自由人联合体（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形态）。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它首先是一个认识作为“个人是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是自由而全面发展并因此具有丰富个性的自由人”最大限度交织、交汇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未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崭新思想境界。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越来越多的人在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挑战面前，认清了一个道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包打天下。唯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胸襟，“穷则变，变则通”的眼光，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迫切呼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人们深入交流，增进彼此理解。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成为全球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之所以成为中国为全球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就是因为作为核心理念和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责任担当。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主席介绍中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他说：“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前途命运已经前所未有的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正在把自己的发展经验与机遇，提供给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大利益汇合点、理念共鸣点、合作契合点，为“一带一路”建设寻找最大公约数，彰显大国智慧与气度。“一带一路”按照古丝绸之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50%，很多是低收入国家，有 9 个是最不发达国家，还有大量民众仍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低，相当多国家无论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看，还是从应对金融危机后影响和适应变革演化中的世界看，各国谋和平、求发展的愿望比以往更加强烈，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 70 周年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

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成为最受欢迎的全球新型公共产品，成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分享市场、投资、贸易收益，分享绿色发展环境的重大机遇，也成为发达国家发挥资金、智力、服务等优势参与第三方合作的新机遇。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在更加持久的和平共处中获得生产力跃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着人类维护世界和平的先进世界观，“一带一路”是世界和平发展的载体与通途。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快速发展并改变世界。随着自由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推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它不仅改变世界的面貌，而且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普遍交往把区域性、民族性的历史带入全球范围，不同的文化在相遇相知中交流互鉴。但是世界范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空前膨胀，引发战争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能源风险、粮食风险的因素也在上升。个别国家成为既有国际秩序、国际规则的搅局者、破坏者和肇事者，他们不仅“退群”，破坏各国为了维护和平大局、保护生态等形成的国际共识或条约，甚至有可能瓦解现有国际机构或者体系。全球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的发展趋势，正在与把一个国家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和国际规则之上的民粹主义展开激烈博弈。尽管逆全球化是回头浪，最终会被滚滚向前的历史大潮所淘汰，但当前仍在拍打着两岸，是容易引发矛盾、冲突、纠葛与战争的因素和力量，它不可能自动离开历史舞台，人类社会面临新的挑战。当今世界安全问题极为复杂，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可能建立在周边国家贫穷的基础上，一个国家的安全也不可能基于周边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一个国家的内部动荡会外溢到其他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是对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的概括和升华。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也是人类情感共同体与安全共同体。安全应当是普遍、平等和包容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乃至世界安全事务的权利和维护世界安全的责任。“一带一路”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促进世界经济合作、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中国已经不再是孤立或封闭于世界的国家，而是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求中国必须与其他国家一道同呼吸、共患难，共同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

（六）人类命运共同体绘就人类更加文明和美好的明天

自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沿着丝绸之路和世界所到之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一条链接中国与相关国家地区的感情纽带。习近平主席强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在各区域组织关系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阿拉伯命运共同体、中国—拉美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等。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打造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中国—越南命运共同体、中国—俄罗斯命运共同体等。“一带一路”提出了清晰明确的方向，给了更多国家和地区休戚与共的依存感，给了通过共同努力解决发展困难的力量感。更重要的是，立足于各相关国家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复兴，通过提升文化的相互开放水平，推动不同文明交流碰撞，形成更具包容精神的多样性文化，汇聚和释放文化促进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实现更有效率、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增长，“一带一路”成为在新型经济全球化大潮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习近平主席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刚刚走过了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程，并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70 周年，蓦然回首，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谓沧海桑田亦是如此。从 20 世纪后半期到 21 世纪初，由于中国快速发展与和平崛起，使世界格局特别是经济格局发生了历史性、根本性、基础性变化，中国积蓄了发展的能量和力量，理应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是“一带一路”倡议者、推动者、建设者，更多国家和地区人民参与“一带一路”的热情和行动，将绘就更加美好的人类明天。

三、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主线，开创了跨国界、 跨时空、跨意识形态、跨不同发展阶段融通的进程， 探索国际经济合作的崭新模式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优先和核心领域，是通过互联互通实现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途径。愚者求异，智者求同，仁者求通。“一带一路”倡议战略构想内涵丰富，其中之一就是打造互联互通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所谓新型国际关系和合作道路，实际上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实现多维度互联互通，提高更多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通达水平，推动形成开放性、通达性、共享性的世界，人类迎来了建立在大流通格局下的认同与行动。

（一）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的本质是互联互通，人类迎来了国际化大流通时代

当今世界竞争博弈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到现代流通能力上，国家战略利益越来越集中在现代流通能力上，流通规则、流通秩序、流通效率、流通成本和流通组织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决定了世界合作。建设“一带一路”的主线是以“五通”为核心内容的互联互通，即是国际化、社会化、信息化、共享化的更有效率和效益的“大流通”。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的本质是互联互通，其核心是一个“通”字。互联互通提高世界的开放度，增强中国 and 所有参与国的现代流通能力，可以极大调动和激发发展的潜能和动力。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提出了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世界正在迎来国际化、社会化、市场化、混沌化的大流通时代，政策沟通为流通创造外部市场环境，设施互联互通是推进现代流通特别是现代物流的基础，货物畅通是商流、物流顺畅流通和完善规则的过程，资本融通是国际货币、投融资更加便利化有效有序的实践，民心相通是现代流通的社会环境。“一带一路”将提升沿线国家、参与国家之间的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帮助更多国家和更多中小企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将加快推动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流跨区域和地区的便利化、自由化、国际化、高效化和共享化。

政策沟通。通过各国战略、规划、政策协同或者协调，有助于形成相向而行的共同战略和政策选择，创造流通外部环境的一致性，使更多国家和地区跨国界的国际化大流通有一个透明的、可预见的外部市场环境。取得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共识，构建沿线国家多层次政府间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规划项目对接的机制，形成趋向一致的战略、决策、政策和规则。推动国际化大流通在政策取向一致的情况下，使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和人力资本流通更加顺畅。

设施联通。包含两重含义，一是硬联通，二是软联通。硬联通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同推进经济走廊或物流大通道的建设，诸如从中国到欧洲的新欧亚大陆桥；中国到南亚半岛的经济通道；中国到中亚、西亚的通道，包括中亚五国和西亚的一些国家；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随着“一带一路”从古丝绸之路沿线65个国家发展成为更多国家、国际组织参与的开放的国际合作平台和载体，将出现更多的经济通道、走廊和经济带，出现更多的经济合作园区、重要城市节点。软联通诸如互联网、物联网的联通，5G等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构成的深度泛在的联通，诸如各国相

互让渡国家部分权利，实现更大范围的大通关等制度联通，形成“硬联通”与“软联通”共同推进的立体化经济走廊或通道。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创造性的连接都会使区域经济联系产生巨变，惠及更广阔的地域。“一带一路”将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信息化为先导，实现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贯穿亚欧非，连接三大洋，把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和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结成携手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贸易畅通。贸易畅通是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接不被打断的保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流通规则，使流通中的国际交易和交换在同一规则或者规则中快速流通、有序流通和有效流通。在当代，一个国家的生产已经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服务链的链接，生产过程即是流通过程。在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过程中，国际贸易商品结构、流量和流向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以制成品、最终消费品为主体的贸易结构正在被以中间品、投资品为主体的结构所替代。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旨在突破各种形式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及其各种壁垒，形成更为自由和便利的国际贸易规则和贸易体系。在新形势下，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受阻的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通过“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沿线国家和地区将共同建设自由贸易网络体系，拓宽贸易领域，共同优化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服务链，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产业互补、互动与互助，共同探索新的开放开发之路，形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使我国发展更多地惠及周边国家。

资本融通。“一带一路”倡议之前，资本流通规则以及规则制定权和主导权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手里。美国主导世界银行，欧盟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主导亚开行，国际资本流通秩序和规则基本被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或主宰。为了促进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能够通过资本融通、货币流通实现共同受益，中国倡导设立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筹备上合组织金融机构，为更多国家和地区创造资本顺畅流通和使用的环境，形成顺应世界经济格局的金融新规则，构建支持更大范围开放的金融体系。亚投行正在激活国际金融体系和秩序的变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都参与了与亚投行的合作。亚投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银行开始运营，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亚洲开发银行、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本币互换、本币结算、货币直兑的步伐加快，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在沿线国家使

用所筹资金。在世界舞台上，一场“化蛹为蝶”的超越意识形态的金融开放和资本流通的合作正在进行时。

民心相通。民心相通就是要创造现代流通更好的社会环境，使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货物畅通、资本融通、民心沟通得到所在国民众认同和响应。几千年积累的世界不同文明、文化具有差异性，但世界是通的，民心是通的，增强文化认同感是构筑“一带一路”开放建设的社会根基。由于交流交往交易，共同的需求是商流、物流、信息流、知识流和人员流通的畅通。现代流通推动了民心相通，民心相通进一步保障要素禀赋和全球布局经济交往的通达性。文化的影响力超越时空、跨越国界，获得参与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认同。要使“一带一路”建设得到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响应，必须立足于各相关国家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复兴，弘扬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世界文化新精神。通过提升文化的相互开放水平，推动不同文明交流碰撞，形成更具宽容精神的共同文化和永恒价值，汇聚和释放文化促进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实现更有效率、更具包容性的增长。

（二）互联互通中的设施联通是关键，通过软硬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有效弥补世界发展短板，推动全球更多国家释放经济发展动能

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指出，良好的道路、航线等可以缩小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发展差异，互联互通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全球战略家、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顾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所著《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一书指出：“互联互通是当今时代的元模式。现在我们还仅仅处于地球工程再造的初期，世界需要更多的设施来服务于飞速增长的人口、商品、货物、数据和资金流动。”城市、经济走廊、产业园区、道路、交通设施、通讯设施、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发展的首要需求和基础需求，对人们的生活和企业的发展会产生变革性影响。在发达或者更为成熟的经济体中，完善和满足需求而建设和更新基础设施，也是维持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017年，G20旗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IH）与牛津经济研究院联合发布了《全球基础设施展望》（Global Infrastructure Outlook）报告。报告对全球50个国家的公路、电力、铁路、水资源、电信、港口、机场等七大行业基础建设投资需求进行了数据分析。2016—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增至94万亿美元，年均约增长3.7万亿美元，全球基建投资缺口约15万亿美元。亚洲将在未来几年主导全球基础设施市场。到2040

年，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约占全球的 54%，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为 22%，位列第二。据估计，到 2040 年，中国、美国、印度和日本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占全球的 50% 以上。其中，仅中国就将占全球基础设施需求的 30%。据世界银行测算，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每增加 10%，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增长一个百分点。另据东盟东亚经济研究中心（ERIA）报告，2021—2030 年，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使东盟各国 GDP 累计增加 42.08%，东亚各国（“10+6”）GDP 累计增加 5.87%。欧洲知名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研究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降低运输成本、促进国际贸易等方面欧盟国家将获益良多。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跨境贸易的运输成本占物流成本的比重超过 50%。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动中国和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位于另一端的欧洲国家同样获得了发展贸易的“新机遇”。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沿线大多都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综合发展环境改善缓慢、广义贸易成本居高不下，进而导致经济落后和难以实现起飞。由于未能有效互联，有些国家虽然看上去是一个赋有主权性质的整体，但内部的割裂程度远比地图上显示出来的严重。特别是有不少内陆国，因为基础设施落后，大部分是“陆锁国”，他们的经济要发展，要实现经济起飞，亟需改善自身的综合发展环境特别是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曾支撑了他们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的便利生活与工作，但其基础设施已走向全生命周期的后期，亟需改造更新。随着技术革命如高铁技术发展和输出，一些互联互通的国家成为受益者和发展者，一些国家甚至发达国家成为落伍者或者落魄者。跨国和跨区域互联互通由于涉及多个国家，供给效率更是低下，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互联互通的供给意识和能力不足，这涉及资金、民族宗教、技术水平、政府能力等许多问题。这也表明仅仅依靠内生力量无法打破原有的恶性循环，只有引入外生动力才有可能打破这种循环。这种创造性的“打破”，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只有在互联互通的帮助下，才能够创造出与世界经济连接获得发展的机遇，并以此参与区域合作。

“如果从互联互通的角度观察世界，就会看到人类如何重新组织的新图景。可以说，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需求、利益和选择的最大交汇点。全球基础设施的发展正使得世界从割裂走向互联，从民族分割走向融合。基础设施就像是将地球上一切组织连接在一起的神经系统，资本和代码就是流经神经系统的血液和细胞”。^①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前提的“一带一路”发展导向型区域合作，成为区域经济合作

①[美] 帕拉格·康纳著，崔传刚、周大昕译：《超级版图》，中信出版社 2016 年 7 月版。

的新起点。在此过程中，政府间的合作特别是互联互通的引入，是打破经济落后恶性循环的突破口。“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与联合国致力于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设备等方面帮助高度契合，宏观目标完全一致，有助于加快区域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17 项大类和 169 项具体目标落实的重要支撑点。

特别是设施联通，一国的互联互通程度决定了该国的国际竞争力，全球互联互通能力反映出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互联互通的能力，是各国积极平等介入全球互联互通进程、融入全球互联互通的过程，也是最终基本消除极端贫困的内在需求。世界银行相关研究指出，需要化解距离、密度和分割对发展的约束，推动经济地理重塑，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缩短距离，即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降低交通运输成本，促进生产要素流动，缩短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距离；提高经济密度，即推动产业园区和城镇的建设，提高经济活力；减少分割，即减少政策造成的经济壁垒，获得世界市场准入机会，实现规模经济 and 专业化分工。亚洲开发银行针对亚洲的跨国经济走廊进行了案例研究，该研究认为，经济走廊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一般包括四个阶段：首先，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降低交通运输成本；其次，以城镇化、更新城乡基础设施、促进工业发展、改善中小企业投资环境、增加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方式，实现“地区发展计划”，拓宽经济走廊；再次，以贸易便利化为核心，促进跨境商品、服务、人员的流动；最后，需要协调不同国家区域发展的计划与政策，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跨境经济走廊。事实上，该研究已经表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业园区的结合，有助于将“一带一路”发展演化为拉动周边经济体发展的经济走廊。而这种演变就是一个经济体从封闭的不发达经济向开放经济的发展转变过程，与此同时，这也有助于该经济体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引领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正在将割裂的全球化带入到一个互联互通的全新时代。未来 40 年的基础设施投入将超过人类过去 4000 年。如何打破基础设施滞后和经济发展落后之间的恶性循环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互联互通已经取代区隔成为全球组织新的范式。随着工业经济时代基础设施的衰落，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在全球兴起，大范围的连通各个国家和地区、各大洲，这其中涉及的建设、融资、管理也均超越了国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基础设施联盟。超级都市、高速公路、铁路线、油气管道、通信光缆等象征着全球网络文明的标志，将密密麻麻布满全球，将几乎所有的经济体的利益密切连接在一起。

（三）互联互通从注重“硬联通”到“软联通”先行，战略、规划和政策协同，成为通过制度联通全球有效治理的崭新路径

“互联互通”不仅是一种国际共识，也成为一种方法论，日益成为疗治当前全球各种疑难杂症的“药方”，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建设使中国与更多国家携手建设“一带一路”，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延伸至现代版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调整与整合，对推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迷、重新寻找和发动经济增长新引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从亚欧大陆到非洲、美洲、大洋洲，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做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

互联互通是一个广义联通概念，既包括基础设施物理性的硬件联通，也包括在政策与软件上的制度联通。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2 年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关税率为 4.97%，而东亚与太平洋国家为 8.15%；南亚、中亚地区达到 14.05% 与 7%。政策壁垒导致的要素流动障碍同样使得“一带一路”地区面临着严重的分割。未来“一带一路”通过降低关税，降低交易成本、跨境物流成本，以及制度成本，消除非歧视原则和贸易壁垒，加快“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标准、规则、法规对接，打造“大通关体制”，将有望实现“软联通”。据世界经济论坛估计，如果全球供应链壁垒的削减能够达到最佳实践水平的一半，全球 GDP 预计将增长 4.7%，贸易量将增加 14.5%，远超取消所有关税所带来的福利收益。东盟东亚经济研究中心（ERIA）报告表明，2021—2030 年，供应链壁垒和非关税措施的削减将使东盟各国 GDP 累计增加 31.19%，东亚各国 GDP 累计增加 7.76%，因此不仅加快了有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也整体推进了参与合作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当前，全球面临增长动能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治理体系滞后、区域发展失衡、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多边机制不振等问题，“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有悖于世界合作潮流的主张重新抬头，经济全球化走到历史十字路口。

近年来，世界对交通、能源、通信等互联互通产品的需求正急剧增加，而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供给意愿和供给能力却相当有限，很多时候自身还有很大的更新需求。“一带一路”建设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利用既有双边合作机制、国际组织和多边论坛等有效平台，在推动形成战略对接、规划对接、政策对接和共识的基础上，推动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软基础设施联通水平不断提升，可以大大降低区域间商品、货物、资金、物流、信息、技术等交易成本。据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ESCAP）的研究显示，一般而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拉动经济增长：一是降低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二是提高市场进入的便利程度。报告援引“渝新欧”铁路和青岛

港口的统计数据为例，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欧之间的陆路运输实现了快速通关、快速换轨、快速检验，使成本降低了 50%，海路运输成本降低了 5%。陆地、空中和海上交通运输成本每减少 10 个百分点，国际贸易额将分别增长 2%、5.5% 和 1.1%。交通运输成本降低后，比利时、荷兰、斯洛伐克的国际贸易上涨幅度将接近 10%；奥地利、匈牙利、丹麦、摩尔多瓦、德国、波黑及波兰的国际贸易增长幅度也将达到 8% 以上。

（四）互联互通是各国和地区、国际组织寻求价值观和发展观交叉重叠最多的部分，是现代国际关系演化的基础性动因

“互联互通”深嵌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之中，也是当代国际关系演变的动力。经济全球化演化的内在动因是现代流通运动的结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转的、持续演进的客观进程。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是在新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时代，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和人的流动对阻碍其顺畅流通的冲击力。这种导致经济全球化必然结果的内在动力不可遏制，并且在加快聚集、生发、放大、发展，产生着人们已经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变化，乃至产生颠覆性技术革命、业态变革或商业模式创新，更引发国际关系包括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方式的变革。

“互联互通”不仅停留在实践和政策层面，还上升到区域合作以及全球治理层面，而对国际关系的演化形成助推力。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对“互联互通”的涵义、目标和任务做出重要阐释。中国借助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亚欧互联互通等会议机会，力推《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此外，中国与东盟成立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设立中欧互联互通平台，倡导建设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等。六年来中国与参与国共同推动建立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合作框架，基础设施联通从交通、能源、通讯、管道、口岸等的“硬联通”，向标准、通关、认证、融资等“软联通”逐步发展。目前，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 130 多个涉及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等方面的双多边协定。其中，与沿线 15 个国家签署了 16 个双多边运输便利化协定，与沿线 47 个国家签署了 38 个双边和区域海运协定。中国政府与欧盟委员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启动中欧互联互通平台合作；中国与老挝、缅甸和泰国等三国共同编制《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发展规划（2015—2025）年》，推动制定了《大湄公河次区域交通战略（2018—2030）》和《中国—东盟交通合作战略规划行动计划》。在多个国际合作机制、双边多边交流平台下，积极与沿线国家进行对接，先后与伊朗、孟加拉、阿富汗等国家信息通信主管部门签署了《政府间信息通信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东非共同体五国、埃

塞俄比亚和国际电信联盟分别签署了《共建东非信息高速公路合作文件》，并在 2017 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与国际电信联盟签署《关于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电信和信息网络领域的合作意向书》。2016 年 9 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通过了中国提出的建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在加快中欧陆海快线、中欧班列等区域和国际物流通道建设的同时，沿线国家开展口岸通关协调合作，提升通关便利，平均查验率和通关时间下降了 50%。

作为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者，“互联互通”经济合作伙伴既有各自独特的、丰富的实践基础；又有共识性、共通性的国际经验。中国是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的倡导者、实践者和引领者。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互联互通”作为政策理念纳入其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理念推进“互联互通”，与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的自由贸易网络体系成为完善国际关系的“粘合剂”，成为中国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作为一项长期的国际经济合作行动，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可以作为在人类面对共同挑战面前的最佳选项。

互联互通是世界各国人民寻求自身发展的共同利益与共同诉求的新型公共产品，是为全球秩序、全球规则提供“中国方案”，并已经变成了 136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参与的国际经济合作行动。如果说过去全球通过公共产品的供给，更需要的是维护国际安全秩序；那么今天世界各国则更加迫切地需要以道路、交通、管网、通信为主的“互联互通”，迫切需要以互联网、物联网、云服务、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互联互通”。因而，世界越来越需要一些全球性组织或地区性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保障互联互通的制度、规则与管理变革，这是实现全球高质量互联互通能力的核心。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全球治理体系酝酿深刻变革与调整。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的政策，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拒绝承担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应尽的责任，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各国利益深度交融、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今天，美国却筑起高墙，滑向保护主义和国家至上主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主张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反对任何排他性安排或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为此，一方面积极参与 G20、金砖国家合作等多边合作机制，推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深化改革，使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具有更多代表性并使之互相协作配合。

四、“一带一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将开启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新型经济 全球化进程，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四轮经济全球化、第四轮科技革命与第四轮产业革命首次交织交汇在一起，不仅发生了历史性、根本性和革命性演化，而且正在产生化学反应、乘数效应和连锁变化。“一带一路”适应经济全球化大潮，是推动全球人类均衡、包容、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智慧设计。“一带一路”站在人类道德、道义制高点上，从更长远的历史发展周期和历史长河的演化，从应对全球和各国面临共同挑战和共同机遇的视角，提出了崭新的经济全球化思路。

在不可遏制的经济全球化的浩浩荡荡大潮中，“一带一路”是顺应、引领时代潮流的新理念与新载体，创造了超越西方经济学和价值观的新理论。在浩浩荡荡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转的、持续演进的客观进程。“一带一路”建设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器。习近平主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一带一路”正反映出不可遏制的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六年以来，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形成的共识、取得的进度和成果令世界瞩目。

（一）“一带一路”体现出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现代经济发展并驾齐驱的两个轮子，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性特征

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随着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正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嵌套式发展格局中。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繁荣的基础，目前全球 40% 以上的 GDP 创造都来自于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

“一带一路”通过推进互联互通，包括软硬基础设施联通，链接那些被割断或阻隔的经济关系，平衡两种基本经济形态的关系，使之进入完全的、内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这样的世界，传统意义上的诸多“边界”日渐消弱甚或消失。通过全球经济形态演化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其基本经济形态是实体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在原来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服务经济、信息经济、智能经济、生态经济交互发展，推动现代经济形成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世界经济从

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工业文明时代，进入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共同构成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技术基础、社会形态和上层建筑都在经历着一场伟大重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并驾齐驱，互为表里、互为作用、互为溢出和转化的能量，导致有形要素禀赋与无形要素禀赋共同进入流通，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日益融合，有形国界与无形国界日益交错。

因着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发展导致的现代经济演化，使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全球化从沿着单向轨道前进，转而成为在双向轨道上加快前进的速度。当前逆全球化思潮能否使全球化进程倒转，这是人们担忧的一个现实问题。逆全球化思潮和行动，或许会暂时对这个历史进程产生破坏或切割，但终将阻挡不了经济形态演化所产生的全球化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既适应了现代经济的两种基本经济形态的变化，也推动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平衡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产能合作、共建经济走廊和贸易投资等实体经济形态发展，给参与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数字丝绸之路”“网上丝绸之路”等虚拟经济形态，以“软联通”形式后来者居上。

（二）“一带一路”体现出新全球化中的经济表征：呈现万物互联的网络状态并形成网络体系，以大数据化、高度智能化、强融合化、移动化和泛在化，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呈现更紧密的联系

“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新经济表征——网络状态和网络体系的链接中，可以使更多国家和地区进入越来越完善、越畅通、越有序的网络状态和网络体系。目前，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已经启动并获进展，以陆海空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电信基础设施等重大工程为依托，形成包括新加坡港、马来西亚巴生港和关丹港、印尼雅加达港和比通港、缅甸皎漂港、孟加拉国吉大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和汉班托塔港、也门亚丁港、沙特阿拉伯达曼港和吉达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法国马赛港、德国汉堡港和不莱梅港、比利时安特卫普港、荷兰鹿特丹港等在内的“多国多港”框架，一个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目前，中国已与周边 12 个国家建成跨境陆路光缆系统。中缅、中巴、中吉、中俄跨境光缆信息通道一批标志性合作项目取得明显进展，已经完成中阿跨境陆缆系统扩容、中尼跨境陆缆系统修复，正在建设/扩容中吉、中巴、中缅、中蒙和中俄跨境陆缆系统。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领域网络状态和网络体系越密集、越完善、越顺畅，其

产生的集成、集疏、集散、集约功能就越强，共享发展的机遇和程度就越大。这种网络状态与网络体系一旦被切割或呈碎片化，网络体系中的节点、环节或单体将失去其显在或潜在价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是全球化的动力之源，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全球化发展规模的大小和速度的快慢。“一带一路”有力推动互联网革命与物联网发展，提高沿线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互联性，加快产业和要素跨国界流通的速度，成为直接驱动全球范围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在冲动。随着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将使互联网与物联网革命带来的新经济表征凸显，以云计算、大宽带、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全球范围内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等设备普及为基础，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与管理为保障，以可扩展性、可移动性、泛在性、异构性、复合性、增值性为特征，率先在沿线国家进而在全球形成跨国界发展的新经济，呈现万物互联的网络状态。“一带一路”加快构建万物互联的网络状态与网络体系，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的软联通和高铁网、公路网等实体网络的硬联通，推动各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呈现更紧密的联系。不仅在一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形成跨国发展的互联网、物联网的连接，更推动实体经济表征也呈现出网络状态，诸如高铁网、公路网、航空网、管道网、港口网、店铺网、自贸区网络体系等。

（三）“一带一路”体现新全球化中的经济链接：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资金链和价值链等，这些虚拟链条较之过去的组织形式具有更大的粘性和融合度

中国倡导并与相关国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更高水平，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程度增强，阻碍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通的各种壁垒不断削弱，经济运行的国际规则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必然产物。“一带一路”不仅通过提供新技术手段实现对生产以及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的影响和渗透，而且通过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资金链和价值链等协同互动发展，创造新的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中国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中非发展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拉产能合作基金、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专项贷款以及中国政策性、开发性、商业性、财政性、援助性资金，与世界各国全方位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中国优势产能、富余产能与沿线国家产能需求对接，重构“一带一路”沿线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帮助沿线国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产业发展层次。目前中国已同哈萨克斯坦、埃及、埃塞俄比亚、巴西等 41 个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协议，同东

盟、非盟、欧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区域组织进行合作对接，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并加强与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开展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合作。截至 2018 年 9 月，中国企业在 46 个国家在建初具规模的 113 家合作区。

从全球看，在产业存在特别是制造业关联的状态上，形成了一种链状的链接。从制造业来看，其产业形态已不局限于原来的一条生产线、一个工厂或者某几个工厂的联系或叠加，而是没有任何产权关系的产业链等虚拟链条的链接，这些虚拟链条比传统的组织和实际关联更具有粘性。这种经济链接成为现代产业特别是现代制造业的链接方式，这种产业之间的链接关系一旦形成，将产生直接冲破国界和行政区划的内在动力。供应链的链接、服务链的链接、资金链的链接和价值链的链接，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链，就是因为现代流通中，信息作为一种特殊要素禀赋进入流通，成为流通中的最大变量。信息与其他商品不同的一个规律是，一般商品当完成交易过程进入消费端的时候，就走到了自身的终点；而信息进入成为流通中要素禀赋后，它被交易的次数越多、被使用的次数越多、被消费的频率越高，信息流通中所产生的价值就越高。或者说，信息的价值是随着它在流通过程中被交易或被消费的频率而增加的。通过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促使若干产业变成跨国界、跨区域、跨产业的链状链接或组合，既使市场呈现出潜在爆发力，也使信息加入流通产生巨大变量，促进产业跨国界或跨区域实现更优组合。这种力量导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不断优化调整。这是一种内在的需求和选择，任何行政力量或者思潮都奈何不了，人为地进行干预或阻挡，只能是如“螳螂挡车”被浩浩荡荡行驶的车队所“碾压”。在美国第一批对中国输美 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时，其中 70% 是中间品和投资品；在第二批 2000 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时，其中 78% 是中间品和投资品。因此，这是切断全球供应链的愚昧与无知，越来越受到这种行为的惩罚。

（四）“一带一路”体现出新全球化中新经济主体：跨国公司、若干大数据集成系统、平台经济、体现消费者个人主权意识的市场集成组织，是具有更大的跨国发展的新动能

“一带一路”建设为新业态、新经济主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新经济主体具有强大生命力，将成为跨国界发展的主力军。原有的跨国公司继续成为全球性企业主体，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全球化的推动者，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适宜的企业组织形式。跨国公司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的跨国经营能量，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地的优势组织生产，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流通和国际间分工，并由此极大地推

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其面向“一带一路”进行的全球性采购体系、营销体系、研发体系、生产体系，成为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全球比较优势发展的先行者。在跨国公司成为经济组织主导经济全球化主体的同时，大数据集成系统、平台经济、体现消费者主权意识的市场集成或更多自由创业的个人，这些迅速发展的新经济主体，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器或催化剂，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能量。如大数据集成系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和不断产生累积效应，使数据不再仅仅是动态记录的过程，而成为独具价值和增值价值的资源，并逐渐成为直接交易物进入流通。信息流通由桌面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转变，成为“泛在互联网”，促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任何要素禀赋都能顺畅地快速流通，而大数据集成系统本质特征是泛在和跨界，这种新经济主体跨国界的能量，高于由人组织而成的传统企业组织。再如平台经济，也快速发展成为一种新经济主体，这种跨领域、跨行业、跨业态、跨国界的新经济的平台经济，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与竞争力，具有准公共服务的功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其规模越大，服务功能越强，平台经济成为跨国界的消费者集成、生产商集成、供应商集成、市场集成的力量就越强。特别是第四次产业革命发生以来，美国引领了信息产业的变革，以IBM、微软、思科、苹果、谷歌、脸书等为代表的伟大企业先后崛起。而中国则依靠改革开放和巨大市场规模，大量引入美国先进技术，实现了信息通讯领域的跨越式发展，诞生了像阿里巴巴、腾讯、联想、华为等一批世界级互联网和信息科技企业。

（五）“一带一路”建设催生新全球化的贸易形式：E国际贸易将成为体现普惠、智能、高效、便利的下一代贸易方式，将渐次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边境小额贸易和采购贸易融合

E国际贸易方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应用与发展，将大大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大大快于传统贸易方式；而传统贸易方式，或者渐次被融合、替代，或者演化为下一代贸易方式。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生产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投资的全球化和消费的全球化。其中，特别是贸易的全球化，使国际贸易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加强了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合理配置，加快了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流通，促进了科技在全球应用或转化，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方式中的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小额边境贸易和采购贸易等传统贸易方式，已经被各国采用。随着中国与相关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国际贸易正迅速被E化，向着下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演进。以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发展为先导，E国际贸易将涵盖生产、流通、金融、投资各个领域，将囊括世界经济和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的各个方面及

全部过程。随着 E 国际贸易发展，又将推动国际分工从过去以垂直分工为主发展到以水平分工为主的一个新阶段；使国际资本流通达到空前规模，金融国际化的进程加快；促进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使国际分工更加深化，各国可以从事能获得最大限度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促进产业的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加速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E 国际贸易——下一代贸易方式形成的过程，既是一个全球性制度变迁和相关国家政策沟通协调的过程；也是一个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融合渗透的过程。由于中国在 E 国际贸易的领先优势，必将通过“一带一路”沿线贸易的 E 化，率先在这一范畴内形成更为便利和自由的下一代贸易方式，跨境电商将成为一种历史过渡形式。E 国际贸易作为下一代贸易方式，将使国际经济关系更加复杂，要求以往的国别关系、地区关系发展为多极关系和全球关系，并要求强化国际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与经济政策的趋同性，导致一系列全球性新经济规则的产生，国际组织、区域组织经济的作用更加重要。“一带一路”将由于 E 国际贸易的发展，使这些复杂的经济关系简单化、趋同化和平台化。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以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五次技术革命或许能为人类真正带来“自由、民主、博爱”。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解决困扰人类社会千百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区块链技术已经使去中心化的金融体系成为可能；生命科技的飞速发展正在使人类逐步实现摆脱疾病和死亡的愿望；将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能力与机械力量相结合的智能制造等，有望彻底消灭人类社会中的剥削、压迫和奴役，为未来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完全不同的社会场景。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调整和演化。各国到了与全球同频共振的时代，认识这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认识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站在人类道德道义的制高点上，坚定不移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迎接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

责任编辑：谷 岳

欧洲经济形势分析及政策建议^{*}

东 艳 黄 蒙

摘要：2017 年至 2018 年上半年，欧洲经济创下十年来的最快增速；但 2018 年年中后，内生动力不足与外部环境恶化两大因素叠加，使欧洲经济增速大幅回落。2019 年，全球经济疲软与贸易减速、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欧洲财政联盟前景不明、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等是影响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应该和欧洲继续拓展合作领域，携手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寻求利益共同点，共同推动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

关键词：欧洲经济 外部风险 结构性改革

作者简介：东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黄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

一、2018 年欧洲经济运行情况

（一）整体增速放缓

2017 年欧洲经济实现了十年来的最快增长，欧元区和欧盟国家经济分别增长 2.2% 和 2.3%，但 2018 年前两季度，欧洲经济增速从 2% 以上的区间回落，呈放缓态势。尤其是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大幅下滑，显示欧洲增长的内在动力明显减弱，欧洲经济的未来不容乐观。2018 年前三季度，欧盟（含英国）经季节与工作日调整后^①的实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8—2019 创新工程项目《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研究》的成果。

^① 文中大多数数据都经过了季节与工作日调整，为节省篇幅，若无特殊标注，下文不再说明。

际GDP 环比年化增长率分别为 1.58%、1.91%和 1.24%。欧元区增长放缓的态势与欧盟较为一致，且增速更低，三个季度的实际 GDP 环比年化增长率分别为 1.49%、1.75%和 0.62%。

表 1 2017—2018 年欧盟及欧元区季度实际 GDP 环比年化增长率及各组成部分贡献率

单位：%

	2017 年 一季度	2017 年 二季度	2017 年 三季度	2017 年 四季度	2018 年 一季度	2018 年 二季度	2018 年 三季度
欧盟（28 国，含英国）							
GDP 增长率	2.80	2.57	2.50	2.57	1.58	1.91	1.24
消费	1.32	1.45	1.44	0.81	1.26	0.95	0.90
私人消费	1.20	1.15	1.13	0.64	1.19	0.69	0.59
政府消费	0.12	0.29	0.31	0.17	0.06	0.26	0.31
总资本形成	-0.10	1.30	-0.41	0.44	1.16	1.32	0.43
固定资本形成	-0.25	1.70	0.25	0.88	0.27	1.01	0.14
存货投资	0.15	-0.39	-0.66	-0.44	0.89	0.31	0.28
净出口	1.57	-0.20	1.48	1.31	-0.83	-0.38	-0.09
出口	2.91	1.78	2.64	3.86	-1.14	1.40	0.49
进口	1.33	1.99	1.14	2.52	-0.31	1.78	0.58
欧元区（19 国）							
GDP 增长率	2.66	2.74	2.70	2.70	1.49	1.75	0.62
消费	1.05	1.37	1.35	0.62	1.13	0.77	0.40
私人消费	0.85	1.08	1.00	0.45	1.12	0.43	0.21
政府消费	0.19	0.29	0.35	0.17	0.01	0.35	0.19
总资本形成	-0.86	1.42	-0.37	0.61	0.95	0.90	1.26
固定资本形成	-0.67	1.68	0.05	1.00	0.11	1.28	0.15
存货投资	-0.20	-0.26	-0.42	-0.39	0.84	-0.37	1.11
净出口	2.51	-0.08	1.76	1.45	-0.58	0.05	-1.06
出口	3.36	1.99	2.50	4.36	-1.42	2.04	-0.20
进口	0.84	2.06	0.73	2.88	-0.84	1.99	0.87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Eurostat），2018 年 12 月 7 日。

从最终支出的构成看，净出口是 2017 年欧洲经济复苏的最主要动力。但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2018 年的外部需求不足，加之美国单边主义的保护性贸易政策使欧美间爆发贸易争端的风险日益增加，欧洲出口降幅明显高于进口，使 2018 年欧洲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由正转负。外部需求的骤降成为 2018 年欧洲经济疲软的首要原因。

内部需求中的消费一度对 2018 上半年的欧洲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2018 年三季度消费贡献率的迅速下滑也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私人消费的降幅异常明显，表明消

费者信心的持续改善遭遇重大挫折。

投资方面，2018 年的总资本形成与上年相比似乎有很大增长，成为支撑 2018 年欧洲 GDP 的中流砥柱。但查看明细项目，便会发现固定资本形成事实上并未增加甚至有所下降：欧元区 2018 年各季度固定资本形成的环比年化增长率平均 0.51%，与上年基本持平；欧盟 2018 年平均为 0.48%，甚至比上年下降了 0.16 个百分点。真正变化剧烈的是存货“投资”的由负转正：欧元区各季度存货的环比年化增长率由 2017 年的平均 -0.32% 变为 2018 年的平均 0.53%，上升了 0.85 个百分点；欧盟由 2017 年的平均 -0.33% 变为 2018 年的平均 0.49%，上升了 0.82 个百分点。因存货由负转正导致的总资本形成的增加，并不是一个值得乐观的信号，因为这反映了需求的增长低于企业预期。悲观预期只会使企业更加谨慎地对待扩张，优先去库存，从而减少投资，拖累经济增长。

因此，考虑到 2018 年的存货增长速度，欧洲经济的减速要比 GDP 统计数据所显示的更加剧烈一些（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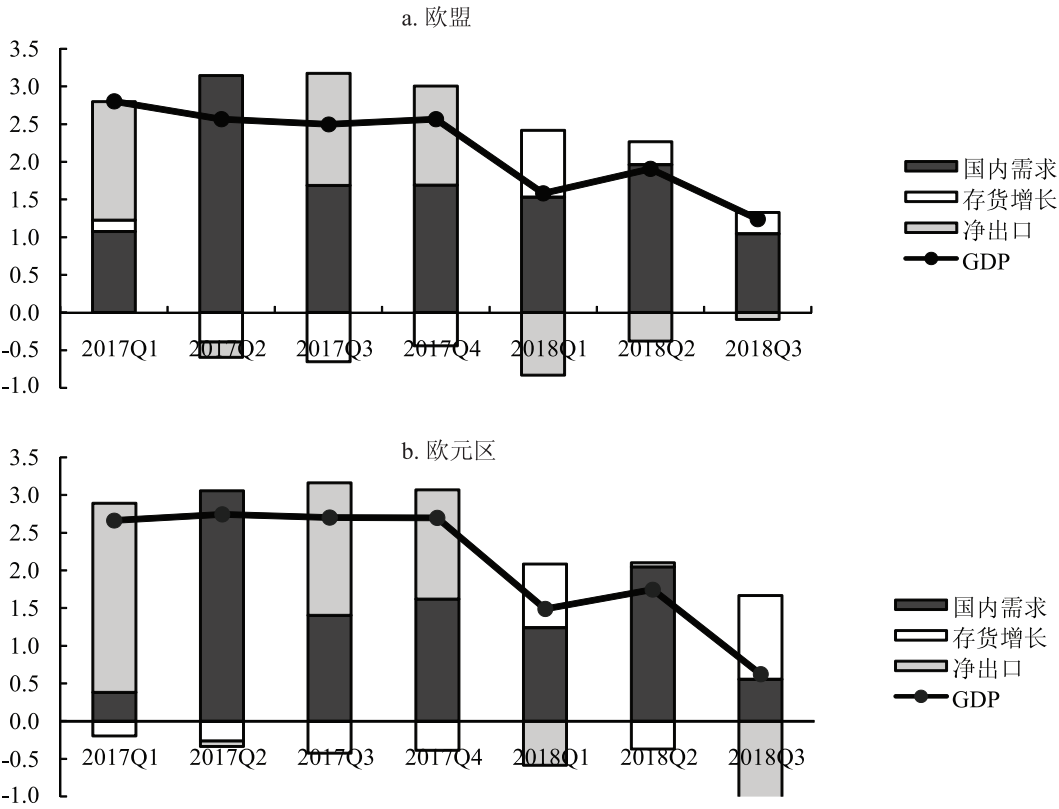


图 1 2017—2018 年欧盟 (a) 和欧元区 (b) 季度实际 GDP 环比
年化增长率及其组成部分 (%)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2018 年 12 月 7 日。
注：“国内需求”为不包含存货变化的消费与固定资产投资之和。

（二）主要国家增长情况

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 GDP 之和占欧盟 GDP 的 69.81%，其中，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四国 GDP 之和占欧元区 GDP 的 75.35%。因此，这五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对欧洲的经济增长态势起着主导作用。

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经济的走势常常承担着欧洲风向标的作用。在一二季度的增长减速之后，德国经济在 2018 年三季度遭遇罕见的环比负增长（-0.79%），为 2015 年一季度以来的首次萎缩。其中，出口的负增长是外部环境恶化的表现，并非折磨着德国一国；但私人消费的负增长即使在欧洲内部也是少见的，实实在在地表明德国内需的减弱。同时，受欧盟实施新的全球统一轻型车辆排放测试规程（WLTP）机动车排放认证系统的影响，德国汽车业三季度产出明显下滑。可以预见，以汽车为支柱产业的德国经济将进一步承压。

法国经济前两季度的表现不及欧元区的平均水平，实际 GDP 环比年化增长率只有 0.64% 和 0.62%。物价上涨、消费持续低迷是导致法国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同时，法国政府推行的结构性改革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交通等部门的罢工影响了法国商业系统的运行。但在第三季度欧洲经济大幅下滑的背景下，法国经济反而逆势上扬，实际 GDP 环比年化增长率达到了 1.57%。其中，私人消费和出口均有较大改善，存货的下降显示总需求超出了企业的预期，表明了法国经济的韧性。但年底爆发的黄背心运动范围广、烈度大、时间长，可能对四季度的法国经济造成一定负面冲击。

脱欧对英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显现，在欧洲经济表现超预期的 2017 年，英国经济增速远低于欧盟的平均值，且在 2018 年前两个季度延续了萎靡态势。英国采取了鼓励私人消费的措施，但劳动力市场的走弱和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实际工资下降，使私人消费增长放缓。英国与欧盟是否能达成脱欧协议具有不确定性，影响了投资信心。外部需求下降和全球贸易低迷也对英国经济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冲击。但英国经济在 2018 年三季度实现了 2.46% 的较强增长，消费增速也达到了近两年来的新高。英国三季度增长的原因与法国不同，主要是 4 月以来英镑汇率大幅下跌的结果，而这事实上更多地反映了市场对于英国脱欧前景的担忧。

意大利是这一年欧元区内增速最慢的国家，从 2017 年四季度到 2018 年三季度，意大利实际 GDP 环比年化增长率的平均值仅为 0.66%，比欧元区的平均水平低将近一个百分点。2018 年举行大选的意大利政局不稳，加之官僚主义、人口老龄化、债务负担重等因素，共同影响了经济发展。作为出口型国家，贸易冲突对其出口和工业生产也带来不利影响：2018 年意大利的出口出现明显下滑，对俄罗斯、中国的出口出现停滞。同德国一

样,意大利第三季度的 GDP 出现负增长,私人消费的负增长反映了其内需的乏力。

西班牙虽然同样在 2018 年进入了减速通道,但在经历了痛苦的结构性改革之后,西班牙经济是欧洲主要国家中表现最好的。2018 年前三个季度,西班牙的实际 GDP 环比年化增长达到了 2.24%、2.47%和 2.42%。西班牙具有开放的创新环境和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年轻劳动力较多,具有人力资源优势,这些因素支撑了其经济增长。

欧元区的其他国家中,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稳中有降。爱尔兰继续成为欧元区的增长明星。从 2017 年第三季度到 2018 年第二季度,爱尔兰的平均增速高达 9.35%,较高的市场开放程度、优越的营商环境、低企业税率的政策吸引了大量投资;同时,受英国脱欧的影响,一些高技术人才和高新技术企业进入爱尔兰,进一步促进了爱尔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表 2 2017—2018 年欧洲各国季度实际 GDP 环比年化增长率 单位: %

	2017 年 一季度	2017 年 二季度	2017 年 三季度	2017 年 四季度	2018 年 一季度	2018 年 二季度	2018 年 三季度
德国	4.51	2.22	2.35	2.16	1.47	1.82	-0.79
法国	3.27	2.65	2.52	2.83	0.64	0.62	1.57
意大利	2.00	1.34	1.77	1.19	1.27	0.66	-0.49
西班牙	3.30	3.54	2.58	2.94	2.24	2.27	2.42
荷兰	2.14	3.50	3.11	3.56	2.12	2.90	0.78
比利时	2.64	1.57	0.61	2.76	1.11	1.32	1.16
奥地利	2.24	2.50	3.05	3.32	3.82	1.06	1.30
爱尔兰	-17.95	15.16	17.83	10.67	-1.68	10.59	
芬兰	4.55	2.00	1.06	3.02	3.79	1.33	1.71
希腊	0.35	5.12	2.19	0.65	2.03	1.79	4.26
葡萄牙	2.99	1.54	2.31	3.24	1.65	2.26	1.34
卢森堡	2.05	0.66	2.74	5.85	3.79	0.08	
斯洛文尼亚	7.06	5.73	3.88	8.39	2.48	3.68	5.35
立陶宛	4.46	3.05	2.48	5.15	3.96	3.71	-1.23
拉脱维亚	6.29	5.67	3.96	3.44	6.10	4.82	6.93
塞浦路斯	2.07	3.72	4.47	3.93	4.34	3.10	3.24
爱沙尼亚	5.86	4.89	1.08	7.96	0.32	5.92	1.63
马耳他	5.16	4.35	8.07	2.40	3.84	10.60	15.23
斯洛伐克 ^①	3.15	3.48	3.52	4.53	4.26	4.84	4.48
欧元区 19 国	2.66	2.74	2.70	2.70	1.49	1.75	0.62
英国	1.76	1.04	1.41	1.48	0.37	1.62	2.46
波兰	4.75	3.93	4.84	4.75	6.52	4.64	6.85

续表 2

	2017 年 一季度	2017 年 二季度	2017 年 三季度	2017 年 四季度	2018 年 一季度	2018 年 二季度	2018 年 三季度
瑞典	0.81	4.81	2.90	2.47	3.12	2.00	-0.92
丹麦	10.28	-4.60	-4.44	3.23	1.57	0.61	2.72
捷克	5.48	9.74	2.15	2.75	1.93	2.76	2.31
罗马尼亚	10.22	6.40	8.44	1.58	1.02	6.33	7.75
匈牙利	5.79	4.65	3.94	5.51	5.22	4.41	5.49
克罗地亚	2.31	3.33	3.15	0.71	3.30	4.26	2.61
保加利亚	3.53	3.86	3.70	3.00	3.48	3.26	2.75
欧盟 28 国	2.80	2.57	2.50	2.57	1.58	1.91	1.24
瑞士	1.57	2.83	3.16	3.01	3.73	2.84	-0.90
挪威	1.77	3.19	2.14	0.81	1.30	1.81	2.33
塞尔维亚	1.18	2.44	4.75	2.24	8.38	4.11	2.13
冰岛	-7.58	-2.30	16.20	1.39	3.46	5.88	-0.03
阿尔巴尼亚	3.06	4.71	2.97	3.95	4.83	5.47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2018 年 12 月 7 日。
①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斯洛伐克的 GDP 数据仅经季节调整。

（三）经济运行指标分析

1. 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降至新低

欧洲的 PMI 较为直观地反映了欧洲经济的下行趋势。经历了一年多的上升后，欧元区 Markit 综合 PMI 从 2018 年年初开始下降，目前已降至将近 4 年来的新低点。观察主要国家制造业 PMI 数据，经济下行的形势则更为明显。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制造业 PMI 一路狂泄，特别是区域内最主要的制造业国家德国的制造业 PMI 达到 3 年来的新低，表明欧洲经济面临的需求形势极为严峻，大概率将进一步走弱。

2. 失业率下降趋势有反弹迹象

2018 年上半年的经济复苏助推了就业岗位的持续增加，使 2018 年上半年的劳动力市场状况继续好转，劳动参与率提升，失业率下降。从月度数据看，欧盟和欧元区的总体失业率分别从 2018 年 1 月的 7.2%和 8.6%下降到 2018 年 7 月的 6.8%和 8.1%；青年（25 岁以下）失业率从 2018 年 1 月的 15.8%和 17.6%下降到 2018 年 7 月的 15.1%和 17.0%。但进入 2018 年下半年后，随着经济增速的大幅放缓，就业状况也再次紧张起来。欧元区总体失业率从 2018 年 7 月至 10 月没能进一步下降，青年失业率则反弹了 0.3 个百分点。

分国别看，希腊、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南欧国家的失业率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继续保持了稳步下降的趋势，2018 年 9 月两国的失业率分别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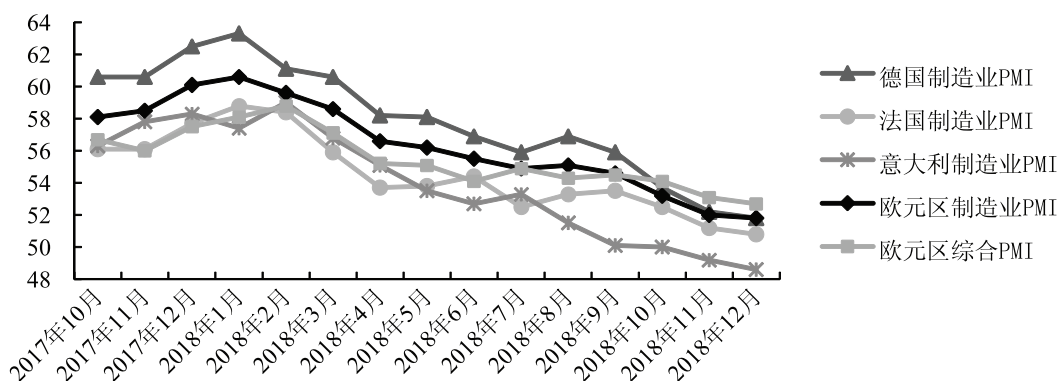


图2 2018年欧洲PMI月度数据

数据来源：IHS Markit，2018年12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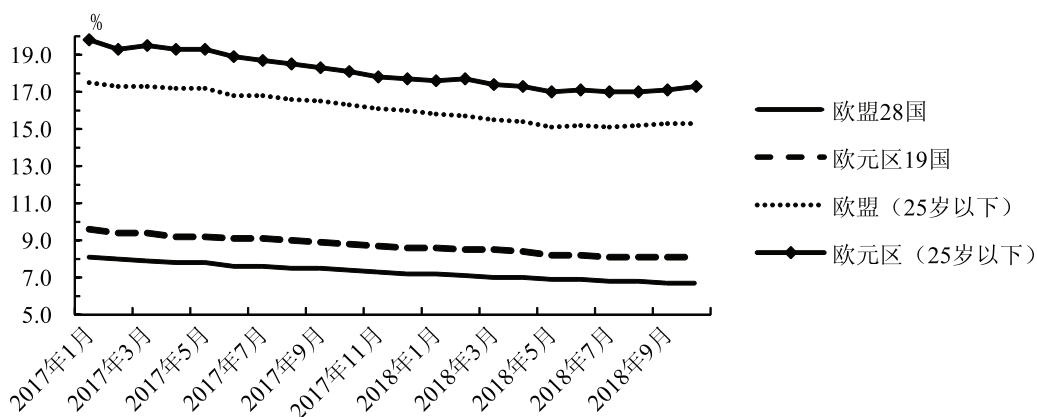


图3 2017—2018年的欧洲失业率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2018年12月7日。

18.6%和14.9%，比1月分别下降了2.0%和1.5%；9月青年失业率分别为36.6%和34.5%，比1月分别下降了5.3%和1.6%。希腊和西班牙两国都通过持续的结构性改革提高了产业竞争力，预计将保持稳定增长，由此带动失业率下降。而意大利、法国受经济增长趋缓影响，就业状况改善速度不快，相对于2018年1月，两国9月的失业率比2017年同期分别下降了0.8%（10月又反弹了0.3%）和0.2%，青年失业率分别下降了0.1%和0.6%。

3. 通胀和货币

欧元区各项经济指标中，通胀水平对欧洲央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整影响较大。2018年欧洲的消费价格调和指数（HICP）呈小幅上升趋势，并越过了2%的标志性界限，达到了欧洲央行设定的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标准。但观察HICP的构成可发现，2018年5月以来能源价格的快速上涨，才是推动HICP上涨的主要动力。受委内瑞拉生产崩溃、加拿大

和利比亚供给意外中断以及美国制裁伊朗的影响，2018 年 6 月，油价上涨至每桶 76 美元以上，到达了 2014 年 11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2018 年 6 至 10 月，能源价格指数同比增幅分别冲高至 8.2%、9.3%、9.1%、9.1%和 10.0%。此外，食品价格特别是谷物和奶制品价格的上涨也推动了 HICP 的上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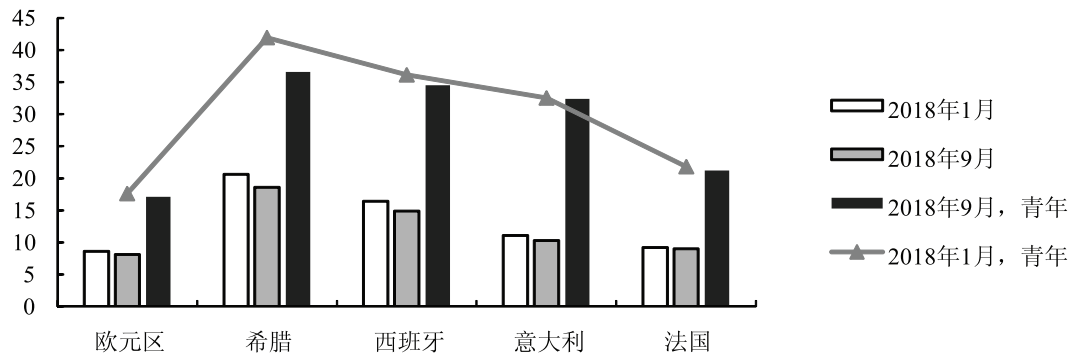


图 4 2018 年部分欧洲国家失业率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2018 年 12 月 7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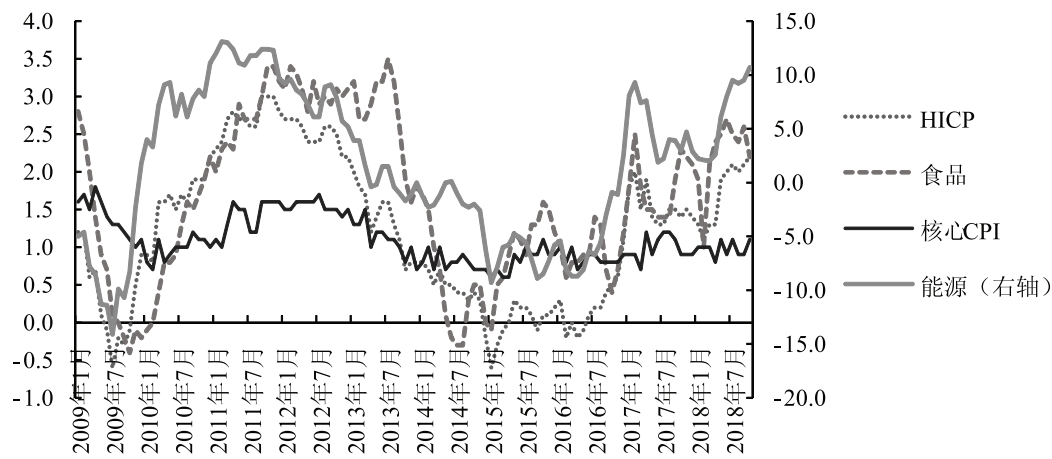


图 5 十年来欧元区通胀水平 (%)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2018 年 12 月 7 日。

但是，欧盟和欧元区剔除能源和非加工食品后的核心通货膨胀率（Core Inflation）在 2018 年前 10 个月的平均水平只有 1.2%和 1.1%，与 2017 年水平大致相当，仍处于较低的区间内。这表明欧洲的有效需求并不旺盛。因此，虽然欧洲央行在 2018 年秋季曾表示出于对金融市场泡沫化的担心，将收紧货币政策并大概率在 2019 年加息，并认为消费仍然强劲，加息不会对欧洲经济造成太大的影响。但随着欧洲经济恶化变得日益明显，欧洲央行终于在 2018 年底承认，鉴于欧洲经济复苏势头依然疲软，欧洲央行仍将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4. 赤字和债务

在经济稳步增长、较低的利率水平造成利息负担减轻等因素的影响下，欧盟和欧元区国家的财政状况继续好转。2017 年欧盟和欧元区的财政赤字率分别下降至 1.0% 和 0.9%，低于经济增长率。欧洲国家的政府债务余额与 GDP 之比（定义为政府部门杠杆率）小幅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2017 年欧盟和欧元区的政府部门杠杆率分别为 81.6% 和 86.7%，比上一年分别下降了 1.7 和 2.3 个百分点。希腊、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塞浦路斯、法国等国的政府部门杠杆率依旧处于很高的水平，分别为 178.6%、131.8%、125.7%、103.1%、98.3%、97.5% 和 97%。2018 年 5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新一期对成员国财政状况的半年期评估报告。报告认为欧盟整体的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但是各国的财政表现有较大的差异，仍需要对一些高债务国面临冲击时的潜在风险保持警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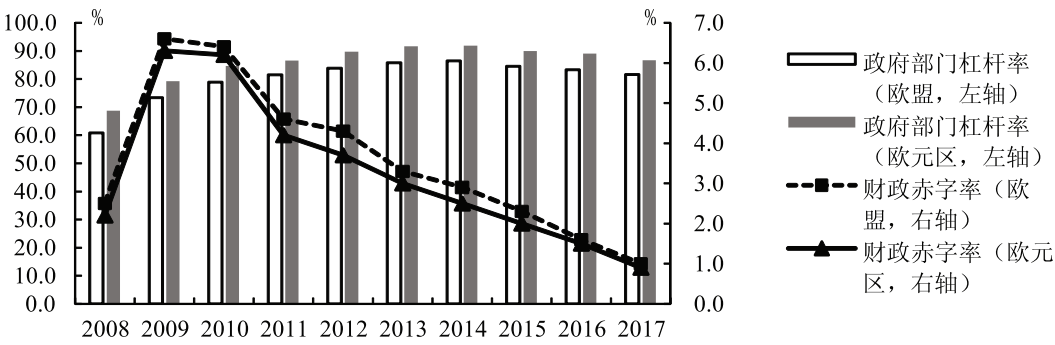


图 6 2008—2017 年欧盟及欧元区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2018 年 12 月 7 日。

二、欧洲经济面临的挑战

相比 2017 和 2018 年，2019 年的欧洲经济面临更多风险。主要包括：第一，世界经济下行，导致欧洲的外需进一步走弱，贸易战和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可能会打乱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不利于分工的深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第二，财政联盟的前景不明，推进必然涉及更广阔的制度层面和更复杂的国际协调，短期内难见成果。第三，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欧洲增长乏力。第四，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不稳定的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可能使欧洲经济受到政治变量的强烈影响。这些风险都可能会在 2019 年对欧元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冲击。

（一）全球经济疲软与贸易减速

欧洲是高度外向的经济体，欧盟和欧元区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分别为 91.6% 和 93.6%，

远高于世界 60% 的平均水平。因此，外部需求的强弱对欧洲经济增长有极大的影响。

2018 年欧洲经济减速的首要原因就是净出口的下降，而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2019 年全球经济表现将大概率延续 2018 年的态势。对欧洲来说，这意味着很难看到出口有多大改善的前景。而且，美国经济的触顶回落也是一个重大的风险因素。在明显过热之后，如果 2019 年美国经济下滑地比较剧烈乃至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就有可能与基本面疲软的状况形成叠加，引发欧洲经济的新一轮衰退。

另一方面，受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影响，世贸组织已于 2018 年 9 月将 2018 年全球货物贸易实际增速预期由 4.4% 调低至 3.9%，同时也将 2019 年增速预期进一步调低至 3.7%。主要由美国发起的这一轮贸易冲突打破了世贸组织致力营造的安全和可预期的贸易环境，给国际商业活动带来不稳定因素，降低了投资信心；还通过提高关税和原产地标准，阻碍中间品贸易发展、国际分工扩展和全球生产率的提升。这些都将对世界经济造成长期不利影响，相对而言更加外向的欧洲经济自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展望 2019 年，欧洲经济增速相对于 2017—2018 年上半年的高峰期将有较大跌幅。虽有通过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西班牙作为新的复苏增长点，但欧元区三大国德、法、意经济的减速将拉低整个欧洲的经济增长。同时，延续数年的失业下降势头基本停滞，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有逆转可能；私人消费增速骤降，反映出区域内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全球经济复苏减速和贸易摩擦的持续也将成为外向型欧洲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综合多方的预估，2019 年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增长率预计处于 1.7%~1.9% 的区间内。

（二）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

在经济衰退期，宏观经济调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需求端的经济政策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缓和社会矛盾，但绝不意味着对问题的全部解决。事实上，需求端政策的根本意义在于为供给端的结构性改革争取时间。只有通过结构性改革切实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最终解决欧洲增长乏力的长期问题，而这也是化解欧洲债务问题的根本之道。

相比美国、中国等经济体，欧洲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企业缺乏信心，导致投资不足，损害了长期生产率的提升。因而营商环境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实为欧洲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部分：这包括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投资友好的税收制度，开放的服务部门，放松市场监管以促进公平竞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对创业的支持和鼓励。这些方面的改进有望在中期提振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而且，数据已经清晰地表明，一些已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欧洲国家逐步恢复了较为强劲的增长，如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

但是，在政府债务居高不下、财政扩张空间有限的背景下，这些改革必然涉及有限财政资源的再分配，而福利支出的缩减会触及大多数人的蛋糕，招致强大的政治阻力。如果需求端政策^①可以在短期内做大经济总量，尚有可能通过对失意者的补偿推进上述结构性改革。但需求刺激的边际效果是递减的，因而留给欧洲政治家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时间并不多。

无论如何，在这个产业变迁空前剧烈的时代，市场呈现某种赢者通吃的结构，如果欧洲三番五次地浪费通过需求端管理努力争取来的时间，迟迟不推进卓有成效的结构性改革，则欧洲经济不仅会原地踏步，还有可能不进则退。

（三）欧洲财政联盟前景不明

欧元区有统一的货币却无统一的财政，是欧债危机爆发和欧洲经济复苏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有识之士无不志在推进欧洲财政的渐进统一。2018年6月，德、法发表《梅塞堡宣言》，将在2018年底前敲定一项新的《爱丽舍宫条约》，其目标是促进其经济、社会和财政趋同，为其制定新的工具。其中，建立欧元区统一的财政预算备受关注，被视为欧洲一体化的下一项里程碑。双方提议从2021年开始在欧洲联盟框架内建立欧元区预算，以提升欧元区的竞争力，促进趋同和稳定发展。但这一设想遭到荷兰等国的反对，德国内部也有不少反对意见。反对者认为，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统一预算将被用于帮助遭遇经济冲击的经济体，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在欧盟的语境中，常常被称为“北欧国家”）不得不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救助经济状况不佳的国家（常常被称为“南欧国家”），最终只会导致受援国更大的道德风险。

事实上，“北欧国家”与“南欧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重大的制度和文化差异，使得双方的产业竞争力在历史上就拉开了差距，统一的欧元只是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差异而已。“北欧”人认为“南欧”人散漫懒惰、坐吃山空，因而反感这种罚勤补懒式的无偿转移支付，是可以理解的。^② 欧洲财政联盟要顺利推进，应当有一系列配套的系统性改革。例如，通过削减福利、加强劳动市场的灵活性来消解民众懒惰的土壤。这类结构性改革一定是痛苦的，而且非常容易在民众中引发对欧盟的反感情绪。2018年底法国爆发“黄背心运动”，马克龙改革遭遇重大挫折，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财政联盟的推进必然涉及更广阔的制度层面和更艰难的国际协调，因而在短期内难见成果。

^①对目前的欧洲而言，主要是货币政策。

^②在“南欧国家”，青年的高失业率与大量简单体力劳动无人问津并存。在“北欧国家”看来，如果不是社会保障体系过于舒适，这样游手好闲的生活无法实现。

（四）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

近年来，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和逆全球化思潮的传播，欧洲不同国家之间、各国精英与大众之间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差异越来越大。由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协作程度的日益提高已经成为几十年来欧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顺利与否必将对欧洲经济前景产生重大影响。

2017 年，亲欧的马克龙竞选大胜，稳重的默克尔成功连任，德法领导人并肩携手领导欧洲前进，令人一度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充满信心。但仅仅一年之后，巴黎—柏林貌似坚强的轴心便已支离破碎。2018 年底，马克龙雄心勃勃打造“新欧洲”的设想因“黄背心”运动遭遇重大挫折，超低的支持率意味着其改革设想即使在法国内部也已经胎死腹中；默克尔则在长期执政后遭遇人心思变的政局，卸任党魁后凝聚共识的能力进一步弱化，而德国不甚景气的经济数据和难民危机留下的诸多后遗症，也会让默克尔更多地分心于德国的内部事务。德法两国政治领导人的弱势，意味着在受到反对党和民粹主义的掣肘时，两国政治议题将更多地聚焦于国内，推进事关欧洲前途命运的重大议题的能力将大大减弱。英国脱欧悬而未决对欧洲的发展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2018 年大选后组建意大利联合政府的两党虽一左一右，但均持疑欧态度，制定了刺激宏观经济但违反欧盟财政改革方向的预算案，一度引发外界对欧盟是否还能维持团结的忧虑。作为“欧猪五国”中体量最大的一个和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一旦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将会对欧洲经济的稳定发展乃至欧洲一体化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不仅如此，作为一个负面教材，这也会使更多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的欧盟成员国群起仿效。因此，当意大利新当选的联合政府在 2018 年 10 月提出增加财政赤字的预算案后，欧盟断然将其退回，坚决维护欧盟的财政纪律。这也是欧盟成立以来首次强制要求一个欧元区国家修改该国的财政预算。迫于欧盟的压力，意大利在年底终于修改了预算案，但法国又出现了触发财政赤字上限的危险。在“黄背心”运动中，马克龙被迫向民粹主义妥协，放弃了增税计划。

在中东欧国家，右翼执政渐成趋势，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奥地利、匈牙利莫不如此。随着中东欧经济的加速，中东欧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民族主义理念，有撕裂欧盟的潜在可能。

而且，欧洲经济在 2018 年三季度再次进入下行周期，使得欧洲各国间和各国内部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展望 2019 年，欧洲将继续遭受民粹主义和疑欧思潮的折磨，恶化的经济形势导致欧洲一体化进程倒退的风险也增加了。

三、欧洲经济形势对中国的影响及相关政策建议

民粹主义逐步在全球蔓延，对欧洲的影响也逐步显现。西方内部日趋撕裂，民粹主义具有极端平民化倾向，表面上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在实际政策中通过保护主义等方式来体现，影响了全球经贸的稳定发展。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欧洲展示出两面性：一方面，与中国在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进行合作；另一方面，积极回应和支持美国，对中国进行指责，如在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5 月，美欧日贸易部长三方会议共发布四次联合声明，就第三国非市场导向政策和做法、产业补贴和国有企业、强制技术转移政策和做法，以及钢铁产能过剩等问题对中国进行施压。此外，欧盟 2019 年 3 月 5 日通过了《关于建立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框架的条例》，显示出在全球保护主义增强的情况下，欧盟对外资的态度也更加谨慎。中国应该注意到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中国应该和欧洲继续拓展合作领域，携手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寻求利益共同点，共同推动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

欧洲财政联盟进程中的问题表明，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各国让渡权利的损失与取得合作收益之间需要寻求最佳平衡点。欧盟通过混合分享，将贸易谈判的权利一部分设定为专属，一部分归属于成员国，采取有限通过的表决形式。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权力分配为全球合作提供了一个参考，但全球化中的双边和区域合作模式可能是多样的，关键是在合作中能平衡各方的利益，并保证市场主体权益。

欧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中国一方面需要积极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同时，中国应继续通过“16+1”次区域合作机制及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双边合作机制来推动中欧关系发展。2019 年意大利和中国刚签署了“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就引发了欧洲其他国家及美国的批评。意大利是目前欧元区内经济增速最慢的国家，通过创新合作方式来提升本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是其选择和中国深化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中欧合作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双方需要进一步深化合作领域，增加互信，取得更多共识。

参考文献：

1. 弗里茨·W·沙普夫、姜文：《欧洲货币联盟、财政危机和民主问责失效》，《德国研究》2012 年第 1 期。
2. 迈克尔·海瑟：《浅谈欧洲经济的长期发展前景》，《上海保险》2016 年第 1 期。
3. 田德文：《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原因与走势》，《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 年第 2 期。

4. 李茁：《欧洲难民问题对欧洲经济的影响》，《国际观察》2017 年第 2 期。
5. 穆婕：《“英国脱欧、民粹主义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学术研讨会综述》，《欧洲研究》2017 年第 5 期。
6. 闫斐：《欧洲经济复苏任重而道远》，《清华金融评论》2017 年第 9 期。
7. 孙杰：《欧洲经济直面三大挑战》，《中国外汇》2017 年第 11 期。
8. 田德文：《欧洲保守派的一张“大字报”》，《世界知识》2017 年第 22 期。
9. 杨栋：《法国：被低估的欧洲经济大国》，《金融博览（财富）》2018 年第 3 期。
10. 严少华：《法德中心重启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中国欧洲学会 2018 年年会综述》，《欧洲研究》2018 年第 4 期。
11. 张晓通、赖扬敏：《历史的逻辑与欧洲的未来》，《欧洲研究》2018 年第 5 期。
12. 赵柯：《德国主导欧洲经济：能力还是运气？》，《中国投资》2018 年第 9 期。
13. 张敏：《欧洲经济实现十年来最快增长》，《世界知识》2018 年第 11 期。
14. 东艳：《欧洲经济：内生动力减弱，外部风险增加》，张宇燕主编《2019 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
15.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uropean Semester, 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economy-euro/economic-and-fiscal-policy-coordination/eu-economic-governance-monitoring-prevention-correction/european-semester_en.
16. Bundesregierung. Meseberg Declaration: Renewing Europe's promises of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2018. <https://archiv.bundesregierung.de/archiv-de/meta/startseite/meseberg-declaration-1140806>.
17.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onomic Bulletin Issue 6/2018, 2018.
18.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onomic Bulletin Issue 8/2018, 2018.
19.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Challenges to Steady Growth, 2018.
20.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Economics Forecast: Autumn 2018, 2018.

责任编辑：沈家文

借鉴国际组织运营模式 推进“一带一路”城市合作

邱爱军 王 瑾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了解国际化的话语体系，采取国际化的运营模式，建立国际化的合作机制。国际组织作为从事国际发展合作的机构，在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其模式与经验对“一带一路”城市发展合作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本文剖析了“一带一路”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选取若干代表性国际组织，对其项目运营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并就如何借鉴国际组织运营模式推进“一带一路”城市国际发展合作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国际组织 一带一路 运营模式 城市发展合作

作者简介：邱爱军，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王 瑾，西安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助理研究员。

国际发展合作的核心是“发展”。1981年世界银行在中国的第一个贷款项目，既不是修路，也不是架桥，而是用于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8所重点高校的“大学发展项目”。^①2018年7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世界银行前行长金墉时指出：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在国际规则基础上，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促进国际发展合作。^②

^①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30年征文：《改革开放结出的丰硕成果——记世界银行贷款第一个中国项目暨中国教育与世界银行合作30年》，财政部网站，2010年9月3日。

^②刘华：《习近平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加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新华网，2018年7月16日。

展取决于观念理念的改变、取决于知识技能的改变、取决于合作方式的改变，国际组织作为从事国际发展合作的机构，积累了丰富的發展项目经验，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城市国际发展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一带一路”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一倡议已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明确投出了支持票和信任票。通过“一带一路”合作，东部非洲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马尔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白俄罗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轿车制造业，哈萨克斯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出海通道。“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合作等领域的成就斐然，但同时“一带一路”国际发展合作还面临新的挑战。

（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展迅速，对沿线国家的城市了解不足

2011 年 3 月 19 日，中国重庆到德国杜伊斯堡的“渝新欧”集装箱货运班列发车，标志着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铁路货运新模式——“中欧班列”正式开通。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统计数据，截至 2018 年年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12000 列，中国境内开行城市 56 个，通达欧洲 15 个国家的 49 个城市。^① 但是，媒体报道中有关中欧班列开通的信息较多，对中欧班列国外通达城市的情况介绍不多。从“中国‘一带一路’网”的“国际合作”专栏看，只有“一带一路”国家的简要信息，既没有地方主题栏目，也没有关于沿线城市的情况介绍；在“基础数据”栏目，虽然介绍了一些“一带一路”援助项目信息，如 2017 年 9 月中国派出的医疗队赴巴基斯坦提供援助，在巴基斯坦瓜达尔医疗急救中心半年接诊中巴患者 1000 多人次。^② 但对瓜达尔的整体医疗状况并未介绍。事实上，合作发展项目需要更多地了解合作对象，了解沿线国家的城市。

（二）“一带一路”国际发展合作需求强烈，资金支持运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2017 年 5 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全球有 70 多个国际组织派代表参会，其中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国际组织多达 29 家。习近平主席在论坛开幕式上承诺：中国将在未来 3 年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和国际组织提供

^①大陆桥物流联盟公共信息平台：《2018 年中欧班列开行发运数据及分析总结》，物通国际物流网，2019 年 1 月 9 日。

^②刘尧：《“一带一路”医疗合作拓展全球 3 年内将落实 100 个康复助医项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 年 8 月 14 日。

600 亿元人民币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 10 亿美元；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 10 亿美元。^①一年多来，签约国际组织业已开展了一系列促进“一带一路”合作的活动。如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主办的“一带一路：发展绿色经济搭建城市可持续发展之桥”活动广受欢迎，参会国家从 2016 年的 25 个增加到 80 个；城市从 50 个增加到 150 个。^②但是，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成立时间不长，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战略规划、政策指导工作还有待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国际发展合作项目资金申请条件和程序还有待完善，社会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发展合作项目的机制还有待建立。

（三）“一带一路”城市结对数量多，发展合作项目的数量还不够多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6 年来，各地纷纷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支持企业“走出去”投资、支持与沿线城市结对合作。例如，截至 2018 年 6 月，安徽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所有 14 个联邦主体建立了直接交往关系，双方各类互访团组累计 300 余批次，举办人文活动近 100 场；截至 2018 年 12 月，福建与泰国孔敬府、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越南广宁省等正式结为省级友城，省、市、县三级国际友城超过 100 对。^③目前的交流活动政府主导色彩较为突出，多以促进贸易往来和招商引资为主，一些企业虽然已经开始资助发展项目，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塞内加尔等国实施了“打井工程项目”，但是，社会对发展合作项目的重视还不多，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需要相比，发展项目还远远不够，亟需将发展项目经验总结提炼，复制推广，让沿线更多的人民受益。

（四）企业“走出去”数量多，国际发展合作能力建设不足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稳步推进。据商务部信息，截至 2018 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共在 46 个国家建设初具规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 113 家，累计投资 348.7 亿美元，入区企业 4542 家，中国在外各类劳务人员 99.6 万人。^④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说到“讲好中国故事”，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宣传部门、使团使馆、专家学者，事实上，这些数量巨大、常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工作

^①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新华网，2017 年 5 月 14 日。

^②葛俊俊：《2018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主题日暨“一带一路”跨境合作论坛于上海成功举行》，人民网，2018 年 4 月 20 日。

^③国家发改委：《一带一路华东篇：突出先发优势，谋求创新发展》，中国新闻网，2019 年 2 月 21 日。

^④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谈上半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情况》，《中国日报》2018 年 7 月 20 日。

的一线人员才是中国故事的重要“宣讲者”，如何发挥在外企业员工的作用还有待探索。

国际组织在探索国际发展合作项目方面有庞大的网络，有灵活多样的筹资机制，有成熟的运营模式，有专业权威的专家队伍。了解这些资源和模式，对“一带一路”发展合作项目的开拓与实施极为重要。

二、国际组织发展项目的运营模式

国际组织通常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其核心特征是从事国际合作，通常以联盟或联合体的形式存在，或者依靠成员间的合作来谋求共同利益，或者通过成员间合作推动共同理念的落实。根据《国际组织年鉴》，20 世纪初，全球仅有国际组织 200 余家，20 世纪 50 年代发展到 1000 多家，截至 2018 年全球已有国际组织 7 万余家。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经济论坛、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等国际组织的实践看，在城市国际合作领域，国际组织发展项目的主要运营模式如下。

（一）国际组织通过庞大的会员网络运作项目

1. 国际组织具有强大的国家会员网络

联合国是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现有会员国 193 个，几乎覆盖全球所有国家，我们仅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成立于 1946 年，使命是帮助世界各地的儿童实现他们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基本权利。截至 2017 年，儿基会在 190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工作，在 126 个国家设立了办事处，1979 年儿基会在北京设立驻华代表处。儿基会通过和政府签署“发展援助框架”和“国别合作方案行动计划”，一方面确定其战略指引和工作重点领域，另一方面表明双方的郑重承诺，从而保证了后续工作得到所在国政府的支持，包括城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本周期中国“发展援助框架”的重点领域目标之一就是提升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效果，使中国和世界均从国际合作中受益。^①

2. 国际组织具有广泛的城市会员网络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非政府组织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活跃。20 世纪初期，国际非政府组织只有 100 多家，到 21 世纪初期，已达到 40000 多家。^② 到

^①资料来源：《联合国驻华系统与中国政府联合发布〈2016—2020 年联合国对华发展援助框架〉》，<https://news.un.org/zh/story/2016/01/249912>。

^②邱伟、刘力：《透视日益走近中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学习月刊》2005 年第 5 期，第 46～47 页。

2010 年，已有 3420 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联合国的咨商地位。^① 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有着遍布全球的会员网络和信息网络。我们仅以聚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宜可城为例。宜可城是致力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化的城市 and 地方政府合作组织，致力于通过推动地方行动，支持城镇坚持低碳发展和韧性建设。目前在全球五大洲设有 22 个办公室或代表处，有来自全球 124 个国家的 1500 多个会员城市或地方政府，项目活动涉及 3500 多个城市。宜可城的项目活动区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契合度较高。2018 年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在北京设立代表处。

3. 国际组织具有权威的行业意见领袖网络

国际组织大多都搭建了各种各样的交流平台，其中，世界经济论坛就是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中最具影响力的交流平台之一。1971 年，现任论坛主席、日内瓦大学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在瑞士日内瓦创建了世界经济论坛。世界经济论坛是致力于推动公私合作的非官方、中立的国际组织。论坛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准战略合作伙伴、行业合作伙伴、地区合作伙伴、机构会员、论坛会员、技术先锋等会员形式开展与机构和企业的合作，并构建强大的会员网络。其中，最大的网络是战略合作伙伴网络，由 1000 家全球领先的企业组成，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地区和行业，致力于改善全球状况。在此基础上，论坛还设立了专家网络、全球未来理事会、全球杰出青年、全球青年领袖、技术先锋、文化领袖、青年科学家等七大社区，汇聚思想精英，促进交流沟通。

(二) 国际组织形成了以服务为导向的、灵活多样的筹资模式

1. 政府资助为主，项目募集为辅的筹资模式

联合国作为全球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其附属机构的经费以联合国成员缴纳联合国会费为主，但企业和私人捐赠资助的比例也在逐步上升。儿基会的资金来源分为三个渠道：一是成员国家政府资助，通常以会费的形式体现；二是私营部门包括个人的捐助，通常通过儿基会国家委员会或其他形式募集，包括小微捐赠、贺卡和礼品销售、企业合作伙伴专项捐助等；三是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政府间机构和非政府机构的资助。2017 年儿基会的预算总规模为 65.77 亿美元，来自政府及政府间机构的资金仅占到 59%。

2. 城市赞助、项目申请、技术服务的筹资模式

会员费收入。宜可城作为一个非政府国际组织，虽然没有固定的政府捐助，缺乏联合国系统的稳定性筹资，但 1500 多个会员城市按照所在区域、人口规模和人均 GDP 缴

^①马芳芳等：《国际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联系机制研究》，<http://www.chinanpo.gov.cn/700101/92592/newswjindex.html>。

纳年费。办公室费用一般由所在城市赞助设立，如 2012 年首尔市政府资助设立了宜可城东亚秘书处（首尔）。申请项目经费。活动经费主要通过申请项目获得，来源包括：地方政府、国家政府、欧盟、多边银行、基金会等。技术服务费收入。通过提供培训、组织活动、撰写案例研究报告等方式获得技术服务费。例如，2016 年，贵阳市成为宜可城在中国的第一个正式会员城市，此后，宜可城与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合作，组织召开了绿色循环经济论坛，开展案例交流分享，应用宜可城积累的可持续城市网络，推动了贵阳在低碳、绿色、循环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化。

3. 个性化年费、定制报告、品牌营销的筹资模式

个性化年费收入。世界经济论坛虽然是一个非盈利机构，但因其服务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其筹资模式也较为独特，会员年费并不统一，而是量身定制。例如，论坛主要资金来源是企业会员费，论坛会根据企业的不同需求，为其量身定制多样化的参与方案，从战略合作伙伴到普通会员，会员费也从 6 万瑞士法郎到 60 万瑞士法郎不等。研究报告收入。在定期会议的基础上，为了更好的提供智力支持，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团队也通过出版物等形式为利益相关方提供竞争力、性别平等、信息技术、包容性增长与经济发展等四大领域的前沿数据分析报告，收取一定费用。品牌合作收入。城市申请举办世界经济论坛区域会议，如阿联酋的全球议程峰会、中国大连和天津的新领军者年会，由举办地城市提供会议支持费。此外，论坛还接受企业或私人的捐赠及赞助等。总体上看，世界经济论坛聚焦论坛，强化品牌服务，创造了不菲的收入。据统计，2015 年论坛收入达 2.05 亿瑞士法郎。^①

（三）国际组织探索出行之有效的项目运作模式

1. “种子钱”、试点示范、渐进式推动政策改革

用“种子钱”组织示范性活动，发挥试点的引领作用，由点到线，由线及面，渐进式推动政策改革是联合国系统国际组织主要的项目运作模式。儿基会在中国与原国务院体改办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现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共同实施的“家庭与社区支持”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项目本着“以儿童为中心、以家庭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的原则，为儿童及家长提供支持，具体运作方式如下：

一是通过参与式《儿童权利公约》培训，转变了成人对儿童的态度和看法，促进了儿童对社区事务的参与。例如，北京试点怀柔区杨宋镇组织镇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镇

^① 苏宁：《世界经济论坛：引领全球议题的平台型智库》，光明网，2015 年 5 月 4 日。

司法所工作人员参与了《儿童权利公约》培训后，积极支持试点引进了新西兰家庭圆桌会议机制，创新了社区儿童矫正工作方法，为问题青少年提供了更加人性化的帮助教育方式。

二是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增强了社区对儿童的支持与服务。如上海试点卢湾区打浦桥街道引进了儿基会开发的“小脚印”儿童早期教育社区机制，在社区提供了分享早教理念平台、开辟了社区“同伴活动”的场所等创新做法，为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三是通过实践与研究相结合渐进推动政策改革。儿基会一直强调项目资金是“种子钱”，要通过项目试点延伸项目干预，逐步推进对政策的影响。比如“家庭与社区支持”项目全过程贯穿了社会工作职业化政策的推进，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实行。

2. 创新理念、自下而上、实验推动的运作模式

开展创新性城市实验活动可以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低碳出行方式等理念在社区活动中实现“植入式”宣传，让社区人成为主动宣传者，从而实现自下而上的理念创新。宜可城在韩国开展的“无车月”活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2013年10月，宜可城与韩国水原市 Haenggung-dong 社区（简称 H 社区）合作举办了第一届“无车月”活动，倡导居民尝试在一个月内杜绝汽车出行，采取汽车以外其他更为低碳的绿色出行方式。由于“无车月”活动实施难度较大以及可能降低居民生活的便利性，项目在征询初期遭到了居民的反对和质疑。但是水原市政府通过投资道路基建、翻新商店住宅外立面、拓宽人行道等措施，提升行人和骑行者的体验，逐渐获得居民的支持。据统计，水原市政府为“无车月”活动共投入 1050 万美元，其中 2/3 用于基建。这些投入一方面为社区发展增添了信心，另一方面也直接推动了“无车月”活动的顺利实施。^① 活动期间，人们使用自行车、新型平衡车、脚踏车等绿色方式代替汽车出行，亲身体会到了绿色出行的舒适度，也看到了低碳生活的可能性。活动结束后，低碳生活方式在社区得以延续，继续开展“无车日”活动，并限制社区街道机动车行驶速度。绿色出行方式不仅减少了碳排放，也提升了社区商业价值，地产也随之升值。

通过宜可城在其会员网络以及相关国际合作平台对水原市实验创新活动的推介，水原市已成为生态出行的国际学习中心。2015年10月，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一个社区也举行

^①冯婧：《禁止开车的社区：一场生态出行戏剧与三次元的改变》，澎湃网，2015年8月14日。

了“无车月”活动，参与者多达 15000 余人。^①

3. 搭建思想交流平台的商业化运营模式

国际合作的务实推进需要深度的思想交流，而深度交流需要借助有效的交流平台。世界经济论坛就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交流平台搭建型非政府国际组织。论坛采取了完全商业化的运营模式，为互联网+时代知识服务产品商业化运营提供了参照。

汇聚行业精英企业代表。世界经济论坛的会员企业一般都是其所属行业或国家中的顶尖企业，行业涉及建筑、航空、科技、旅游、食品、工程和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这些会员企业对本行业或所在区域行业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世界经济论坛对全球发展趋势的判断通过会员企业会影响辐射到多个国家、地区 and 行业。

聚焦冬季达沃斯。每年年初，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达沃斯小镇举办年会，又称冬季达沃斯，每年邀请多个国家的首脑、央行行长、企业总裁、全球知名人士，共同商讨全球经济热点，探讨和制定全球、区域和行业议程。截至 2019 年共举办了 48 届年会。达沃斯为参会的会员企业、政府代表、学术界代表等提供了高端交流平台，已成为讨论全球问题的权威平台，进而间接促进了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

推出精细化产品。除了冬季达沃斯论坛，世界经济论坛每年还推出了新领军者年会、全球议程峰会、行业战略会议、区域和国家战略会议等活动。同时通过项目合作、专题研究和虚拟网络平台交流的形式促进行业和会员伙伴深入交流。经过多年的发展，世界经济论坛已形成了会议加研究、实体加虚拟、跨越多个行业和领域的多层次互动交流网络，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非官方交流平台之一。

（四）国际组织积累了权威专业的能力建设资源

1. 实地经验、需求导向的能力建设资源

儿基会的能力建设不仅是系统性的，而且以项目为依托。1979 年至今，儿基会已在中国开展了 160 多个项目，培养了大批儿童发展项目的专业人员。2017 年 5 月 14 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国政府与儿基会签署了《关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② 2018 年 6 月，儿基会现任执行主任亨利埃塔·福尔指出：儿基会与各国政府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建立了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在促进各年龄阶段儿童健康成长与发展方面，具有专业的项目设计和实施经验、完备的项目资金监测评估体系，

^①冯婧：《韩国那个禁止开车的社区，现在怎么样了？》，中国公路网，2015 年 12 月 13 日。

^②刘杨：《商务部代表中国政府与有关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http://www.gov.cn/xinwen/2017-05/14/content_5193701.htm。

愿就此为中国提供相关支持。^①

2. 聚焦主题、深耕专业的创新型能力建设资源

国际非政府组织直接掌握的资金虽然不多，但拥有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源和遍布全球的信息网络，不断推出创新的理念和解决方案。在 1992 年里约地球峰会上，宜可城因其致力于推进全球城市和地方的可持续发展的成就，作为全球唯一授权的地方政府网络观察员参会。1992 年，宜可城提出 21 世纪地方议程，致力于推广参与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是全世界首个以此作为主题的全球性活动；1996 年，宜可城开展“城市气候保护行动”，是全球第一个及最大的地方政府反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推广活动，后更名为“绿色示范型城市”；2006 年，宜可城在会员城市探索地方最佳实践，实验了先导性生态预算工具。

3. 政商学界资源汇聚

世界经济论坛通过召集全球优秀商界领袖、政府首脑、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国际组织代表、青年领袖、技术创新者等，共同研究和探讨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公私部门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这些行业精英是世界经济论坛各项活动及其社区工作背后的主要推动力，这些合作伙伴期待通过互动交流推动积极变革。2017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国政府与世界经济论坛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2018 年，在世界经济论坛冬季达沃斯和天津夏季达沃斯上均设立了“一带一路”分论坛。世界经济论坛已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一带一路”的重要渠道和平台。

三、推进“一带一路”城市国际发展合作的建议

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促进全球经济合作的重要手段，也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模式的重要方式。习近平主席还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一定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对国际组织发展合作运营模式的分析显示，国际组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庞大的城市会员网络、灵活多样的筹资机制、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专业权威的人才队伍。借力国际组织发展，将有力推进“一带一路”城市国际发展合作。

^①亨利埃塔·福尔：《在“‘一带一路’倡议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高级别研讨会上的发言》，http://www.sohu.com/a/236184659_614554。

（一）借鉴国际组织会员网络机制，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国际合作联盟

发挥国际组织分支机构多（如儿基会）、会员城市多（如宜可城）、行业覆盖广（如世界经济论坛）的优势，联合城市发展相关的国际组织，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国际合作联盟。以联盟为平台，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城市为基础，收集整理“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基本信息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实践案例，形成“一带一路”城市资源库，并与沿线城市在线共享资源；以联盟为平台，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问题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交流机制，在成果交流的基础上开展合作研究，加强对沿线国家城市的认识与理解；以联盟为平台，组织“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论坛，共商“一带一路”建设大计，将“无车月”“儿童友好社区”等先进理念和做法广泛传播，并在交流的基础上，开展需求评估与项目对接，使“一带一路”城市发展合作务实落地。

（二）借鉴国际组织筹资运作模式，设立“一带一路”城市发展合作子基金

依托国际组织推动“一带一路”城市发展合作，需要有较为稳定的资金支持。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明确指出：中国政府将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 10 亿美元，用于发起中国—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合作倡议；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 10 亿美元，共同推动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国际合作项目。但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发展合作需求相比，资金还远远不够。从儿基会、宜可城、世界经济论坛的发展项目运营经验看，以服务或项目为依托进行市场化筹资不失为一种好的方式。为此，建议在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指导下，依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丝路基金等，设立“一带一路”城市发展合作子基金。一方面可以针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提出的城市发展合作热点议题设立具体项目，项目可以向全球开放，供各类国际组织申请，优胜劣汰；另一方面可以借鉴联合国系统项目实习生计划，让沿线青年从“干中学”。基金可以资助有志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青年到国际组织工作，特别是到国际组织在“一带一路”国家的项目中工作学习。培养一批会讲外语、会用外语、会以国际化的方式实施项目的青年才俊，未来，这些青年将成为“一带一路”城市国际发展合作的创新推动者。

（三）借力国际组织项目运营模式，在沿线城市孵化一批国际化的非盈利机构

国际组织既有全球视野，又有规范成熟的运营模式、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还有覆盖沿线国家的实施项目，由此，国际组织无疑是非盈利机构创新创业的最佳“导师”。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救助儿童基金会（香港）等国际组织培育的云南瑞丽妇女儿童中心，已在缅甸木姐市（瑞丽市友好城市）赛木小学开设营养早餐，为 105 码孤儿院开设

“1个鸡蛋的营养膳食计划”，为将来想到中国务工的孤儿提供汉语教学；^① 受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长期支持的甘肃自然资源能源研究所，已在巴基斯坦推广移动便携式太阳能灯，为基础设施条件差的贫困地区提供照明解决方案，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② 建议通过国际公开招标，在“一带一路”沿线城市遴选一批有志于“一带一路”国际发展合作非盈利机构开展“园区式”孵化。

（四）借助国际组织智力资源，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发展合作能力建设

“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要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来共享，另一方面要通过相互的了解和理解达成共识。“共商共建共享”不应只停留在官员专家学者的宣讲中，而应落实到每个具体的项目中，应落实到能力建设中。“共商共建共享”的能力建设要从一般的培训向以政策研究为基础的实践案例式培训转变。一是要借鉴国际组织案例式培训模式，遴选专业化机构与国际组织共同开发“一带一路”参与式培训课程；二是要借鉴国际组织“知识分享”项目的经验，通过国内外专家共同研究，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国际化，分享给沿线国家；三是要借力国际组织行业领袖资源，开展“培训培训者”项目，选拔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国际发展合作基础的“培训者”参加培训，并研发图文并茂的培训小册子；四是经过培训的“培训者”前往“一带一路”项目所在城市实施培训。既要让“共商共建共享”的思想成为“一带一路”一线近百万中国公民的共识，也要让项目在建国家的人民切切实实感受到“共商共建共享”的好处。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公布的《2018年世界城市化趋势》报告显示：世界上5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预计到2050年，全球城市化率有望达68%。^③ 可见，城市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一带一路”国际发展合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成功。“一带一路”城市国际发展合作的意义不仅仅是在沿线实施一个又一个发展项目，而是将“发展”的新理念、新方法带到“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激发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激发城市人民自身的内在潜力，让“共商共建共享”真正从理念落实到行动中，从政府倡议、政府行动转变为企业的行动、人民的行动。

责任编辑：沈家文

^①杨腾荣：《瑞丽市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关爱缅甸儿童》，缅华网，2016年12月23日。

^②卢文茂：《甘肃自然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未来可期》，中国兰州网，2018年6月21日。

^③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8世界城市化展望》，联合国网，2018年5月16日。

中国软件出口现状及趋势展望

杜振华 米师悦

摘要：软件出口能力的大小是表现软件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中国软件出口增长率在经历 2016 年低谷之后，开始由两位数字增长变为个位数字的增长，并开始了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数字化转型和云转型提升工程。由此必须解决云外包、建立标准化软件和服务体系、与软件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软件工程师面对人工智能的转型升级问题，为未来数字经济发展如智能制造、跨境电子商务、云服务等提供更多的软件出口和离岸服务外包。

关键词：软件出口 产业现状 云外包 数字经济

作者简介：杜振华，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科主任；
米师悦，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经济走向数字经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已成为引领科技创新、驱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核心力量与核心支撑。一方面，软件技术加速向网络化、平台化、智能化方向演进，推动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培育形成开放创新生态；另一方面，软件技术加速制造业转型升级，不断催生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等制造业新模式新业态，给诸多行业带来了颠覆性变化，特别是使我国软件出口出现云平台、云模式和云外包等新变化、新模式和新形态，软件业主要通过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引致效应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一、中国软件出口现状及特点

（一）软件出口现状

软件出口继续呈现增长势头。2018 年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 3.78

万家，累计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63061 亿元，同比增长 14.2%。中国软件业创新能力持续增强，2018 年重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10.4%，研发投入增长 20.4%，软件著作权登记量突破百万件量级，达 1104839 件，同比增长 48.2%。^① 2018 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利润总额 8079 亿元，同比增长 9.7%。全行业正在形成具有实力的大企业和充满活力的小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软件的强劲增长推动了出口的发展，2018 年中国软件出口虽面临全球政治局势动荡、贸易增速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持续等挑战，但在智能制造、网络经济、数字经济加快发展，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扩大了全球软件市场需求。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出口 412.27 亿美元（不包括嵌入型软件，以下同），同比增长 9.8%（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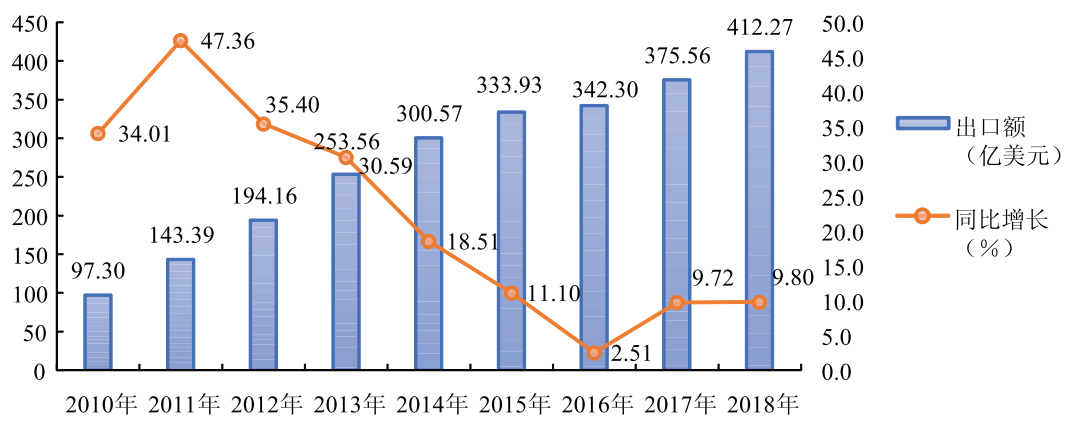


图 1 2010—2018 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出口规模及增速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贸司。

（二）软件出口特点

1. 软件出口规模继续扩大，协议金额首次出现下降

2018 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出口继续保持以往的增长态势，出口规模继续扩大，实现出口 412.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9.8%。发展速度渐趋平稳，仅比 2017 年增速高出 0.08 个百分点。从图 1 来看，2016 年是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出口增长的分水岭，2016 年之前，皆是两位数字的增长，最高时曾达到 2011 年的 47.36%，2016 年下降到最低点 2.51%后，2017 年和 2018 年开始了个位数字的增长。但能否继续企稳，不确定因素还很多。

协议金额下降预示未来发展前景不太乐观。从表 1 来看，2018 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出口的协议金额自 2010 年以来出现首次下降，由 2017 年的 571.82 亿美元下降到

^①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

2018 年的 560.89 亿美元，下降 1.9%。下降幅度虽说不大，但对 2019 年及其以后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出口来看，形势比较严峻。要想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尚需要锻造内力，把握市场动态。

表 1 2010—2018 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出口规模与增速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合同数（个）	同比增长（%）
2010 年	97.3	34.01	126.2	24.42	39044	27.17
2011 年	143.39	47.36	190.68	51.09	46159	18.22
2012 年	194.16	35.4	234.2	22.82	53887	16.74
2013 年	253.56	30.59	320.71	36.94	52683	-2.23
2014 年	300.57	18.51	377.15	17.55	52265	-0.81
2015 年	333.93	11.10	425.78	12.89	52173	-0.18
2016 年	342.3	2.51	464.89	9.19	52790	1.18
2017 年	375.56	9.72	571.82	23.00	59943	13.55
2018 年	412.27	9.8	560.89	-1.9	59867	-0.13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贸司。

2. 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占统领地位，结构升级开始显现

(1) 软件产品出口缓慢下降，信息技术服务外包持续增加

软件业务结构不断优化，以知识和研发为主要特征的知识流程外包比重稳步提升。2018 年的软件出口中，软件产品出口 10.96 亿美元，仅占 2.66%，比 2017 年下降 3.45%；离岸信息技术服务外包 401.31 亿美元，占比达 97.3%，比 2017 年增长 10.19%（表 2）。近年来，软件产品占软件出口比重逐年下降，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占比分别为 5.12%、3.45%、3.02%和 2.66%。软件产品是向用户提供的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或设备中嵌入的软件或在提供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应用服务等技术服务时提供的计算机软件。软件开发研制完成后，仅需要较少的人力和物力，通过复制就可以产生大量的软件产品，因此产品附加值较高。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主要集中于低端环节，技术含量较低、人工需求量较大。与软件产品相比，产业附加价值较低，利润较低。由此可见，我国软件出口仍被钉死在国际价值链低端，且越陷越深，向国际价值链高端的攀升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表 2 2018 年中国软件出口按出口方式分类情况

单位：亿美元

合同类别	合同数 (个)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总计	59867	- 0.13	5608913.6	- 1.9	412.27	9.8
软件产品	4436	- 6.92	159007.8	- 12.7	10.96	- 3.5
系统软件	972	37.87	27265.7	- 24.2	2.08	- 12.4
应用软件	3416	- 15.21	116613.1	- 19.7	8.25	- 7.4
支撑软件	48	50.00	15129.1	1493.3	0.63	804.9
信息技术外包 (ITO)	55431	0.46	5449905.8	- 1.6	401.31	10.2
软件研发外包	39250	- 3.95	3056759.2	- 22.4	255.90	5.1
信息技术服务外包	10015	31.71	1226560.3	46.2	88.17	28.2
运营和维护服务	6148	- 8.24	1120575.7	48.9	52.35	1.6
云服务外包云	13	—	45706.2	—	4.53	—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贸司。

(2) 软件产品出口和信息技术离岸服务外包结构不断优化

软件按功能可以分为应用软件、系统软件和支撑软件。应用软件是特定应用领域专用的软件。系统软件居于计算机系统中最靠近硬件的一层，其他软件一般都通过系统软件发挥作用。支撑软件是在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之间，提供应用软件设计、开发、测试、评估、运行检测等辅助功能，有时以中间件形式存在。2018 年软件产品出口达 10.96 亿美元，虽然仍主要集中于应用软件，但出口结构逐渐优化。应用软件占软件产品出口额的 75.2%，比 2017 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系统软件占软件产品出口额的 19.0%，支撑软件占 5.8%。与 2017 年相比，系统软件占比下降 1.9 个百分点，但支撑软件占比上升 5.2 个百分点，且支撑软件比 2017 年增长 804.9%，呈现一枝独秀的增长，说明软件产品内部结构在优化。

信息技术外包 (ITO)、业务流程外包 (BPO)、知识流程外包 (KPO) 协调发展的局面初步形成。2018 年信息技术离岸服务外包中，信息技术外包在离岸服务外包中占的比重最大，达 45.3%，知识流程外包占 37.4%，业务流程外包占 17.3%。从业务流程外包到信息技术外包，再到知识流程外包，是服务外包顺次演进的过程，也是知识含量和产品附加值不断提升的过程。从服务外包异质性的角度来看，知识流程外包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高于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其原因在于知识流程外包在价值链中所产生的增加值最高，且其外包更多偏向于核心业务，所内含的知识技术水平更

高。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属于传统的外包方式，其知识技术水平不如知识流程外包。由此可以看到，中国信息技术离岸服务外包的结构正在不断优化。在知识流程服务外包中，技术服务外包占 23.1%，研发服务外包占 11.9%，商务服务外包只占 2.4%。

2018 年信息技术服务外包达 401.3 亿美元，其中软件研发外包 255.9 亿美元，占 64%；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为 88.2 亿美元，占 22%；运营和维护服务为 52.3 亿美元，占 13%；云服务外包为 4.5 亿美元，占 1%。云服务外包（简称云外包）是中国商务部第一次进行统计。云外包的核心是资源动态分配，按需服务，低成本解决海量需求。发包商可以灵活选择自己所需服务，在选择外包服务上具有更大的弹性。云服务通过标准化、模块化和流程化的云平台，为客户提供统一和即需即用的无缝服务。

云外包使得服务商与用户和合作伙伴形成共生关系，一起实现价值的协同创造。这不仅有利于效率的提高，更为响应速度的提升和创新的提高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云外包还使外包在众包概念基础上带来云创造，并延伸到制造领域，在云服务架构下预设未来设计制造服务，使制造业从成本导向延伸到设计导向。2018 年，中国与云计算相关的运营服务收入同比增长 21.4%，在信息技术服务中占比达 30.0%。^① 因此，云外包在离岸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中占比虽小，却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

2018 年中国业务流程离岸服务外包达 153.3 亿美元，其中业务运营外包服务达 83.8 亿美元，占 55%；供应链外包服务 60.0 亿美元，占 39%；内部管理外包服务 9.0 亿美元，占 6%。

3. 软件出口目的地主要集中于数字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

总体来看，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出口目的地比较稳定，仍主要集中于数字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2018 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出口目的地多达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是最大和最主要的目的地国，占出口总额的 22.34%。中国出口目的地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欧盟 28 国、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占整个软件出口额的 70.09%。其他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只占 29.92%。与 2017 年相比，五大出口目的地国只有第五位的韩国取代了中国台湾，其他均未发生变化。

4. 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省份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

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前十位省份承接的离岸服务

^①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2018 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统计公报解读》，工信部网站，2019 年 2 月 1 日。

外包占中国承接总量 92%，其中江苏最多为 238 亿美元，占比达 27%，远超过第二位浙江 13 个百分点。浙江、广东、山东分别为 118.7 亿美元、120.7 亿美元、109.8 亿美元，分别占 14%、13%和 12%，属于同一数量级次。下一个数量级次为上海、北京、福建、重庆、四川、辽宁等。分别占比 9%、7%、3%、3%、2%和 2%，其他省份之和仅占 8%

5. 传统企业上“云”加速，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加速迭代

软件出口特别是外包产业的有效整合和优化需要在全球构建分工体系，从而产生大量的外包项目。与此同时，云计算技术已经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刺激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需求，使得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的市场总量持续扩大。云计算作为新的具有颠覆性的创新，引发了一场新的生产力的变革，使外包产业链上的利益重新分配。基于“云”平台和“云”模式的服务外包即“云外包”的出现，逐渐成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的主流和趋势。

云外包的出现，使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加速迭代。从发包方来看，外包的 1.0 时代是以更低的成本完成企业不愿做的事；外包的 2.0 时代是战略性或选择性外包；而云外包发展的 3.0 时代是云计算基础上的按需服务。即客户和外包企业之间的战略协同，通过双方之间的模块化、标准化流程对接，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弹性边界、集约生产、柔性服务和无缝连接，即基于云外包基础上的全流程一体化服务模式。服务外包也从“成本套利”逐步向“智能化服务”提升。

二、中国软件出口中的主要问题

(一) 与云外包相关的问题

云计算引发了软件开发部署模式的创新，云外包已经成为未来离岸服务外包的主要方式，成为承载各类应用的关键基础设施，并为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发展提供基础支撑。但也需要解决如下问题：（1）如何将服务形成动态调整分配的“云”是云外包需要解决的关键课题。（2）如何解决海量存储的基础投入问题。（3）信息备份异地存储和灾难备份成为关键。（4）信息安全问题。消费者使用云服务的安全顾虑是推广云外包的核心，云外包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网络安全隐患。因此，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由此可见，维护包括云计算等在内的软件服务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效率之间的平衡问题，将成为日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 标准化体系建设相对落后

中国虽然在重点领域标准化取得显著进展，国际标准话语权有一定提升。但面向工

业软件、云计算、大数据、信息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快产业发展和行业管理急需标准的研制和实施。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领域，没有一套标准化的系统平台，仅提供一对一的服务，规模瓶颈难以突破。要使成本不断降低，标准化的平台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云外包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动力，它使外包服务从成本套利模式向效率规模模式转变。工信部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提出，到 2020 年建成信息技术服务标准体系，制定 80 余项标准，使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标准品牌。只有积极参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领域国际规则制定和标准化工作，才能提升国际话语权。

（三）与软件出口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

软件无形性和可复制性使软件可以通过上传或下载的方式传送，这种无形的交易方式很容易构成出口管制意义上的“出口”而不为企业所知，由此给企业带来管控上的风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国际贸易极其发达，另一方面企业在全球设立分支机构尤其是海外研发机构极为普遍，再加上云技术、平台应用的高度发达和普及，中国软件的出口管制应提到议事日程。目前中国涉及软件出口管制的规定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法规。如《对外贸易法》《海关法》《刑法》等，以及《软件出口管理和统计办法》《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管理办法》《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管理办法》等。随着中国软件水平的不断提升，加密软件及技术是各国严加管制的对象，各国在出口管制条例中对于加密软件都采取了更严格的管制标准和申报程序。美国的出口管制条例（EAR）是最为复杂完善的法规之一，是世界上比较独立和完整的法规体系，并且每年会根据总统指令和国会立法随时更新。只有制定健全的和不断与时俱进的法律体系，才能保护软件出口企业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

（四）软件工程师的转型升级问题

人工智能（AI）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将使低端的编码人员逐步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信息产业所有环节中最核心的就是“分析”，人工智能基于对过去和现在数据的分析并结合具体的工作、用户和客户的行为模式提供预测。分析结果所产生的精准信息特别是对未来的预测信息，给用户带来更大的价值。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海量数据，不断实现自我学习、自我进化、自我成长，而这个过程就是人工智能巨大的潜在价值。尽管人工智能永远无法取代服务的质量和人性，但是对于重复性任务和处理海量数据，人工智能可以比人更加精准。有专家对中国就业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概率进行估算，显示

在未来的 20 年中，约占总就业人口 76% 的劳动力会受到来自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① 人工智能是一种破坏性创造，在减少一部分人就业的同时，又创造出大量的就业。但值得注意的是，就业创造是为软件以外的其他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正在威胁并夺走一部分低端软件外包业务。软件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也必将影响就业和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外包方面的竞争实力。因此，软件工程师一方面需要向国际注册软件工程师方面发展，这是国际执业资格的最基本条件；另一方面，软件业本身与互联网一样，其职业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国际性。云计算、人工智能都把软件工程师推到了国际前沿，软件工程师的转型和升级势在必行。

三、中国软件出口未来趋势及展望

世界软件产业出口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围绕技术路线主导权、价值链分工、产业生态的竞争日益激烈，许多国家都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加速战略布局，抢占未来发展主导权，这给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跨越式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一）云转型加快，更多的服务部署在云端

“云”计算的出现为软件出口创造一种新的生态系统。基于云平台的软件即服务（SaaS）将成为软件商的主流服务。全球服务外包企业云转型的步伐加快，未来的软件出口企业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企业将更多地“将服务部署在云端”。“云”是一种可以自我服务和管理的虚拟计算资源，云外包提供基于云计算的 SaaS、PasS（平台即服务）、IaaS（基础架构即服务）、DaaS（桌面即服务）模式的外包服务，无论是 BPO、ITO 还是 KPO，都可以利用统一的云平台，针对客户提供标准化或定制化的云外包服务。云外包的诞生，颠覆了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引起外包产业链上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云外包通过自身的超大规模、虚拟化、高可靠性、通用性、高可扩展性、按需服务、极其廉价等特征，促进服务商与用户和合作伙伴共同实现价值的协同创造，并在众包概念基础上形成企业与个人和其他企业等外部机构合作，创造新的商业服务的“云创造”，同时还可以将服务延伸到制造领域，形成设计制造。此外，软件企业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平台，强化技术、产品、内容和服务等核心要素的整合创新，加速业务重构、流程优化和服务提升，实现转型发展。这是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产业和企业“反超”世界巨头的巨大机遇。

^①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2018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 年 7 月。

（二）人工智能将颠覆传统软件业的生态系统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兴数字技术，正与制造、医疗、金融、教育等产业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融合化、智能化发展，释放出与软件需求相关的项目，促进软件技术快速迭代更新，形成软件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进而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使全球市场的软件贸易日益高涨。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将颠覆传统软件业的生态系统，颠覆现有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模式，改变软件的分发方式和功能定位。目前，许多大公司的常规数据监控和基础设施数据维护已经实现了完全自动化，而在更高服务水平上的一些解决方案，如解决代码执行错误或开发新功能，自动化程序亦可以完成 40% 左右。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颠覆性信息技术，其技术路径尚未统一。中国软件产业具备一定的规模与技术积累，如果把握好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增强软件产业的科技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有希望实现在部分领域的超越，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进行错位竞争，提高软件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并且借助“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向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软件产品和服务，建立中国软件贸易自主标准和自主品牌。

人工智能与软件集成将成为企业致胜的关键。人工智能使用数据挖掘来浏览过去所有的数据，并给出模式和相关性。数据挖掘可以使用的技术和工具更有效率地预测客户行为。中国人工智能“试点示范项目实现运营成本降低 20%，产品研制周期缩短 20%，生产效率提高 20%，产品不良品率降低 10%，能源利用率提高 4%”。以高端工业软件及系统为核心，建立覆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智能制造关键环节的工业云、工业大数据平台，形成软件驱动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的生态体系。

（三）数字经济发展为软件出口开辟新的市场

软件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元素。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推动下，软件有力支撑了分享经济发展，支撑了工业互联网、移动医疗、智慧交通等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2018 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 31.3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 34.8%，接近甚至超越了某些发达国家水平。随着世界发达经济体数字经济的战略布局（图 2），软件和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渗透率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各领域各类业务形态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软件正在成为发展智能制造的重要基础，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动能持续转换的强劲引擎。

从国际看，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回暖态势虽然不太明显，但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将成为发展新动能，这为中国软件出口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新的市场。但考虑到贸易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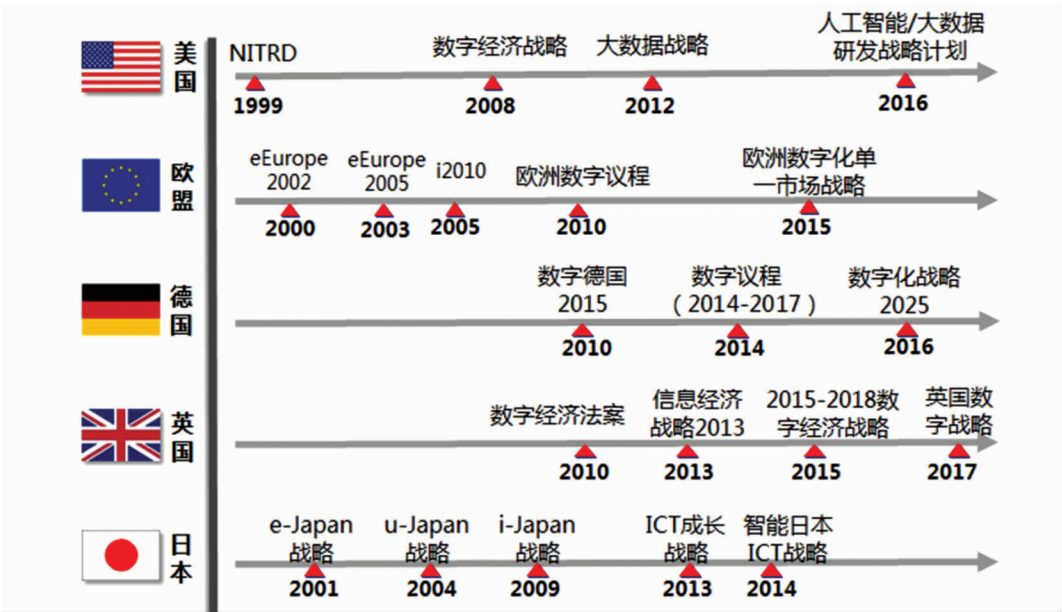


图 2 G20 主要国家数字经济战略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护主义抬头，特别是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是安全的敏感领域，因此，尽管国内软件企业国际化进程不断加速，但未来几年中国有可能延续出口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

（四）工业软件赋能智能制造，将开辟更广阔的软件出口空间

目前，数字化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明显进入加速普及期。随着各国数字战略的实施，软件和信息信息技术服务业步入加速创新、快速迭代、群体突破的爆发期，加快向网络化、平台化、服务化、智能化、生态化演进。以“技术+模式+生态”为核心的协同创新持续深化。推动软件在工业领域更好发挥“赋值、赋能、赋智”作用，是智能制造发展的基础和核心支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快速发展和融合创新，先进计算、高端存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神经科学等新技术加速突破和应用，进一步重塑软件的技术架构、计算模式、开发模式、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日益成熟，加速步入质变期。产业竞争由单一技术、单一产品、单一模式加快向多技术、集成化、融合化、平台系统、生态系统的竞争转变，生态体系竞争成为产业发展制高点。今后中国软件和信息信息技术服务业将继续加快转型调整，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仍然是主攻方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成为产业发展新支柱，开源软件持续引领信息技术创新，企业国际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智能制造的实现将以工业软件作为核心，并将其作为工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载体。

（五）跨境电子商务成为推动软件国际贸易发展的新枢纽

电子商务是一个跨越所有产业的线上销售渠道，是企业推行数字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电子商务的依赖程度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实现有效供给，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日益繁荣。中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从 2008 年的 3.14 万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31.63 万亿元，10 年增长 10 倍。2018 年，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已达 9 万亿元。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测，到 2020 年底，大约 9.4 亿名网购消费者将在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中花费近 1 兆美元。根据阿里的数据测算，2020 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额将达到 12 万亿元，3 年复合增长率为 16.44%，渗透率达 37.6%，未来跨境电商发展市场空间巨大。根据预测，预计 2020 年，中国进出口跨境电商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速，出口和进口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13.1% 和 35.7%。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将成为推动软件服务贸易增长的新枢纽，为软件贸易发展提供新动能。2020 年中国软件出口将达到 581 亿美元。随着全球软件服务要素差异化程度的扩大，国际市场对软件服务的需求亦将不断增长，从而进一步促进软件贸易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夏友仁：《美国软件贸易发展及趋势展望》，《全球化》2018 年第 6 期。
2. 前瞻产业研究院：《2019 年中国软件行业发展前景预测，融合制造业推动前沿技术不断释放新动能》，前瞻产业研究院网站，2019 年 1 月 5 日。
3. 刘多：《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助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新华网，2019 年 2 月 28 日。
5. 工信部规划司：《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2017 年第 3 期。
6.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G20 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17 年）》，中国投资指南网，2017 年 12 月 9 日。
7. 工信部赛迪智库：《智能制造和工业软件发展白皮书 2015》，《数字商业时代》2015 年第 4 期。
8. 国际商报：《商务部谈中国软件出口面临五大发展机遇》，中国网，2017 年 6 月 16 日。
9. 方春晖、刘良勇、宋献涛：《软件出口管制中的相关法律问题和分析》，http://www.sohu.com/a/294379160_221481。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2015 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工信部网站，2015 年 3 月 18 日。

责任编辑：沈家文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亚太中小企业 合作政策的完善

——基于欧盟的比较分析

刘均胜

摘要：亚太地区的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出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中小企业因自身特点在外部冲击下更显脆弱性，因此亚太区域构架的代表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盟都有关于中小企业的合作政策。当前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使得中小企业在有更多机会融入全球生产体系的同时，也面临更多挑战。如何进一步完善亚太地区的中小企业合作政策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作为区域一体化的典范，欧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中小企业政策。与欧盟相比，亚太地区的中小企业政策在制度化水平、指导原则、政策内容、评价机制和支持环境上都有很大差距。通过与欧盟的比较政策分析，可以为完善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政策提供有价值 and 启示的建议。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 中小企业 亚太地区 国际合作

作者简介：刘均胜，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在区域一体化浪潮中，中小企业因具有国别和区域的双重意义而备受重视。作为亚太区域构架的代表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盟都有关于中小企业的政策。^①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国际经贸规则面临新一轮重构。^② 通过提供中间产品和服务，中小企业有

①张蕴岭：《转变中的亚太区域关系与机制》，《外交评论》2018年第3期。

②盛斌、高疆：《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参与者》，《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更多的机会参与全球价值链，但也面临新的挑战，这使得中小企业成为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内容之一。^① 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完善亚太地区的中小企业政策成为迫切的问题。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水平来看，欧盟的程度最高，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中小企业政策。以欧盟为参照，通过比较政策分析，不但可以发现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政策上的差距和不足，而且对今后该地区政策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小企业议题日益凸显

亚太地区的中小企业数量非常庞大，占企业总数的 97% 以上。APEC 中有 13 个经济体，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例超过 99%；中国香港、智利和文莱，中小企业的比例是 98%~98.9%；中国台湾、越南和马来西亚的中小企业比例是 97%~97.9%。^② 亚太地区中小企业的一个特点是，小微企业所占的比例更高，达 80%，这与服务业兴起和知识经济导致的社会经济生产变化有密切关系。

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已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性力量。从出口角度，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中小企业出口占总出口比率在 15%~70%。其中，最高的是中国（超过 50%），然后是加拿大（41%）和韩国（35%），泰国、美国和越南（21%~30%）；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中国台北和马来西亚处于 15%~19%；澳大利亚、智利和秘鲁低于 10%。^③除了直接出口外，围绕全球价值链，中小企业还通过提供中间产品和服务间接参与出口活动，随着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发展，中小企业对出口的贡献会更大。2016 年的研究表明，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21%~59%。^④ 其中，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和美国都在 50% 以上，排在后面的其他经济体的比率虽然数值上略低，但依然处较高水平，只有文莱（22%）和俄罗斯（21%）的比率较低。

由于广大的中小企业大量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批发业、服务业，且分布地域广泛，因此亚太地区的中小企业在创造和吸纳就业方面贡献巨大。总体上亚太地区中小企业的就业率高达 66%。其中，APEC 中加拿大、智利、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的中小企业就业率普遍超过 80%，有 11 个经济体的中小企业就业率约在 50%~79%，相对较低的是中国

①沈铭辉：《从 TPP 到 CPTPP：一个简要的评估》，《中国远洋海运》2019 年第 3 期。

②Boo-young Eom *et al.*. APEC SME Internationalization Model Indice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Working Group*, November 2016, pp. 6~10.

③上述数据是综合的结果，参见王玉主、李嗜成：《东亚中小企业：现状、问题和对策》，《国际贸易》2018 年第 4 期；Bernadie, Zhang Yuhua. SMEs in the APEC Region. *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policy brief, No. 8, 2013, pp. 5~6.

④Naoyuki Yoshino, Farhad Taghizadeh-Hesary. Major Challenges Faci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Asia and Solutions for Mitigating Them. *ADB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564, 2016, pp. 4~5.

香港（47.3%）、新西兰（43.3%）和俄罗斯（24.7%）。可见，亚太地区众多的中小企业已经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更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载体，为亚太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和全球价值链构建发挥了积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出现和盛行，亚太地区广大中小企业不但原有困难进一步加剧，而且还面临新的挑战。一般来看，中小企业面临的普遍性困难主要包括资源匮乏，体现在融资、技术、熟练劳动力、市场准入和市场信息等方面；难以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支付比大企业高得多的交易成本；缺乏了解国内外市场的信息渠道；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来自大型跨国公司的竞争不断加剧；难以像大企业一样在研发和创新上投入；易受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冲击；缺少企业家精神，诸如热情、能力和技术诀窍等。^①当然，上述困难绝大部分都与中小企业自身的特征有关。由于固定资本较少，中小企业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时难以提供必须的抵押物，导致融资资源匮乏；由于规模限制，导致中小企业难以发挥规模优势，也很难通过大规模分摊降低其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研发投入等经营成本，从而在上述领域难以与大企业竞争。此外，广大中小企业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企业管理要求相对较低，大多是家族式经营，包括能力、技术等在内的企业家精神相对有限。

在当前全球价值链盛行的背景下，位于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中小企业拥有更多机会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活动，例如通过为跨国企业或大企业提供中间产品和服务融入全球生产体系，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进入国际市场等。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亚太地区的中小企业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学习和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②与此同时，伴随着更大的市场开放，亚太地区的中小企业面临着更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挑战，而且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也面临着技术和政策门槛。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同样的困难和挑战，中小企业经营者与政策制定者却有着不同的认知或认识，这种差异化的认知也可能会影响中小企业的经营活动。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和参与全球价值链经营活动的增多，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因自身特点引发的困难可能被进一步放大，进而表现出更多脆弱性。对此，仅依靠中小企业自身难以克服。鉴于中小企业在亚太经济一体化和可持续增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当前全球价值链向纵深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在区域层面打造有利于广大中小企业发展的区域合作政策，是当前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需要考虑的一个重点方向。事实上，研究表明，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政策敏感度更高，相关政策对中小企业的成长、

^①Menaka Arudchelvan, Ganeshan Wignarajia. SME Internationalization through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Free Trade Agreements: Malaysian Evidenc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No. 515, 2015, p. 5.

^②OECD. Removing Barriers to SMEs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Markets, 2008, pp. 13~15.

发展和国际化具有重要作用。^①

表 1 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以及经营者和政策制定者对困难和挑战的排序

困难和挑战	中小企业经营者的排序	中小企业政策制定者的排序
缺乏用于出口的资金融通	1	2
难以识别对外业务商机	2	4
缺乏确认/分析市场的信息	3	3
没有能力接触海外客户	4	6
很难获得国外产品代理的资格	5	7
缺乏国际化运作的管理技能	6	5
缺乏足够同国外打交道的人员	7	1
难以对国外竞争者的价格做出反应	8	15
缺乏国内政府的支持和激励	9	23
高昂的交通/保险成本	10	19

资料来源：APEC. SME Market Acces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Medium-term KPIs for the SMEWG Strategic Plan. *Policy Brief*, 2015。

二、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国际合作政策的简要评估

区域层面上，当前亚太地区的中小企业已经通过 APEC 和东盟两个国际合作组织在机制上进行了政策协调与合作。众所周知，APEC 是目前级别最高、领域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区域合作机制之一，而东盟则是本地区成立最早、机制化水平最高的合作组织。事实上，鉴于中小企业的重要性，APEC 和东盟较早地开始关注了中小企业议题，尽管本地区中小企业国际合作水平有限，政策协调力度不够，但是其中小企业政策仍具代表性。

（一）APEC 的中小企业国际合作政策

目前，尽管 APEC 中小企业^②国际合作实践起步较早，但是中小企业国际合作政策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多集中于能力建设和成员国单边行动。APEC 的两大支柱是贸易、投

^①Ben Shepherd, *et al.*. Regulatory Reform: Cases Studies on Improv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SMEs). *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November 2015, pp. 7 ~8.

^②APEC 对中小企业没有统一的标准。通常用雇员人数、年销售额（或收入）、固定资产和资本（或投资额）四个指标作为中小企业的标准。APEC 成员往往根据本国实际选择其中一个或多个指标来定义中小企业。进一步，各成员对同一标准的认识还不一致，如员工人数，从最低 20 人到最高 1000 人的都有。Bernadie Zhang Yuhua. SMEs in the APEC Region. *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policy brief No. 8, 2013, pp. 5 ~6.

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其中中小企业议题属于经济技术合作范畴。从 1994 年起，APEC 每年召开中小企业部长级会议，1995 年成立了临时中小企业政策小组，2000 年该小组改称为中小企业工作组（SMEWG），2006 年贸易促进工作组并入 SMEWG。APEC 中小企业工作组的目标是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增强中小企业自身参与国际贸易的能力建设，为中小企业成长和出口创造有利的经营环境。

表 2 201—2020 年中小企业工作组战略规划的具体内容

优先领域	目标
企业家精神、创新和互联网数字经济	• 向青年、妇女和其他个人宣传企业家精神文化 • 鼓励中小企业的创新以增强市场竞争力 • 强化中小企业有效利用和参与互联网数字经济的能力 • 从成员经济体的需要出发鼓励特定产业的中小企业发展
对业务扩展和能力建设给与金融支持	• 为中小企业的业务扩展提供融资和基金支持 • 帮助中小企业理解和掌握新兴融资机制及工具
支持中小企业成长的包容性商业环境	• 为中小企业营造平等、透明和友好的商务环境 • 鼓励简化和统一规则及行政规章 • 从制度上帮助中小企业克服在行政管理和政府采购上的障碍 • 加强公私部门的协调
中小企业的市场准入	• 促进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 • 加强中小企业的出口能力和国际化能力建设 • 围绕市场准入促进中小微企业与大企业的合作

资料来源：APEC.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Working Group Strategic Plan 2017 – 2020. APEC Secretariat，No. 2016/SOM3/SCE/003，2016。

相应地，为了加强中小企业国际合作政策的有效性，APEC 中小企业工作组制订了一系列的指导原则和规划，包括中“小企业活动框架（1997）”“中小企业发展的行动统一计划（1998—2002）”，以及“2009—2012 中小企业工作组战略规划”和“2013—2016 中小企业工作组战略规划”。APEC 希望通过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消除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所面临的阻碍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壁垒。通过简化出口程序和提供能力建设培训项目，可以增强中小企业的参与能力，获取数字时代全球化市场的益处。在对“2013—2016 年中小企业工作组战略规划”进行了评估和改进后，其建议被写入“2017—2020 年中小企业工作组战略规划”。2016 年 9 月，APEC 中小企业部长级会议通过了“2017—2020 年中小企业工作组战略规划”，为解决中小微企业所面临的关键性问题提供了路线图。

APEC 中小企业工作组每年采用 5 个相关指标跟踪评价中小企业合作政策进展，也鼓励成员经济体在自愿的基础上报告实现上述四大优先领域目标的情况。APEC 中小企业

工作组还对“2017—2020 年中小企业工作组战略规划”的实施制定了时间表，由各责任经济体牵头根据确定的优先领域开展活动。此外，为进一步推动 APEC 范围内中小企业政策的国际合作，2016 年利马第 23 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级会议发表了《中小企业作为质量性增长和繁荣发动机》的声明。2017 年，在“创造新动力，培育一个共享未来”主题下，APEC 继续将中小微企业作为关键性的优先议题之一，特别是强调要“加强数字时代中小微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2017 年 APEC 部长会议同意了中小企业工作组关于发展绿色、可持续和创新中小微企业的战略、创新启动和官方设立 APEC 中小微企业市场的倡议。

（二）东盟的中小企业国际合作政策

亚太地区的东盟也是中小企业国际合作政策的载体之一。相对 APEC 而言，东盟的中小企业国际合作政策更加深入，其政策核心也指向推动和深化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1992 年东盟自贸区成立后，加强区域中小企业合作成为当时优先目标一。1995 年由各成员的代表组成了东盟中小企业工作组（SMEWG），负责制定关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开展相关项目和活动。SMEWG 是一个咨询和协调性的论坛，确保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利于东盟一体化和支持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设。同期，还成立了中小企业咨询委员会（SMEAB），加强公私部门在中小企业活动上的协调。随后，由于工作范围的扩大和其他机构的加入，2016 年 1 月 SMEWG 更名为东盟中小微企业协调委员会（ACCMSME）。^①

2006 年 8 月，东盟经济部长会议（AEM）同意制定“一个全力推进东盟经济共同体的蓝图”，其中发展中小企业被认为是实现平衡经济增长的关键。根据“东盟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蓝图（2004—2014）”（APBSD），预期到 2015 使中小企业成为区域和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APBSD 针对东盟的中小企业在能力建设、市场开发、融资、技术、政策环境五大优先方面制定了战略性规划措施。随后，2009 年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决定通过“东盟中小企业发展战略规划（2010—2015）”（SAPASD），以加快 APBSD 的实施。SAPASD 的使命是，到 2015 年，东盟的中小企业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能够融入地区和全球供应链，从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中获益，政策环境要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出口和创新。为了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实现“全球竞争和创新的中小企业展望”的要求，2015 年东盟第 27 次领导人会议通过了“东盟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行动规划（2016—2025）”（SAPSMED）。东盟希望到 2025 年，通过实施的战略行动规划，使中小企业更加富有全球化竞争活力。

^①SME Developments in ASEAN. <https://asean.org/asean-economic-community/sectoral-bodies-under-the-purview-of-aem/micro-small-and-medium-enterprises/overview/>.

在实践中，为了系统跟踪 APBSD 和 SAPASD 的进展及实施情况，东盟在经合组织（OECD）的帮助下设计了东盟中小企业政策指数。^① 该指数除了作为政策实施监督工具之外，还具有促进政策对话、项目协调和最优经验推广等作用。借助该指数，东盟形成了初步完备的中小企业合作政策体系。此外，为了增强中小企业竞争力，东盟在政策、场地、资金上对各种经验交流会、研讨会、企业家教育课程、东盟网上学院等予以大力支持，并通过组织员工短期培训、访问交流、技能培训等加强中小企业合作能力建设。

三、与欧盟中小企业合作政策的比较分析

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先行者和典范，欧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中小企业政策，对亚太地区具有重要的参照和借鉴意义。

（一）欧盟的中小企业政策回顾

1996 年 4 月，欧盟就对中小企业进行了定义：雇员少于 10 人的为微型企业；雇员少于 49 人，年营业额不超过 700 万欧元或者年资产负债表总值不超过 500 万欧元的企业，属于小型企业；雇员少于 249 人，年营业额不超过 4000 万欧元或者年资产负债表总值不超过 2700 万欧元的企业为中型企业。后来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国际化，2001 年欧盟又对财务指标做了调整。^② 上述标准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当前世界上比较通用的中小企业定义。

2000 年 3 月，欧盟确立了里斯本目标，希望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加强社会团结，要创造一个鼓励增长和就业的环境，最根本的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为此，2000 年 6 月，欧盟通过了《欧洲小企业宪章》，标志着欧盟统一的中小企业合作政策形成。《欧洲小企业宪章》号召成员经济体和欧洲委员会在诸多领域采取措施，支持和鼓励中小企业，包括培育企业家精神、完善立法和管理、增加技术供给、给予税收和金融优惠等。由于欧委会优先考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其后许多共同体政策和欧盟项目都将中小企业列为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对里斯本会议的回应，欧盟设计了一套指标评分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目标进展的相关信息。评分指标使用大量的面板数据衡量各国在创新、企业家精神和技术使用等方面的表现。如基于结构性指标数据库建立的创新评分表，包含 17 个指标，涉及人力

^①ERIA SME Working Group. Asean SME Policy Index 2014: Towards Competitive and Innovative Asean SMEs. *ERIA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No. 8, June 2014, p. 4.

^②SMEs in Europe: Competitiveness, Innovation and the Knowledge-driven Society.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2, p. 6.

资源，知识创造、传播和新知识的应用，金融创新，产出和市场四方面的内容。再如企业家精神评分表主要包括企业创立的增长率、女性企业家人数、业务登记（时间要求和成本），以及商业化孵化器等。基于上述指标体系，欧委会、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欧洲基金会共同开发出“欧洲中小企业政策指数”，自 2006 年以来已经成功地在东南欧、OECD 国家中广泛使用。借助该指数，可以对中小企业政策进行客观、全面、可追溯的评价。

在欧洲共同体时期，欧委会企业与工业总司（EIEC）主要负责监督内部市场货物的自由流动和成员国对企业政策及标准的影响，以保障企业在任何一个成员国都享受同等待遇，同时减轻企业行政审批负担。随着欧盟扩容和对中小企业的重视，2008 年 6 月欧委会通过《欧洲小企业法案》，明确规定了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 10 项原则，在欧盟和成员国层面建立了扶持中小企业的全面政策框架。该法案的核心是“优先考虑小企业”原则，确保立法不会增加它们的负担。^① 为此，欧盟要求使用强制性的“中小企业测试”检查欧盟出台的新政策和法律是否对中小企业有影响。2011 年 5 月，欧盟中小企业监督网络成立，以确保政策在国别和区域层面对中小企业是友好的。《欧洲小企业法案》标志着欧盟中小企业政策已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严肃性。

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落实欧盟中小企业合作政策，欧盟采取了四个方面的措施加以推动。第一，将支持和便利化中小企业融资作为政策的优先选项。2006 年 11 月，EIEC 发布新的“欧盟扶持中小企业”政策文件，进一步明确对中小企业资金支持方式，包括专项资助、结构基金资助、金融工具和中小企业国际化资助四类。其中，专项资助主要是对特定项目提供融资。例如，2012 年的“竞争和创新框架计划”和 2017 年 12 月的“展望 2020”。值得注意的是，结构性基金资助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出现，主要通过欧洲投资基金和欧洲银行运作。欧洲投资基金对中小企业的支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贷款担保，帮助获得低利率贷款；二是通过“增长和环境”行动，对项目贷款进行担保。金融工具主要是通过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因欧债危机，2008 年欧委会建议在 2014—2020 年向中小企业提供价值 14 亿欧元的债务或股权工具。2018 年欧委会提出建立资本市场联盟的立法提案，帮助中小企业上市和在“中小企业成长市场”上发行债券。

第二，通过“增长使命”支持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在全球价值链时代，欧盟中小企业日益需要同其他发达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企业建立联系，为此，欧盟推出“小企业，大世界”战略，希望帮助欧盟中小企业扩大在欧洲外的经营，给欧洲经济注入活力。通过组织一系列的“增长使命”活动支持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这些倡议的目标是，增进欧洲同日本、巴西、印度和突尼斯等经济体在产业平台之间的合作。此外，欧委会

^①The European Union Explained: Enterprise. *European Commission*, Belgium, 2013, p. 8.

还创设与亚洲、北非和美洲相联系的欧洲企业网络，以支持中小企业的业务和创新。

第三，倡导企业家精神。欧盟中小企业政策的核心是鼓励出现更多的企业家。为此，欧委会出台了一系列倡议，包括：建设集聚型的商务网络，使大量的专业化企业在特定地点能彼此密切合作；推广企业家精神教育，包括“欧洲中小企业周”和“年轻企业家交流项目”；鼓励出现更多的女性企业家。

第四，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竞争力。根据“里斯本战略”和成员国国家改革计划，欧委会致力于以各种方式提升企业竞争力，包括人员培训，设立“企业创新中心”，向中小企业以较低费用提供信息咨询、政策指导、法律咨询等服务。2014年7月，欧盟公布了“中小企业绿色增长行动计划（2014—2020）”，帮助中小企业将环境挑战转化为商业机会。

（二）与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国际合作政策的比较

作为运行多年，比较成熟的国际合作政策，欧盟的中小企业政策在制度化建设、政策侧重、评价机制以及支持环境等多个方面与亚太地区的中小企业国际合作政策有所不同。

第一，中小企业政策制度化程度方面相差较大。这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关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制定是否有独立的制度机构负责；另一方面是政策的权威性和强制性程度。欧盟中小企业政策的制度化水平最高，中小企业政策开始是以《欧洲小企业宪章》形式出现的，作为合作宪章有一定的权威性，而且由欧委会推动且发表年度执行报告，政策执行力度强。《欧洲小企业法案》公布后，欧盟的中小企业政策上升到法律地位，具有强制性，而且用有强制性的“中小企业测试”和中小企业监督网络来确保新政策在国家及地区层面对中小企业都是友好的。亚太地区的中小企业政策在制度化程度上与欧盟还有相当大的差距。APEC已形成中小企业部长会议、SMEWG、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等多层次合作机制。其中，中小企业部长会议的规格最高，负责中小企业合作原则、优先合作领域、成员经济体政策和措施的协调等。虽然SMEWG制定了多个时期的中小企业战略规划，但这些规划并不具有强制性，成员经济体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落实，因此难以达到预期政策效果。而东盟的中小企业政策在制度化建设上略高于APEC。一是东盟正在进行共同体建设，其政策更具强制性；二是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对东盟中小企业发展战略具有决策性的作用，而且设立了东盟中小微企业协调委员会和东盟中小微企业咨询委员会，负责制定和推动有关政策、倡议、项目的实施；三是东盟立足建立共同体的高度制定了连续分阶段的发展中小企业的规划。

第二，政策内容的侧重点不同。欧盟的中小企业政策侧重点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主要是通过专项资助、结构基金资助、金融工具和中小企业国际化资助四种方式。

而APEC中小企业政策侧重在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两个方面。一方面主要是从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出发，为中小企业参与区域贸易投资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例如便利化具体政策措施包括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和开展政策对话，通过谈判协调解决中小企业在海关程序、原产地规则、市场准入门槛上的障碍。另一方面主要是推动中小企业开展经济技术合作，鼓励创新。经济技术合作具体措施包括举办中小企业技术交流展会、宣传中小企业创新实践经验，以及建立区域企业数据库等。此外，东盟则侧重通过中小企业来实现东盟共同体的均衡经济增长。^①为此，东盟成立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面向中小企业的网站、简化中小企业注册程序和完善与中小企业相关的政策规章制度等，为中小企业营造透明、公平、友好的发展环境。在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上，为加强中小企业参与地区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东盟将促进贸易自由化作为中小企业合作的政策内容，积极推动成员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便利化通关程序等措施。欧盟在实践中更侧重于通过融资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而亚太地区的中小企业合作政策尚处于起步阶段，更多地着力于改善营商环境等领域。

第三，在政策执行、效果评价的机制上差别较大。欧盟重视对中小企业政策的评价，在评分表基础上开发出欧盟中小企业政策指数。通过该指数，欧委会等机构可以在区域和国别层面跟踪中小企业政策的进展和执行情况，通过打分系统给出客观的评估结果。此外，还可以根据该指数调整中期政策方向，确定合作领域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支点等。相比之下，APEC的中小企业政策在监督和评价环节缺乏客观的可参照标准，没有定期的信息反馈和可操作的改进措施。东盟近年来才开始重视对中小企业政策的评价，在OECD的帮助下借鉴欧盟中小企业政策指数开发了东盟中小企业政策指数。目前，该指数参数已经被用于评估东盟中小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第四，对中小企业政策的支持环境存在明显不同。中小企业政策的执行和政策效果同支持环境密切相关，所以政策制定和内容要考虑实际的政策环境。从整体上看，欧盟在经济发达程度、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法律法规完善程度方面都处于世界前列。在这种情况下，欧盟的中小企业政策能够上升到制度和法律层面，有较为统一的政策和原则，以及监督机制。由于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市场体系完备，这为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而且由于欧盟社会财富充裕，监管制度完备，就有条件通过欧洲基金、项目资金等方式为中小企业企业家精神培育和创新提供支持。由于欧盟一体化程度高，所以中小企业面临的区域性壁垒较少，相对来说国际化不是主要困难。而亚太地区

^①ERIA SME Working Group. ASEAN SME Policy Index 2014: Towards Competitiveness and Innovative ASEAN SMEs. *ERIA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No. 8, June 2014, p. 2.

的APEC和东盟，其内部经济成员之间在经济发展程度、市场经济体系、法律法规等基础设施方面存在非常大的差距。这样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导致中小企业政策在制定、执行和效果评价上都存在很多困难和阻碍。以中小企业的定义为例，到现在APEC和东盟都未实现统一，更未达到欧盟的水平，这给中小企业的信息搜集和处理、政策评价等带来不少困难。

四、完善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合作政策的建议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发展和深化，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加入到国际化生产过程中将是必然趋势。对于亚太地区众多的中小企业而言，中小企业不仅面临不少共性困难，还面临区域内中小企业合作政策发展水平不高的现实。基于前文的政策比较分析，未来完善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合作政策上需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尽快对区域内中小企业给出较为统一的定义。相比于欧盟从成立之初就对中小企业明确统一定义，目前APEC和东盟都没有对中小企业给出明确的定义。实际上，明确定义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不但有助于对企业的分类和国际比较，而且可以建立准确的统计信息库、确定资助对象企业范围等。因此，有必要在APEC或者正在进行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中，规范中小企业的定义，尽快推动形成区域性统一的中小企业定义和标准。

第二，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应建立更高级别的专门机构负责中小企业合作，在组织协议、宪章中对中小企业合作应做出规定，这样有利于将中小企业合作予以制度化和法律化，增强其政策的权威性。当前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的主要内容是“边境后”规则的统一，提升中小企业负责机构的级别将更有利于协调伙伴国相应机构的工作，将有利于亚太地区进一步整合和简化中小企业经营的制度性障碍，改善本地区中小企业营商环境。

第三，对于中小企业政策的实施和效果应建立一套客观、公正、可操作的监督反馈机制。这样不但可以有效落实政策，而且可以评价对比政策效果，及时改进不足和适时调整政策的重点。东盟虽建立了中小企业政策指数，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从APEC和东盟的中小企业合作政策可以看出，尽管有大量关于中小企业合作的规划、纲领和项目，但是如何落实和评价政策效果却是个难题。实际上，只有建立落实监督和效果评价机制，才能与政策制定、落实构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因此，进一步借鉴成熟的欧盟经验，推动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合作政策的监督反馈机制的完善，仍是各亚太国际合作机制需要加强的方向之一。

第四，在确定政策重点的同时，也要兼顾中小企业其他需要关注的地方，尽量保证

政策的均衡合理性。对于现代中小企业来说，它们面对的并不是单一的困难，有主要困难，也有一般的困难。因此，对于中小企业政策来说要兼顾均衡性，应更多从中小企业的角度来思考。因此，随着广大亚太地区中小企业逐步加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将更加复杂，更有效地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它们面临的困难是当前亚太地区国际合作机制面临的现实问题，亚太地区的中小企业国际合作机制重心需要逐步从浅层次的能力建设向中高层次的融资方面转变，而这个转变的重点又在于如何更好地调动区域内的资金，推动多年以来期盼已久的亚太区域债券市场的建立，以便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

第五，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问题的基础研究，为中小企业合作政策的制定提供可靠的理论和实践支撑。如根据欧盟经验，建立全面大型的中小企业数据库，将现代前沿的决策技术和理论引入到中小企业合作政策制定中以提高决策的效率，召集官产学和相关智库参与问题研讨和经验交流等。

参考文献：

1. 梁达：《中小企业的地位、困难与出路》，《金融与经济》2008 第 10 期。
2. 王玉主、李嗜成：《东亚中小企业：现状、问题和对策》，《国际贸易》2018 年第 4 期。
3. 张蕴岭：《转变中的亚太区域关系与机制》，《外交评论》2018 年第 3 期。
4. 张友轩、阴保民、董亚力等：《欧洲企业服务网络的演变及启示》，《天津科技》2014 年第 9 期。
5. Bernadie, Zhang Yuhua. SMEs in the APEC Region. *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policy brief, No. 8, 2013.
6. Boo-young Eom *et al.*. APEC SME Internationalization Model Indice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Working Group*, November 2016.
7. ERIA SME Working Group. ASEAN SME Policy Index 2014: Towards Competitiveness and Innovative ASEAN SMEs. *ERIA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No. 8*, June 2014.
8. Menaka Arudchelvan and Ganeshan Wignarajia. SME Internationalization through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Free Trade Agreements: Malaysian Evidenc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No. 515, 2015.
9. Ratih Hendayani and Bitmar Alviy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 of Value Innovation in Small Medium Enterprises and Supply Chain Capability as Mediator to Achiev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65, Atlantis Press, 2019.

责任编辑：李 蕊、郭 霞

新时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 资本的创新探索^{*}

——以上海市为例

李金波 李 丹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上海市在国资国企改革具体实践中取得了积极成效，通过明确企业功能分类、转变职能加强监管、调整国资战略布局、组建国资流动平台、大力推进混改和证券化、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等创新举措，将国资国企打造成上海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进一步提升了上海的城市竞争力。为进一步深化并切实推进全国范围内的国资国企改革，可借鉴并推广上海的实践经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分类改革与分类治理相结合，着力推进国有资本优化配置，并注重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新时代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不断探索新路径。

关键词：国企改革 国有资本 企业管理 国资监管

作者简介：李金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副部长、高级经济师；

李 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助理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市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要求，大力推进国有资本监管体制改革创新，以进一步细化企业功能分类为切入点，推动国有资本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国资国企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符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做强

^{*} 本研究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2018 年重大课题《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研究》的部分成果。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李荣融的悉心指导，感谢上海市国资委对课题组调研的大力支持。

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方向和要求。分析总结上海的主要创新举措和实践经验，对于新时代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深刻认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重大意义

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虽一词之差，但体现了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重心的重大转变。一方面，国资国企改革的重点将由过去的公司制改革、股份制改革、产权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转向推进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和合理流动。实践表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互有比较优势，国企的比较优势在于提供公共物品、在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这就需要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党中央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一个政策含义就是要通过国有资本的有进有退推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那么与推动国有资本优化配置和合理流动有关的改革就成为了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重点之一。另一方面国资监管的重点将由过去的“管企业”，转向在上述改革基础上的“管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意味着要深化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国资监管机构回归出资人职责，根据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服务国家战略、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情况对其经理进行考核，真正实现由过去的“管企业”转向“管资本”。

（一）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

国资国企改革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监管和运营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人才在流动、企业有胜败，国有经济从布局到结构，从宏观监管到微观治理，都需要与时俱进根据国家需要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在流动中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就需要国有资本监管运营体制转向以“管资本”为主、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一新的目标导向上来。惟其如此，我们在处理战略布局的调整、资本形态的转换、监管权责的收放以及具体企业的进退上才能有所依归、有的放矢，现代化经济体系才有坚实基础。

（二）推动经济发展三大变革、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能

新时代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国有资本作用和角色是关键：要实现质量变革，需要做强国有资本，以强有力的战略引领能力带动形成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实现效率变革，需要优化国有资本战略布局，深化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等行政性垄断行业改

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促进有效竞争，全面提高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实现动力变革，则要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国有和民营两种体制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以混改来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充分涌流，以放大的国有资本功能推动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

（三）有效应对经贸摩擦、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依托

当前，单边主义势力力图重构国际经贸规则。其中，相关“国企条款”对我国影响和制约最大，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而非“国有企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化被动为主动：一是以“管资本”为导向深化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做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打破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谬论；二是结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为依托推动混改后的企业上市、资产证券化，在此基础上将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控股地位，实现绝大多数竞争性行业不存在“国企条款”下的“国有企业”；三是可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为依托，推动国有资本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进一步夯实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和优势。

二、上海市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国资国企成为上海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塑造上海城市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支撑。2018年，上海市地方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59万亿元，同比增长8.5%；利润总额3494.83亿元，同比增长6.1%；资产总额19.77万亿元，同比增长6.3%。

（一）支撑经济发展

上海地方国有经济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图1所示，连续多年保持生产总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市总量1/4。特别是2019年以来，在经济形势面临较大困难的背景下，上海市地方国有经济仍然实现了较快的增长，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

（二）代表城市实力

上海国企实力强影响广，是上海城市竞争力的体现。上汽集团、宝武钢铁集团、交通银行、太平洋保险集团、浦发银行、绿地集团、远洋海运集团7家企业进入2018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

（三）提升城市功能

上海市地方国有企业全力支持市级重大工程建设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推进北横通道等多项涉及市属国企腾地搬迁工作。如图 1 所示，国有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市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稳步保持在 20% 以上。

（四）服务保障民生

2018 年以来，上海市地方国有企业上缴各项税金总额 2515.38 亿元，增加从业人员 6.75 万人。上海市地方国资国企承担了全市 100% 高速公路建设，90% 以上旧区改造和天然气液化气供应，80% 以上保障房及租赁房建设、公共交通和自来水供应，以及 70% 以上的主副食品流通供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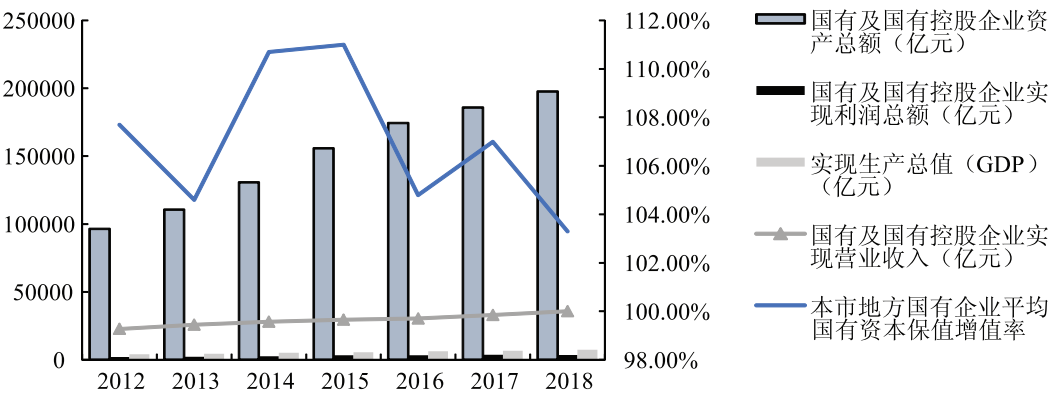


图 1 2012—2018 年上海市地方国有企业运行主要指标

数据来源：上海市国资委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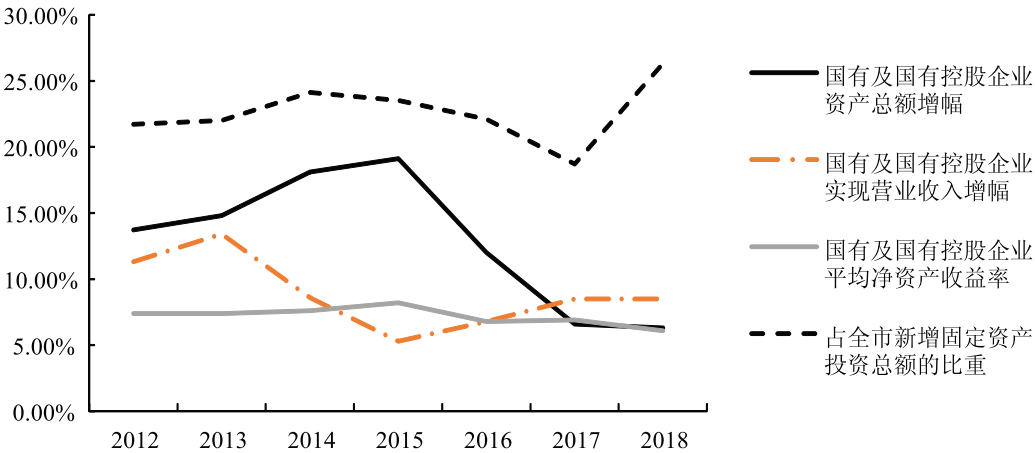


图 2 2012—2018 年上海市地方国有企业运行主要指标增幅情况

数据来源：上海市国资委网站。

三、上海国资深化改革的主要创新举措

上海市国资国企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上海市在学深吃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十九大精神的基础上，结合上海的实际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上海实情、契合国企规律、体现改革取向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在2013年12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很多很好很有创新意义的改革举措，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明确企业功能分类，探索中国特色企业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将国有企业按功能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实行分类改革。上海市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国有企业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①在实际操作时，对涉及跨类业务的企业考核因企制宜，一企一策。对竞争类企业承担政府交办任务的业务根据实际情况归入功能类或公共服务类进行考核；对功能类或公共服务类企业自主决策、以市场化运营的业务则归入竞争类进行考核；上市公司所属业务均归于竞争类业务。而且对于已经划定类别的企业，则根据国资布局结构和企业发展战略，实施动态调整，循序渐进，逐步到位，不搞“一刀切”。^②目前，上海市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45家，其中竞争类32家、功能类10家、公共服务类3家。同时，进一步健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探索设立由外部董事作为主任委员的提名与治理、薪酬与考核、审计与风控等专门委员会。^③拓宽外部董事来源渠道，国有企业原领导人员、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原负责人经任职资格认定并经有关部门审批同意后，可担任市管国有企业外部董事。

^①参见《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上海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国有企业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其中，竞争类企业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兼顾社会效益，完全市场化运作的企业；功能类企业是以完成战略任务或重大专项任务为主要目标，兼顾经济效益的企业；而公共服务类企业则是以确保城市正常运行和稳定，实现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的企业。

^②胡锋：《上海深化国企改革的实践探索及发展路径》，《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15期。

^③《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确立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对竞争类企业，积极推进以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建设，强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功能。此外，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依法制定或参与制定公司章程，使之成为各类治理主体履职的主要依据之一。

（二）转变职能加强监管，加快健全国资监管体系

深入推进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上海市国资委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先后下放 28 项审批事项；全面梳理国资监管规范性文件，清理废止 90 件规范性文件，率先在全国建立了包括“管好资本、服务企业履职清单”“事中事后监管事项清单”的出资人监管清单，以及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的行政监管清单。^①

完善市属经营性国资集中统一监管。上海与中央和全国其他省市不同的是，上海市明确将市属国有金融机构全部纳入市国资委监管。^② 切实履行资产收益、选择管理者和参与重大决策等出资人职责。在此基础上，上海市进一步完善“直接监管为主、委托监管为辅”的市属国资监管体系，市属体育企业已实现国资统一管理，文化等领域改革也纳入到了国资整体布局。截至 2018 年 9 月，已经完成 44 个政府委办局 177 户企业脱钩划转和企业清理规范。

加强重点领域监管。强化企业境外投融资、产权变动、资金管控和资产评估风险防范，实现监管全覆盖、全流程、全方位。开展了境外设立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BVI）、特殊目的公司（SPV）等 10 个专项审计检查。坚持依法治企，建立市国资委兼职政府法律顾问队伍，近年来解决企业法律纠纷涉案总额 586 亿元，挽回经济损失 19 亿元。规范国资评估监管，实现国资保值增值，市国资委备案 303 个评估项目，增值 1835.76 亿元，增值率为 143.7%。

（三）组建国资流动平台，积极培育投资运营主体

按照市场化、专业化要求运作，上海市重点打造上海国际集团、上海国盛集团两大国资运营公司和以上海联合投资为代表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在更大范围、更高层面统筹配置资源、盘活存量。其中，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按照“两个主体一个通道”的定位（部分国有股权的持股主体、国资运营的执行主体和部分一般性竞争领域国资退出的重要通道），先后对国际集团、国盛集团进行金融企业纵向整合、产业企业横向重组（共 7 个项目，资产总额约 500 亿元），完成平台公司的战略转型。截至目前，两大国资运营

^①《意见》提出在监管方式上突出企业市场属性，兼顾股权结构、产业特征、发展阶段，逐步实现差异化管理。

^②《意见》指出通过以产权为纽带，积极推进产业与金融结合，加快产业与金融等各类资本优化配置。分别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家。

平台拥有股权总额 800 亿元，累计运作盘活资金 177.4 亿元。^①与此同时，上海市重点发展了以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国有资本投资平台。该公司定位于“战略新兴产业投融资平台”和“科创成果转化孵化功能性平台”，坚持服务国家战略，坚持走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推动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在信息产业、生命健康、能源和智能制造及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领投了上百个项目，对外投资额超过百亿元，是上海兆星（目前国内唯一同时掌握 X86 处理器、Advanced RISC Machine ARM 处理器、芯片组和图形处理器四大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和产业化能力的公司）、上海联影（中国唯一一家自主研发、生产全线高端医学影像及放疗设备，并提供医疗信息化、智能化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艾普强（首台国产质子治疗设备研发生产服务商）和兰透平（打破垄断、产品达国际先进水平的小型燃气轮机提供商）等战略新兴龙头企业的培育者。

（四）大力推进混改和证券化，加快发展公众公司

一是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目前，上海市已经完成了水产集团、化工院、仪表院、电缆所等科研院所的公司制改革，市管企业基本实现公司制全覆盖。2017 年，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完成了“事转企”改制，为下一阶段深化改革奠定基础。二是拓宽地方国有企业改革资本参与渠道。为积极引导各类资本投入，上海市出台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制操作指引，^②稳妥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相关工作，累计实施企业员工持股的地方国有企业共计 397 家。三是加快企业整体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大力发展公众公司。建立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导向的国有企业公众公司发展模式，形成“资源集聚、机制创新、社会监管、价值提升、回报民生”的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机制。目前，全市共有 83 家地方国有控股境内外上市公司，总市值 2.51 万亿元，国有股市值 1.08 万亿元，41 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入选上证 50 等指数股，占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总数的 57%。上汽集团等 18 家上海市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被纳入美国明晟（MSCI）新兴市场指数。

^①其中，上海国际集团完成上港集团与锦江航运重组，实现上海航运中心建设资源整合；上海国盛集团以上海建工为标的发行 50 亿元可交换公司债，创造当年国内证券市场可交换公司债最大规模。设立反映国企创新发展水平的上海国企指数，2017 年涨幅 0.98%，高于中证 500 指数 1.2 个百分点；发行“上海国企 ETF 基金”首募规模 152 亿元，成为当年全球公募基金行业首募规模最大的权益类基金产品。上海国际集团、上海国盛集团发起设立科创、国企改革、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上海改革 ETF”基金成功发行，各类基金规模近 1500 亿元。

^②上海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制操作指引，严把“科学决策、审计评估、市场交易”等关键环节，推进上海建科集团引进央企、民企等战略投资者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稳妥有序推进 8 家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

四、进一步的分析与思考

上海国资国企的改革创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伟大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益探索和成功经验为新时代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提供了重要启发和借鉴。

（一）抓住重点，准确把握“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内涵

“国有资本”与“国有企业”在内涵上存在本质不同：前者是价值形态，后者是实体形态；前者追求的是配置效率，要在市场流动中实现保值增值，后者追求的是经营效率，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在政策导向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不拘泥于某个具体企业的成败与进退，而是从国家全局的高度对国有资本按照战略需要进行合理配置，旨在推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高质量发展；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则强调通过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及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来打造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的发育，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做“大”容易、做“强”做“优”难，甚至导致以“做强做优做大”的名义搞行业垄断、挤压民资发展空间、引发“国进民退”等问题。在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博弈中，有关“国企条款”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当前国际背景下，继续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仅不利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也容易授人以“国家资本主义”之口实。

顺应国际潮流和满足国内需要，在新一轮改革中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可以更好地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厘清政府作为出资人和公共管理者的职能边界；更好地推动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 and 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形成竞争性市场体制；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新一轮经贸规则谈判中扬长避短，争取主动。

（二）辨明类型，厘清国有企业的治理要求和基本规律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前提就是要深刻把握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治理要求和基本规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曾创造性地将国有企业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这实际上提出了国有企业应分类改革、分类治理的新思路。尽管此后多个中央文件（如中发〔22〕号文）均明确提出了“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要求，但贯彻这一思路的效果差强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过于简单化，不仅商业类和公益类的业务界限不清晰，而且商业类下的商业Ⅰ类、Ⅱ类与自然垄断类划分标准也

不清晰；二是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比较优势和功能定位缺乏清晰认识，相应的治理要求也不明确；三是很多企业既有商业类业务又有公益类业务，在实际操作中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都希望被划为商业类企业，以致公益类企业很少。

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功能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承担的职能使命是不同的。在我国，现有国有企业实际上履行着三重职能：一是在竞争性领域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参与市场竞争，如华润的啤酒业务、一汽和上汽的整车制造、部分央企的房地产业务等；二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的需要，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承担特殊使命和任务，如中核集团的核电装备、中国航发的发动机、航天科工的高精尖武器等；三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代表政府去弥补市场失灵和提供民生保障，如电网、铁路、高速公路以及医疗、养老、婴幼儿教育等。对应上述三类职能，可分别将现有国有企业的业务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和“公益类”，针对业务性质的不同确定相应的治理方式。大量研究和事实证明，对多数竞争类业务，国有企业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可以国有资本参股的方式存在；对功能类的业务，为保障国家安全和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国有资本应进入并控股；对于公益类业务，可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验，鼓励国有企业发挥主导作用，但将之视为特殊企业，并通过立法规定其业务范围和经营模式。

（三）明确定位，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研究国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思路时，上海市特别注重明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功能定位，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①事实上，自2003年成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时，国资监督管理部门就被定位于履行出资人职责。按照出资人的定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其与监管企业之间关系时，要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其行使的是股东权利。这意味着国资监管部门与监管企业之间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关系。作为出资人的国资监管部门与被投资企业的其他投资者也是平等的，共同享有按照公司章程约定和《公司法》赋予的法定权利。作为大股东的国资监管部门不能把自身的管理要求凌驾于《公司法》之上，不能通过简单下指令、提要求让监管企业去执行，更不能直接干预其日常经营管理活动。

但在实际操作中原本履行的“出资人职责”逐步变成了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婆

^①《意见》特别提出，“政府部门履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行业管理等公共管理职能。国资监管机构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分类推进改革调整和管理。形成规则统一、权责明确、分类分层、规范透明的市属经营性国资监管全覆盖体系”。

婆”：从资产处置的评估报告到对外投资方向和额度，从工资总额的决定到管理层成员任免都需要国资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导致企业自主权受到很大限制，企业的活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制约了国有经济的创新发展。此外，国资监督管理部门还因政府工作需要承担很多公共管理职能。在一些地方，国资监管部门成了政府的第二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有些甚至成了政府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由国资监管部门督促企业完成 GDP 增长指标。这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根源就在于将公共管理职能与出资人职能相混淆，国资监督管理部门无形中承担了本不应该承担的职能。上海市在《意见》中明确了国资监管机构的出资人职能，有利于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创造良好的制度氛围，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四）完善机制，着力推进国有资本优化配置

上海市在调整优化国资战略布局的过程中，探索建立了一个以“决策平台”和“运作平台”为主要架构的国有资本流动配置的新机制。其中，“决策平台”即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分管副市长兼任，副主任由分管副秘书长兼任，成员由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对应的平台公司负责人组成，投资决策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国资委；“运作平台”即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际集团”）、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盛集团”）。这两个平台公司是部分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持股主体，是国资重大重组改制的操作平台，是配置资金的执行通道。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管由市委、市政府任命。除法律法规明确须由市国资委履行的监管事项外，涉及被持股企业的资本运作事项由投资决策委员会决策，平台公司主要负责股权运作和市值管理。持股期间，平台公司仅享有分红权，不干预被持股企业日常经营活动，对企业的监督管理职责仍由市国资委履行。

这一探索可以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运作以及更高层面的国有资本宏观配置机制提供了重要启发。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职责分明。但问题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以服务国家战略、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提升产业竞争力为目标，需要大量资本的长期投入；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主要以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提高国有资本回报为目标，将有可能形成规模可观的国有资本运营收益。前者需要靠后者来保障，后者也需要前者的项目和产业资源。这就需要建立国有资本宏观配置机制，打通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之间的资本形态转换渠道。上海的这种“决策平台”机制可以为建立健全国家宏观层面的国有资本配置机制提供有益借鉴。

（五）搞对激励，注重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上海市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注重建立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2015年上海市出台了鼓励和支持国有企业加快科技创新的九条措施，建立了一整套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和活力的考核、激励、评价机制。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上海市国资委系统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制造业企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强度2.18%，高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0.84个百分点。近30家企业约593亿元的研发投入、创新转型以及境外收购创新资源等费用在经营业绩考核中视同利润。累计安排65.25亿元国资收益支持国家和市级创新项目。建立创新后备、创新骨干、创新领军三级人才体系，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40余名。人是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从国家到企业，成功的发展都需要选好人、用好人。“把激励搞对”是所有改革成功的关键。上海市的这些经验做法，其核心就是要通过上述政策措施进一步激发大家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值得中央企业学习。

参考文献：

1. 胡锋：《上海深化国企改革的实践探索及发展路径》，《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2. 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文汇报》2018年12月18日。
3. 张晓鸣：《着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文汇报》2018年12月18日。
4. 金琳：《上海市国资委积极鼓励国企创新》，《上海国资》2016年第6期。
5. 上海国资：《上海国资大力支持企业创新》，《上海国资》2015年第8期。
6. 唐海峰：《产能过剩治理下的河南深化国企改革研究》，《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暨“产业转型升级与产能过剩治理”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
7. 金兴明：《坚持从严治党着力创新转型全力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迈上新台阶》，《上海国资》2017年第3期。
8. 林万雄：《坚定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自信》，《中国生产力学会第十八届年会论文集》，2015年。
9. 张培荣：《2017上海企业100强经营业绩综合分析》，《上海企业》2017年第9期。
10. 谢志华：《出资者投资偏好与委托受托责任：关系与内容》，《财务与会计》2015年第3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

· 名人观察 ·

关于中美贸易与投资的几点看法

张晓强

中美关系是当前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中，经贸合作又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一年多来，中美经贸合作受到非经济因素干扰，中美经贸摩擦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而且摩擦有向金融、科技、人文交流等领域蔓延的迹象，这种“脱钩”的趋势危害极大。借此机会，笔者谨就中美贸易与投资谈三点看法。

一、要全面客观看待中美建交 40 年经贸合作的成就

40 年来，中美经贸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高度互补、利益交融的互利共赢关系。据中国统计，中美货物贸易额 2018 年超过 6300 亿美元，服务贸易额超过 1250 亿美元，双向直接投资累计近 1600 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出口市场；据美国统计，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双边经贸合作不断发展是企业 and 市场选择的结果，也真实反映了两国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的差异和比较优势。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通过在华投资设厂，紧密贴近零部件供应商与消费者，2018 年在中国汽车销售量达 364 万辆，大大超过在美销售量，占其全球销量 840 万辆的 43%。美国苹果、惠普、戴尔等电子产品生产商，充分利用中国产业配套体系完整、高素质技术工人数量众多的产业链优势，与富士康公司紧密合作，既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手机、笔记本电脑组装基地，也使日本、韩国等国企业的高端显示屏、芯片等关键部件就近参与，形成大规模电子产品生产与国际贸易的多赢格局。两国的经贸合作，带动了就业、消费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切实改善了两国民众福祉，推动了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发展。

二、要公正看待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

美国贸易逆差由来已久，这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低储蓄高消费，以及美国制造业向海外转移等因素密切相关。简单而言，全球都需要使用美元、储备美元；同时，美国储蓄长期低于投资，需要通过贸易赤字来平衡。多年来，美国制造业占比一路下滑，现已降至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1%，国内生产能力不足，需要大量进口来满足消费品和工业品需求。这些因素导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不断增长，2018 年已达 891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理论上而言，美国的贸易逆差对象国可以是多个国家，但基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的条件，中国成为主要的对美贸易顺差国。需要强调的是，这主要是市场驱动的结果。特别是因跨国公司主导生产国际化和价值链全球布局，由于最终产品的生产制造环节主要布局在中国，导致贸易顺差被记在中国名下，实际上大部分利润是由跨国公司所赚取。而且近十多年来中间品贸易快速增长，不少中间品制造国也获取了大量贸易收益，但由于贸易统计是国别统计模式，这些贸易收益很多都被纳入中国的贸易顺差。如果按照得到世贸组织与经合组织等肯定的、更具科学性的“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计算，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远低于“国别统计法”贸易顺差，至少会减少 40% 以上。

此外，还要关注服务贸易。美国 2018 年的服务贸易总顺差已达 2700 亿美元，对华也是常年顺差，2018 年为 490 亿美元。这是美国的产业优势。随着中国服务业开放程度加深，中美服务贸易的规模将会更大，美国也会从中获得更大收益。

三、要充分认识中美扩大双向投资的重要性

近年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推动企业“走出去”的意愿增强，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平稳增长。2018 年为 1300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2%。美国是中国企业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但受经贸摩擦、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力度加大等保护主义因素影响，2017 年以来，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阻力加大。据美国荣鼎公司的统计，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从 2016 年的 460 亿美元下降到 2017 年的 290 亿美元，2018 年更是大幅降至仅 50 亿美元。

与美国相反，中国积极构建有利于外商投资的营商环境，市场开放程度逐步加深。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9 年世界投资报告》，2018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滑，但中国吸引外资总量却逆势上升近 4%，达 1400 亿美元左右。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 年 1—9 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 3%，约 1010 亿美元。美国企业对华投资近年来也

(下转第 110 页)

牢记使命，发扬莫干山精神

高尚全

1984 年的莫干山会议是中国改革历史进程中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改革研讨会。它的意义在于，形成了中国改革史上的莫干山精神。什么是莫干山精神？就是一群具有家国情怀的年轻人用自己的学识建言改革、投身改革的精神。当年那群朝气蓬勃、心怀家国的年轻人有的已成为国家栋梁，大部分人已经步入退休年龄，但是又有一群新的年轻人集聚在莫干山，共同探讨改革话题，长江后浪推前浪，从中看到了莫干山精神的传承不息。借此机会，笔者想向新一代的改革精英传递一些关于年轻人从事改革工作的建议，希望能够对大家的工作有一定的帮助。

一、不忘改革初心，牢记改革使命

2019 年 8 月 22 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刊载了笔者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艰辛探索》。笔者在文章中提到，在国家的发展已经到了全面小康并即将迈入实现现代化的征程之际，中央部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个主题切入改革的场景，自然就得出“不忘改革初心，牢记改革使命”的命题。那么改革初心是什么？改革使命是什么？笔者理解，改革初心需要回答“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改革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要实现共同富裕。使命是什么呢？使命就是要建立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改革的初心和使命是莫干山精神的基石。一个年轻人，必然是有了要使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初心，才会有建言改革、投身改革的勇气；必然是有了正确的认知和知识的积累，才会牢记建立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使命。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命，是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一步步确立的。这一改革使命是从实践得来的认识，又将指导我们的实践。年轻的改革战士们，或者没有亲身完整经历从计划经济一步步走向市场经济的艰难改革历程，但是相信诸位年

轻的朋友们早已从各种书籍中获得了改革的传承，明了我们从计划到市场改革进程中的一次次博弈，莫干山会议本身就是改革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家直观了解的最近一次重要博弈，是关于民营经济。当时私有制消灭论、民营经济离场论一度流行，让企业家人心惶惶。在舆论沸沸扬扬之际，笔者在复旦大学演讲时着力抨击了这些谬论。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的讲话一锤定音，破除了这些错误言论的干扰。如果我们的年轻人对极左、对计划经济、对思想禁锢没有足够的警惕，甚至把这些拿来当作解决前进过程中遇到问题的办法，那么中国的改革事业就会遭受重大挫折甚至走回头路。可以说，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对改革的怀疑、干扰还会不断出现，未来需要牢记改革初心和使命的年轻改革者们为中国的改革事业保驾护航。

二、解放思想、务实肯干

解放思想贯穿中国 40 年改革的进程。是解放思想、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才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在前无古人、外无借鉴又担负着双重转型任务的改革摸索过程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解放思想。年轻人有与时俱进的天然优势，因为年轻人的思想更容易打破陈旧、机械的教条，思想不被束缚，才能不论姓“资”还是姓“社”，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去吸收全世界的优秀文明成果。解放思想是我们改革前进过程中的一大法宝，它帮助我们克服了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在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和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增强独立思考的能力非常重要，努力做到不唯书、不唯上、不唯网。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哪些过去的提法需要进一步革新？哪些思想认识需要进一步解放？这是时代交给年轻人的任务。

在思想解放的同时，又必须脚踏实地。年轻人要挑起改革的重担，必须要有务实肯干的精神。孟子云：“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中国的改革任务，利益涉及面广，各地情况纷繁复杂，任何一个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既需要出台前细致严密的调研，也要对相关理论进行孜孜不倦的研究，只有把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既有利于当前问题的解决，又有利于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年轻人在思想解放方面具有优势，在脚踏实地的务实操作上可能会存在经验不足的劣势。为此，我们一定要了解，只有务实才能细微至千家万户之中，才能对改革的成效获得最可靠的信息。只有务实肯干，才能踏踏实实地完成各项改革工作任务；只有务实肯干，才能明明白白

地了解改革中的障碍；只有务实肯干，才能实事求是地纠正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三、投入到基层实践中去

中国的改革事业之所以能够在前无古人、外无借鉴的环境当中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除了解放思想之外，最为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将基层探索作为顶层设计的重要实践基础，从而使得基层的有益探索能够及时上升为国家政策。众所周知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安徽小岗村基层探索的成果。这一点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特别强调要总结基层经验，专门设立了试点司开展试点。体改研究会当时确立了一个规矩，经常要到基层搞调查研究，开年会最好在取得改革成功经验的地方。过去的成功都不是按照规划，而是群众的首创精神，经过改革实践，总结推广来的。中央只是在改革方案中提出一些原则，指出改革的基本方向，尊重群众的创造，允许群众的创造，宽容改革失败，由下边试、下边闯、下边探索，这就是在改革初始阶段走出的一条路。实际上，真正影响很大的改革都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基层经验，譬如莫干山会议所在的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准确把握简政放权、强化监管、优化服务的辩证关系，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驱动，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并为地方政府全面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了整体性的解决方案，成为向全国复制推广的改革经验和政府自身改革的目标模式。年轻一代要挑起改革的大梁，必须到基层去锻炼。只有经过基层的锻炼，才能对中国国情有深刻的认识。有一些改革措施，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到了基层就会变样，起到一些反作用。这就是不了解基层情况，只听汇报的结果。比如说减税，中央已经屡次宣示并采取措施要减税，但是 2018 年上半年税收收入增速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近 10 个百分点。这个数字到底说明了什么？必须要听取基层的意见，要科学全面地分析。因此，改革决策者必须了解基层情况，听取基层反馈。对年轻人来说，投入到广阔的基层实践当中去，是增长本领、投身中国改革事业的最佳途径。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李蕊

关于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一些认识

范恒山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要积极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为发展增动力，为合作添活力，壮大中华民族经济”。他还强调，两岸要应通尽通，提升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这些要求为打造两岸共同市场、推动两岸经济高质量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笔者就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意义、目标、路径等基本问题谈一些初步的认识。

一、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内涵与意义

（一）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概念和内涵

据有关资料，共同市场的概念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被提出来了。它的实质是，借助适宜的机制与手段，推动不同区域间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以实现共同发展和整体竞争力提升。两岸共同市场的概念由萧万长先生提出。自2000年以来，他在多个场合提出两岸应建立“经济共同市场”，认为两岸经济具有互补互利互惠的特性，如果能够成立共同市场，就能做到真正的双赢。萧先生的一些论述，为研究廓清两岸共同市场的内涵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两岸共同市场的内涵应该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作为共同市场，它应该体现一般共同市场所具有的本质规定和基本要求；而作为两岸的共同市场，它理所当然应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以民族认同、民族情感交融为基础和指向。概括起来应体现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贸易投资便利。应全面消除两岸间存在的贸易障碍，逐步实现零关税、零壁垒；取消投资领域和行业的限制，实现无障碍双向投资。二是要素流动自由。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自主配置，实现自由流动。三是产业融合发展。以产业

链、价值链为基础，两岸在资本、技术、标准打造、品牌建设等多领域开展深入合作，产业实现融合发展。四是重点领域联通。围绕“新四通”提升质量和水平，并促进各领域各环节全面融通，实现两岸经济贸易等的优势互补、相辅相成。五是协同有效治理。在把握制度差异的前提下，建立有效的市场协同治理机制，协调两岸产业、财政、货币、区域、对外开放等市场政策，解决共同市场建设中面临的具体问题。

（二）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意义

推进两岸共同市场建设是海峡两岸中华儿女应承负的一项重大任务，具有特殊意义。

一是有利于应对逆全球化带来的冲击。经过这些年的合作发展，“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欧美”已逐渐成为两岸供应链融入全球市场的主要方式，也成为促进两岸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近两年，美国发起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贸易战，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横行，逆全球化行为涌动，对全球的产业分工形态、技术创新体系等带来了冲击，从而对世界经济发展，也对两岸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推进两岸共同市场建设，发挥台湾在部分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和大陆在市场与新技术发展领先等方面的优势，各施所长、融合配套，能够有效化解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合力促进中华民族经济发展。

二是有利于推动两岸经济高质量发展。大陆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相关制度的创新，两岸共同市场建设必然推动两岸的经贸合作在内容、模式、路径上进一步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而在具体操作上，打造两岸共同市场有利于两岸经济政策和产业发展协同，从而减少不良竞争，并为台企在大陆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

三是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经济在亚太区域和全球的竞争力。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不仅能够通过两岸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和优势互补促进经济加快发展及质量提升，也能促进两岸在参与国际经济发展中的协同合作，特别是给台湾参与到亚太区域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创造有利条件，这将有效提升中国人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也能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经济在区域和全球的竞争力。

二、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一）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良好机遇

一是两岸具有较为扎实的经济合作基础。从贸易投资看，两岸贸易额从 1978 年的 0.5 亿美元增至 2018 年底的 2262.4 亿美元。截至 2019 年 9 月，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

111142 个，占比 11.2%；实际使用台资 692.8 亿美元，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台资占大陆累计实际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 3.4%；若加上台商经第三地的转投资，大陆累计实际使用台资超过 1300 亿美元。从体制机制看，“三通”的实现为共同市场的要素流动提供了基础保障，而《海峡两岸经济框架协议》（ECFA）的签署成为两岸经济重要的制度化安排。此外，两岸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迅速缩小也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二是大陆作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将继续保持吸引力。大陆是全球内需潜力最大的市场，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潜能和机遇。2018 年大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 38 万亿元，半导体进口及汽车、液晶显示屏、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的销售量都居全球首位。有关国际机构预测，2021 年中国大陆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作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大陆与台湾在生产、消费结构上的互补将给台湾发展及台商创业带来广阔空间。

三是高质量发展继续推动提升创新水平。大陆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制造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在一些领域弯道超车，逐步由“跟跑者”向“领跑者”转变，且自主品牌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不断发展延伸，为“两岸制造”向“两岸创造”“两岸智造”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台企深度参与大陆市场、摆脱代工生产路径依赖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新一轮扩张机遇。

四是重大区域战略实施带来创新发展新空间。近年来，大陆陆续推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重大区域战略。这些战略内容广泛务实、措施开放包容，制度创新试验空间宽广，不仅为拓展两岸投资贸易活动提供重要舞台，也为打造协同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赋予适宜载体和有利条件。

（二）打造两岸共同市场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是台湾现政权逆向操作加剧。自 2016 年 5 月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即开始推动其“降低对单一国家、单一市场的依赖”“亲美远中”的国际经贸布局。台湾当局一方面制定了严格的对大陆投资的政策，另一方面极力推动“新南向政策”，分散台商对大陆的投资，还积极配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试图搬开两岸经济联系这一两岸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对台商带来了较大困扰。

二是美国阻挠两岸深入合作。美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大打“台湾牌”，企图“以台遏华”，自 2018 年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动作。如，通过有关法案授权美国军舰定期停靠台湾高雄港或其他适当港口、出笼“台湾旅行法”改变以往对美台人员往来的严格限制政策、将设在台北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CCNAA）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TCUSA)，还炮制出台了多个涉台法案。

三是两岸经济深度融合不足。随着大陆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加之大陆本土企业快速向产业链上游攀升，两岸产业竞争性逐渐增强，两岸经济合作亟需新的动能推进，两岸经济整合也需从功能性整合过渡至制度性安排。目前两岸产业链看似连接紧密，实则相当程度上受到欧美等大跨国公司控制，对欧美市场高度依赖，而大陆在一定程度上形同为“飞地”，台企对大陆内需市场的融入总体上说还不够深厚。

三、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原则与目标

（一）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原则

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应着眼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秉承求同存异的精神，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总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两岸同胞应交流互鉴、包容协商，增强政策协调、推动应通尽通，携手促进两岸经贸投资便利化和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你依靠我、我支持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协同发展格局，不断壮大中华民族经济，使两岸人民都过上富足美好的生活。

（二）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目标

打造两岸共同市场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聚焦重点，根据两岸共同市场建设的演进特征，设定不同发展阶段的工作目标。

近期应着眼于当前需重视的重点领域和问题，努力打造相关基础条件。大陆进一步扩大开放服务业等领域，根据实施情况，择机推出 ECFA 2.0 升级版。进一步推动“惠台 31 条措施”的贯彻实施，着力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探索建立合作平台，就建设共同市场涉及的关键方面开展先行先试。

中长期应着力推动融合协同发展的制度性构架，并依托突破关键领域提高整体融合水平。重点建立两岸产业政策协调机制，通过协商形成两岸产业发展顶层设计；夯实“新四通”配套体系，推动更多方面协同发展；提高社会融合水平，使在大陆的台胞深度融入大陆社会，获得同等经济社会生活待遇。努力打造“两岸共同家园”“两岸命运共同体”。

四、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路径与措施

（一）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路径

基于现实状况和未来目标、一般规律和特殊要求等的综合考虑，打造两岸共同市场

应采取“总体设计、双轨推进、由易到难、相机扩展、灵活应变”的操作路径。

总体设计：在认真分析、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制定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总体规划或实施方案，就建设的原则、目标、阶段、重点及举措等做出阐述。双轨推进：一方面有效发挥政府机构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大力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工商企业的作用，全面调动各方积极性、创造性，形成建设两岸共同市场的活力与行动。由易到难：结合不同阶段的目标，充分利用现有基础，从较为具备条件、操作比较容易的领域和环节做起，逐步走向深入。相机扩展：及时总结成功经验，加强以点带面，不断巩固和扩大工作成果。灵活应变：充分考虑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两岸共同市场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务实确立建设的重点、节奏和方法，制定风险应对预案，推动相关工作稳妥有序开展。

（二）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措施

一是协商提出两岸共同市场规划思路。由两岸共同组成专家团队，对两岸共同市场建设的重要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和交流，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提出战略目标、基本原则、重点任务、机制保障等思路，并对重点事项明确操作时间表与路线图。

二是推进惠台政策评估与配套工作。目前已经公布的国家惠台“31条”和1000多条地方省市的惠台政策，包含大量促进两岸经济要素流动的政策措施，许多都与建设共同市场相关。应加强梳理并科学评估，结合共同市场建设，进一步提出配套措施。国家刚刚宣布新的惠台“26条”，正是相关政策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对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十分重要。

三是开展两岸共同市场建设试点示范。结合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实施，在大陆一些台企相对集中、对台交流交往相对密切、合作成果相对丰硕的省份建立两岸共同市场示范区，为推进两岸共同市场建设探索路径。比如，在昆山设立两岸共同市场集成电路、面板产业集群示范区，在京沪深设立两岸共同市场研发与总部示范区，在海峡西岸经济区设立两岸共同市场“新四通”示范区等等。

四是着力克服影响两岸投资贸易便利化的突出问题。紧扣促进贸易投资便利的主要因素，结合大陆新近出台的一系列扩大开放举措，从实际出发对台比照适用。重点是降低台金融服务业等在大陆投资门槛限制，简化通关查验程序，创新海关、检验检疫、工商、边检等部门贸易管理和服务模式等。

五是深化两岸高科技产业与金融合作。强化两岸研发联盟和推动产学研有机结合，共同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走协同创新发展道路。鼓励共同开发核心技术，打造有自主

控制能力的产业链条。在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电动车产业等领域互相取长补短，打造从上游到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摆脱关键技术、零组件受制于人的现状。鉴于两岸工业发展战略契合度较高，可适时研究工业发展战略对接方案。此外，应努力拓宽台商直接融资平台，鼓励台企在境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

六是积极探索两岸企业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适宜路径。重点是引导两岸企业合作进入“一带一路”沿线的经贸合作园区，形成两岸在海外市场上的合作示范，创新两岸优势资源对接合作的方式。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李 蕊

（上接第 101 页）

稳步增长。美国特斯拉公司一期投入 25 亿美元的上海新能源汽车厂 2019 年 10 月已试生产。据中国商务部研究院 2019 年 10 月发布的报告，2018 年美国企业在华投资收益率达 11.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 2.3 个百分点。10 月 24 日，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一期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在总排名中继续获得大幅提升，由 2018 年的 46 位上升至 31 位。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 80% 的美资企业将中国视作重要市场。同时，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加深也吸引了证券投资的快速增长。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仅 2018 年中国证券投资项下净流入就超过 1000 亿美元。

扩大中美双向投资是符合双方利益的正确选择。美国在能源、工业制造、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有巨大的投资需求，中国企业也愿意扩大对美投资。美国不应在要求中国放宽外资准入的同时，自己加大限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滥用国家安全审查进行限制。中国有着庞大的内需市场，产业链完整强大，经济增长空间巨大。我们欢迎美国企业在金融、制造业、医疗、文化创意等广泛领域以多种方式开展投资，希望本着平等相待、公平开放的原则，不断扩大中美双向投资。

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不符合经济全球化趋势，损害区域和全球增长前景。在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代，扩大合作、实现共赢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衷心希望，中美能够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贸易和投资关系达成符合双方人民利益、符合市场期望的安排，推动中美经贸合作行稳致远。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责任编辑：李 蕊

遏制金融脱实向虚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贾康与埃里克·马斯金教授的对话

贾康：遏制金融脱实向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个主题的现实意义非常明显。学者为了解决现实问题，非常看重理论如何分析和认识现实，有句老话叫“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我们首先要观察一些经验性的东西，像埃里克·马斯金教授这样的理论大家，一定非常关注金融业发展中相关的国际经验。根据您的了解，金融业本来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但是出现了脱实向虚问题，基于国际经验，您认为形成这样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可以举出的最近金融脱离正常轨道而发生泡沫的虚拟化的最典型例子是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再早一些如 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这些年中国学者讨论这个问题特别强调，金融本来应该把出发点和归宿落在服务整个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上，但是在金融危机中，人们感受到金融有一种自我循环、自我扩张的特点。比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开始是以无抵押方式发放住房贷款，然后比较普遍地证券化，再然后又衍生工具化，最后变成链条的断裂，就是脱实向虚，自我循环，自我扩张，自我膨胀。

埃里克·马斯金：从经济学的角度，为什么发生了 2008 年金融危机？所有金融危机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杠杆率太高。银行或者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提供贷款时，不仅仅把银行自有资金投入贷款，而是把借来的钱又贷了出去，通过这种杠杆方式进行放贷。要强调的是，在现代世界，金融毫无疑问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代世界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家、创业者推动的，他们有新的想法，通过投放到市场中的产品和服务推动整体社会的经济进步，但企业家们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也是金融行业非常关键的原因。我用“银行”暂代所有对创业者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他们给企业家提供资金支持，也会对企业家的观点进行一定的评估。但是对银行来说，

^{*} 本文根据著名经济学家贾康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教授在 2019 中国银行保险业高峰论坛上的对话整理形成。

他们并不总是有足够的自有资金用于投资，所以需要从其他银行拆借，从其他投资者募资，再通过放贷的方式给企业家提供资金支持。

杠杆其实是可以发挥良好作用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支持更多企业家；对银行来说也有好处，能够放大自己的放贷能力，尽可能追求更多的投资回报。同时，杠杆也有负面影响，银行放贷有一定风险，银行也应该承担一定风险，但如果一个银行在放贷时使用的是杠杆，用借来的钱放贷，最后又无法收回，那么不仅放贷的银行会陷入麻烦，还会因无法偿还从其他银行拆借的资金，导致其他银行也可能陷入资金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会产生所谓的锁链效应，就是最初的借款方出了问题，借钱给这个借款方的主体也会出现问题。

由于杠杆的原因，整个金融体系可能处于危险中，甚至对很小的实体经济行业提供服务也会出现这种风险。所以，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主要是房地产市场出了问题，由于杠杆率，房地产市场影响到了整个企业市场，最后影响到了美国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一个银行通过杠杆方式放贷时，不考虑是否会出现系统性风险，那么不仅仅是这家银行本身可能处于麻烦中，其他银行也可能由此被带入非常危险的境地。银行不可能为这个影响负责任，如果想预防这种金融危机的发生，必须要有适宜的监管。

监管是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或者政府机构的规章制度，确保在这些监管措施下杠杆率不会失控。金融危机对美国、欧洲都造成了很大影响，于是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尝试进行去杠杆。比如，美国通过了富兰克法案，以监管大体量银行，尤其是同其他银行有密切业务往来的银行，必须证明即使贷款无法得到偿还，仍然能维持其正常运营。这就是我认为在未来预防金融危机需要继续做的。但不幸的是，我们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总会彻底忘了监管的重要性。所以我现在也很担忧，随着时间的不断演进，我们会忘掉以前非常惨痛的教训。

贾康：您非常清晰地勾画了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视角与思维框架。金融系统在给企业家提供融资支持时，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就是杠杆率，杠杆率必须合理，在可持续运行的状态发挥它的功能。如果杠杆率由于实际生活中的种种原因过高，那么去杠杆的任务自然就成为现实需要，这就联系到监管部门的责任。教授在这样一个核心概念展开讨论时，特别强调了人类在认识这个问题时是反复吃教训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经验就是，人类总是不能很好地吸取历史经验。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从全球视野，从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过程中吸收经验，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埃里克·马斯金教授以卓越的学术贡献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可否将您的研究成果结

合金融风险防范做一个分享？您对中国现在去杠杆率有什么建议？

埃里克·马斯金：我的学术研究专注于机制设计。机制设计其实是反向的工程设计，也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其实是先看结果，再从结果出发，反向设计相关机制。什么样的机制、市场是我们必须要的，什么样的流程、制度安排是我们要先落实的。根据我的理解，因为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卓有成效，已经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希望继续保持强劲势头。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机制设计，是应该在金融行业被推出的，以此来确保可以持续这样一个强劲势头。我在机制设计方面的理论研究，确实能够为金融行业的机制设计提供一些参考。

贾康：这些年，我和一些同道者特别注重研究“新供给经济学”。在需求和供给双方互动形成的经济生活运行中间，我们认为要特别重视在已有的经济学成果之上，在进行以总量调控为主的需求管理的同时，还要注意优化结构的供给管理。这涉及非常复杂的政府如何与市场形成合理的分工合作关系的问题，就像您前面提到的，首先要有一个健全的市场，让企业家在里面发挥作用，企业家需要融资，融资需要得到政府和管理机构的监管。从这个视角上，我们认为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过程中，要特别突出制度供给有效性，这种制度供给的有效性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与机制的健全完善结合在一起。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金融没有现代经济特征，经过40年发展，中国的金融系统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取得很多成绩，同时还必须紧紧抓住制度和机制的建设，而这在现实生活中是有难度的。20世纪80年代，我们已明确地形成一个框架性认识，中国要把原来的中国人民银行提升为管理机构定位的中央银行，这个改革后面跟着的，是人民银行剥离所有金融服务业务，变成管理者，当时的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成为专业银行，行使商业银行职能，这就是整个中国间接金融系统最开始起步的情况。经过这些年，中国间接金融机构又发展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有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机制安排不完善。特别突出的是：一方面，很多市场主体得不到融资支持，比较典型的是许多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企业。另一方面，中国的杠杆率已经非常高了，这些年人们讨论中国金融中所谓的脱实向虚问题，核心指标就落在杠杆率上，中国宏观的杠杆率是把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GDP相比，已经在250:100的水平上。这已经引起中国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在一些重要会议上都特别强调要去杠杆，和您前面说到的机制性的健康化问题，显然是理论联系实际了。请教授再讨论一下，就您所观察的中国现在的高杠杆率和去杠杆的问题，有什么点评或可提出的建议？

埃里克·马斯金：中国的杠杆率非常高，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有一个能够缓解当前情况的解决方案，即去除高杠杆的解决方案，那就是资本化，资本化程度要更高。这样不需要其他变动，只是对目前债务进行资本化。如果降低资金量，可能会降低企业活力，只能对现有债务进行资本化，这是一套好方案。另外，要扩大资本来源，现在大部分借款来自银行，中国有股票市场，但并不是非常成熟，没有在融资方面发挥和银行同样大的作用。另外，还有私有领域的融资，比如私募基金，如果中国能在私有市场这部分取得更长足的发展，那也不失为一个解决方案，能给融资带来更多资金来源。目前为止，中国是资本非常富有的国家，问题就是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本，让它们产生最高的生产效率、生产力。相信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会在私有市场取得更多进展。

贾康：相关的资本化，比如说债转股，在实际生活中还有不少争议和困难。这些年虽然私募基金有发展，但在整个运行系统里，它的比重还是相当低的，中国的股市、债市、私募基金等合在一起，直接融资的部分也就是 20% 左右，80% 左右是间接融资，是银行系统以贷款来实行融资支持经济生活。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是直接融资为主。相比之下，在杠杆率的表现上，间接融资容易形成重复杠杆率的计算累计，如果更好地发挥直接融资作用，提升它的比重，我们特别担心的宏观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就削减了。提升直接融资的比重，更有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私募基金和资本化的运行过程，可以让要素更充分地流动。我的观点和您的逻辑是否一致？

埃里克·马斯金：完全一样。我并不是说银行的贷款要降低，他们应该保持现有水平。您说的直接融资的部分，或者我说的私有市场的这块，应该得到更大鼓励，应该在未来几年中大大增加，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经济向前发展。

贾康：去杠杆当然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必须控制中国金融风险的原则，但在操作过程中碰到了这样的困惑：按照去杠杆的取向，最严格地控制所有融资活动，而中国的融资活动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80% 左右都是贷款发放，大量去杠杆就落在了对贷款可得性一压再压。指标上看起来，体现了去杠杆的一些进展和成绩。但您刚才专门强调了，并不是要减少整个贷款规模，而是让这个规模发挥作用的同时，更多让直接融资这些经济活动相关的机制成长起来。在实际操作中，去杠杆，控制金融风险，管理上一看到有任何风险就按住不许动了。这样一个看起来以贯彻中央精神去杠杆的控制风险，可能带来新的风险。经济生活中的创新要有弹性空间，需要直接融资等承担一定的风险试错和创新力

量的成长，也需要在贷款发放过程中必须完成一些机制转变，现在却都被死死按住，似乎这就是防范风险，却把创新活动的可能性一起压低了。带来的新风险是什么？是中国经济在阶段转变过程中，必要的一些速度不能得到保持，更多体现出下行压力，而我们想追求的活力却不能在其间、在所有的去杠杆过程中找到替代。这个问题，您是否也可以谈一些看法。

埃里克·马斯金：在这个观点上，我们也有很多意见相同之处，尤其是在未来经济成功方面，中国必须要找到更多资本支持，通过传统的银行系统可以做，但政府也需要允许其他形式的融资行为存在，包括外资也应该被允许进入市场，现在有很多外国投资者很期盼能够到中国投资。这对中国的发展是好事，从经济和政府的角度来说都是有益的。

贾康：对外资开放方面，中国官方管理部门从领导人到具体操作环节的官员已经多次表态，而且有一系列实际措施。最新的消息是，进一步提升了外资在中国兴办银行和金融机构持股的比重，扩大了业务范围。与您说的似乎形成了一个对应。当然我们也希望听到您再给我们提出这方面的点评和建议。

埃里克·马斯金：您刚才提供的信息比我了解的情况更为符合现实。从外界看中国，中国传统上一直还是比较抵制外资进入的，尤其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通常情况下要面临较高的监管审批成本。我也很高兴听到，中国进入新的阶段，很多过去针对外国投资、外资企业的障碍会被逐渐放松。从这个角度来说，情况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尤其要提到的，因为多种原因，目前处在一个反全球化的浪潮中，在美国、欧洲是如此，基本上每个角落，包括拉美都是这样，我觉得中国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力量，去抵制反全球化的情绪和浪潮。如果中国能发挥领导作用，能够鼓励全球化进一步发生，能够鼓励更多外资进入中国，将会向世界传递正确的信号，这是很重要的。

贾康：教授对现在“全球化”的情况做出的评论，体现了一个有深厚学养的学者基于学理所强调的。在人类文明提升发展中，全球化体现的是主潮流，全球化是顺应实际生活中，我们理论上所说的生产力发展、生产要素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更流畅更便捷流动来调动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客观需要。而且教授肯定了中国在这方面的态度，我们作为研究者也认为，中国理所当然应该在认清这种反全球化只是逆流的情况下，继续义无反顾

地推进全面开放，就是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地拥抱全球化。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您看到北京、上海的直观面貌跟纽约、曼哈顿差不多了，但是实际上硬件迅速提升的同时，我们的软件，比如科技创新水平、社会治理方面的一些内在机制仍然是欠发达的，还有明显差距的。所以，在中国推进全球化过程中，我们的力量相对有限但可能别无选择。中国要跟世界其他经济体更多地交流，寻求共识，更多在推进全球化所带来的共赢、共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教授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意见。

中国继续发挥作用，有待于中国能够在和平发展道路上成长起来。中国的领导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也是如此。从这个视角来讲，我也注意到您作为有影响的学者，在若干场合曾经对中国相关的经济研究谈到一些看法。您提到的中国经济研究和与之相关的政策优化研究等等，还存在一些不应忽视的问题，是否可以谈谈您在这方面的看法和认识？

埃里克·马斯金：我想强调一下，首先，中国目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个领军者。在过去的 40 年，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国家如何通过全球化实现致富，中国的出口能力也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引擎。但是这个全球化过程，主要是关注于进出口，是中国一些实体产品的进出口，极大地借助了全球化的便利。但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说，中国没有完全把自己整合到全球金融市场中，以及中国的货币并不是全球贸易体系真正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以，要使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依然是非常困难的。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未来应该有什么发展策略，如果中国选择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发展，可以给其他国家，比如给美国树立更好的榜样，尤其是现在在美国，这种反全球化的趋势非常强。

贾康：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仍然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外资进入仍有不便利的障碍因素，我认同您的判断。但总的发展趋势，还是体现着便利程度在逐渐提高。作为过来人，我们印象很深刻，改革开放之前是闭关锁国，改革开放之后在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了改革是现代化的关键，而改革需要开放的促进，用开放倒逼改革。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一句话是“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由于有这种阻碍因素，外资进入中国时往往因这样那样的理由，形成了一些比较高的摩擦系数和实际困难，而且中国内部要构建统一市场，生产要素顺畅流动也碰到了很多问题。比如很多领域中，民营企业在准入方面碰到了障碍，所以这几年的改革反复强调，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对民营企业等的发展也要降低准入门槛，让他们充分地实现要素流动，发挥他们的潜力

和活力。所以，我们的改革放在全球化过程中，跟您强调的对外开放要连成一体，而且改革和开放应该互动，某些情况下要特别借助开放倒逼改革。中国开放的大门应该会越开越大，而不会变成收紧。当然，值得忧虑的是，在实际生活中，说得多，做得少，只说不做的情况确实存在，我们作为研究者也感觉很焦虑。但现在的总体趋势，体现中央意图的事情还是有强烈信号的：第一，在不久前最高决策层明确地说中国的海南岛要建成全球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港，这是让外资在自由贸易港里面尽可能地发挥作用；第二，在中国的珠三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把广东和香港、澳门发展成一体化的区域，打造大湾区内在的目标就是争取把这个区域打造成类似于美国的纽约、旧金山及日本的东京这样在全球排名最前的湾区和增长极区域。在规则上，显然不可能让香港、澳门往广东现有规则上靠，而是必须让广东的规则同香港、澳门的国际惯例规则对接、对标，形成更有一体化特征的大湾区增长极，这是中央非常明确的可以称为战略部署的举措；第三，上海自贸区也是以改革为重点，要求可复制，经过几轮复制，全国已有十几个自贸区，投资的便利程度在这些区域明显提高。虽然有种种矛盾，不同的认识和实际生活中的阻碍，但是您期盼的，也是我高度赞成的，中国很多实际工作者和学者都赞成的，是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欢迎外资进入中国更好地共同发展，这是大趋势。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中，我们可以给予希望，已有的部署可以促成更多的积极成果。

埃里克·马斯金：这一点我也非常认同，其实中国政府非常明智，包括在改革开放上采取了逐步推进的策略。相信大家都认同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对的，出现争议的地方可能是速度方面，可能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应该要更快。但我个人觉得，我们要时刻去调控这个速度，让它保持适中、稳定，或者是稳中有快。在这个策略中，我看到了中国政府的很多智慧，包括您刚才说的自贸区，中国已经有超过10个自贸区了，也是逐步开放，先有上海，然后是其他的地方再去复制，而不是说所有城市都一起做自贸区，如果太着急做这些事情，可能会形成反效果，可能都做不好。所以，这种逐步推进的方式是更容易把控的。

过去的25年中，我每年都来中国，每次都留下深刻印象。中国发生的变化，使我觉得和中国的关联非常密切，因为我的一些学生在中国任职了，他们也成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我感觉我也是中国大家庭中的一员，也期待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我时刻关注着，也会为之做出我的贡献。

责任编辑：李蕊

当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建议

2019 年 10 月 25 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第 123 期“经济每月谈”，主题为“当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建议”。会议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张晓强主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中国工商银行研究所副所长樊志刚、国经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分别发表演讲，主要观点如下。

一、当前经济形势

张晓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从过去的高速增长时期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时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 90 万亿元人民币，约为 13.6 万亿美元，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经济总量的 2.7 倍。2020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年，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重点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动能转换，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而不是过度强调高速增长。

针对美国领导人在内阁会议讲话中称 2019 年中国经济表现系 57 年来最差的不实言论，张晓强指出，首先，这一言论没有实际的统计数据支撑，1989 年和 1990 年中国经济遇到了困难，当时的 GDP 增速仅为 4% 左右，表现尚不如 2019 年。其次，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 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前三季度保持了 6% 以上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全球增长预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首屈一指。再次，从 2008 年到 2018 年中国对全球 GDP 增量的贡献率平均达 34%，2019 年中国经济增量将超过 8000 亿美元，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一）从经济增长视角看当前经济形势

卢中原认为，中长期增长的主要供给面要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决定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速度的是三个供给面要素，即劳动力、资本和生产率。现在前两个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劳动力已经出现了负增长，资本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降低而放慢，那么就只有靠第三个生产率的增长来拉动。但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近年来在大幅度波动中逐步下行。

外部环境趋紧多变，短期下行波动加剧。中国经济现在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稳定，但稳定不是说短期没有波动。趋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也就是国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这种态势会干扰我们的增长态势。另一方面，欧盟最近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针对中国的声音，指责中国各种财政补贴扭曲了经济运行。

张永军认为，长期看，近些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出现下降，同时劳动力参与率降到了76%左右。这些因素变化影响到储蓄率，进一步影响投资。这些年投资增长率出现了明显下降，因此决定了现在潜在增长率或者说趋势增长率下降。历史上不少国家在经济增长方式转换过程中出现了金融危机，导致大起大落。总体看，中国到目前为止经济运行比较平稳，说明中国宏观调控把握得比较好。短期看，需求方面，整个零售额的增长是减速态势，其中汽车消费影响比较大。投资方面，经过多年建设，中国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同时又处在后工业化时期，投资增长下滑是必然的，2019年大概在5%左右。物价方面。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看，更多受到供给方面的冲击，使得部分产品供给出现问题，尤其是猪肉供给出现不足之后，价格上涨很快；而从生产价格指数（PPI）看反而是下降的，2019年9月同比下降1.2%。价格结构性差异说明，目前CPI的上涨不反映总量供求关系。可见，供给和需求出现问题也是造成经济下行压力的因素之一。

（二）从金融视角看当前经济形势

樊志刚认为，金融机构特别是大银行在整个逆周期调节中发挥主力军作用，但也应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第一，资本金补充存在压力。银行给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发放贷款支持实体经济，以及根据银行整顿要求过去表外的不占用资本的资金必须回到表内等因素，导致资本金不足。第二，低成本资金来源稳定性下降。中国由于老龄化等因素导致储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贷款增长速度。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资金来源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第三，风险因素。2019年以来，虽然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大，但银行资产质量仍持续改善。截至6月末，银行业整体不良率为1.81%，但是结构上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导致总体不良率仍面临较大的反弹可能。

二、政策建议

卢中原认为，短期的宏观调控可以减少经济波动，但是解决不了中长期下行的态势。劳动力增长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储蓄率降低，都不是短期政策能解决的，需要中长期的制度性变革。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我们应对中长期经济下行压力要抓的根本，接

下来可从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改进、制度变革等五个方面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樊志刚认为，当前在稳增长方面，银行通过贷款等方式支持实体经济，发挥了比较明显的作用，自身不良率仍然处在比较合理的范围。下一步，银行在支持稳增长、积极配合逆周期调节方面还有一些压力，尤其是需要补充资本金。目前，央行推出了一些新办法，比如发行永续债等。

张永军认为，一是社会总需求方面。经济增长下滑可能存在社会总需求不足，宏观经济政策要加大一些重点项目投资，出台一些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扩大社会有效总需求。二是财政政策方面。未来一段时间，财政政策更多是巩固减税降费成果，以稳为主，使它获得更好的效果，不宜再加大力度。同时，在财政支出方面，可以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加快进度等方式，发挥更大作用。三是货币政策方面。过去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工业，工业中抵押物比较充足，但是现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服务业，服务业大多是轻资产行业。如果还要求像工业那样，按照大体相同的标准做抵押才能贷款，显然这些服务业企业没有足够的可抵押资产。因此疏通货币传导机制很重要，相应的要做这方面金融管理制度改革。四是劳动力。城镇化目前存在一些障碍，尤其是要加快解决差不多 3 亿异地就业、异地生活人口如何落地的问题，包括就医、教育等方面。如果能够尽快实现失业保险和医保全国统筹的话，那么会有更多农村或者小城市劳动力转移到大中城市去，对于劳动力供给有积极的影响。五是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的整个公共服务水平比城市低，这对农村消费有一定影响。比如中部农村地区冰箱、彩电、洗衣机等电器的普及率已经很高了，但电网还存在薄弱环节，导致使用电器受到一定影响，农村道路对汽车消费也有一定影响。下一步针对农村公共服务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改造扩容。

张晓强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最近不仅 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还有以美国布鲁斯金学会为代表的一些著名智库的研究分析都指出，目前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世界贸易组织（WTO）估计 2019 年的国际商品贸易只能增长 1%。这是受保护主义高关税的影响，也和若干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调整，或者说改革进展缓慢密切相关。关于中美经贸摩擦，IMF、日本、韩国、欧盟都认为，如果继续扩大，会对全球的增长和贸易带来消极影响，都非常关注 10 月刘鹤副总理和美国姆努钦财长、莱特希泽贸易谈判代表达成的一些重要成果。这些外部因素也是我们研究 2020 年对策客观上必须考虑的。

（梁鹏）

责任编辑：李 蕊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9年10月中旬以来，国际权威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年10月15日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再度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0%，比7月份的预测低0.2个百分点，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IMF同时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4%，比7月份的预测低0.1个百分点。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在发布会上表示，全球经济增长同步放缓，但经济复苏的基础却并不广泛，各国仍要保持警惕，以汽车业为代表的制造业活动急剧恶化是导致增长疲软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和欧元区的服务业也开始出现走弱迹象。

IMF预计，发达经济体2019、2020年经济增速均为1.7%，其中2019年增速比7月份的预期下调0.2个百分点，2020年增速预期维持不变。与7月份相比，IMF将美国2019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2个百分点至2.4%，但将2020年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2.1%；将欧元区2019、2020年经济增长预期再次下调至1.2%和1.4%，分别下调0.1和0.2个百分点；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19、2020年经济增长分别下调至3.9%和4.6%，分别下调0.2和0.1个百分点。

戈皮纳特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有力的货币政策支撑经济增长。IMF研究显示，如果缺乏有力的政策刺激，2019、2020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将再下滑0.5个百分点。戈皮纳特强调，在全球经济增速仅为3.0%的压力下，政策制定者已经没有任何犯错误的空间了。

（二）石油输出国组织下调全球石油中长期需求预测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19 年 11 月 5 日发布 2019 年世界石油展望报告，下调了未来中长期内全球石油需求预测，预计到 2040 年全球石油日均需求量为 1.106 亿桶，比 2018 年的预测少 110 万桶。报告认为，未来世界主要能源需求将继续增长，石油仍将是主要能源。预计 2018—2040 年，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将是需求增长最快的能源，年均增长率预计达 6.9%。受电池成本降低和政策支持等因素推动，未来电动汽车市场将快速发展，预计到 2040 年经合组织国家近 50% 的新乘用车将是电动车。

（三）IMF：全球金融条件更加宽松但脆弱性继续累积

IMF 在 2019 年 10 月 16 日发布的半年度《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显示，最近半年来全球金融条件进一步宽松，在近期内为经济提供了支撑，但宽松的金融条件鼓励了金融冒险行为，部分部门和国家的金融脆弱性进一步累积，各国应尽快解决贸易紧张局势，并在金融监管上强化国际合作。报告指出，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包括企业债务负担加剧、机构投资者增持风险更高但流动性更差的资产，以及部分发展中经济体更加依赖外部借款。

IMF 货币和资本市场部负责人托比亚斯·阿德里安认为，自 2019 年 4 月以来，全球金融市场一直受贸易紧张局势影响，并因持续的政策不确定性而失去平衡。他呼吁各国决策机构迅速行动起来减少金融脆弱性。报告建议，各国应通过更严格的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督解决企业脆弱性问题，通过加强监督和披露应对与机构投资者相关的风险，实施审慎的主权债管理手段和框架。此外，各国还应解决贸易紧张局势，敲定并全面落实全球监管改革议程，避免监管标准倒退，并确保在 2021 年年底前从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平稳过渡到新的参考利率。

（四）世行报告：能源与金属价格将走低

世界银行 2019 年 10 月 29 日发布最新一期《大宗商品市场展望》报告称，受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疲软导致的需求下降影响，能源和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将在 2019 年“大幅下跌”，预计 2020 年将继续走低。预计包括原油、天然气和煤炭在内的 2019 年能源平均价格将同比下跌近 15%，并在 2020 年继续下跌。2019 年原油平均价格预计为每桶 60 美元，到 2020 年将跌至每桶 58 美元，分别比世行 4 月的预测低 6 美元和 7 美元。报告同时预计，2019 年包括铁矿石、铜、锌等在内的金属平均价格将下降 5%，而随着全球需求增长放缓影响到大宗商品市场，2020 年金属价格还将继续下滑。而由于受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货币政策宽松等因素影响，贵金属价格 2019 年大幅上涨，预计 2020 年还将进一步上涨。此外，报告预计 2019 年农产品价格将下跌，2020 年基本稳定。

（五）“气候中心”：2050 年全球暖化对 3 亿沿海人口造成威胁

总部在美国的非营利气候科学与新闻组织“气候中心”（Climate Central）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及全球暖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将在未来 30 年内对居住在亚洲、欧洲及北美城市沿海地区的约 3 亿人口造成威胁，而这一数据比早前预测的 8000 万受威胁人口高出 2 倍多。

科学家警告，就算相关政府能大幅削减排放量，但若没有足够的洪水防御，预计到了 2050 年，约有 3 亿人每年都会面临沿海洪水威胁，其中亚洲国家受影响最大，超过 2.37 亿人面临威胁，主要集中在中国、孟加拉、印度、越南、泰国及印度尼西亚。根据这份历时 3 年完成的报告，最新的受洪水威胁人口比之前预计的多，主要是因为亚洲许多地方实际的海拔比旧数据低 5~10 米。

主导这项研究的气候中心资深科学家库珀指出，随着海平面上升及潮水逐渐上涨到人们的住家，各国将面临愈来愈多问题，包括现有的海岸防御措施是否足够保护人们，以及能保护到什么程度。报告也指出，面临威胁的国家建立沿海防洪设施的能力，远远追不上海平面持续上升的速度，而这将迫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迁徙，进而破坏受影响的国家和人民生活的稳定。报告还警告，到了 2100 年，如果温室气体排放仍未改善，日本和菲律宾沿岸每年将因海水倒灌而引发洪水，约有 2200 万人处于危险当中。除了亚洲，荷兰、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迈阿密等欧美国家及城市也面临同样的威胁。

（六）联合国贸发会议：美国消费者成为加征关税最大受害者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2019 年 11 月 5 日在日内瓦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对华加征关税造成双边贸易下降、物价上涨、贸易转移等多重影响。美国消费者成为加征关税的最大受害者，因为关税上升造成进口产品成本上涨，并传导给美国进口企业和消费者。报告撰写人、UNCTAD 国际贸易司经济学家亚历山德罗·尼奇塔表示，即使考虑贸易转移效应，加征关税也并没有为美国带来大量就业机会，“想让就业机会回流，提高双边关税显然并不是合适手段”。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UNCTAD：中国仍是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UNCTAD 在 2019 年 10 月 28 日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19 年上半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达 64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美国吸引外资 1430 亿美元，仍是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中国吸引外资 730 亿美元，同比增长 4%，继续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和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

具体来看，由于美国税改政策对 FDI 的负面影响逐步消退，发达经济体 2019 年上半年外资流入比 2018 年同期翻番，达 2690 亿美元；同时，发展中经济体外资流入保持相对稳定，达 3420 亿美元，占全球 FDI 总额超过 50%。报告预测，2019 年全球 FDI 将增长 5%~10%。发达经济体外资流入将持续出现恢复性增长，发展中经济体吸引外资水平也将基本保持稳定。但 UNCTAD 警告，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摩擦等因素导致外资流动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多。

（二）世界银行：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再度提升

世界银行 2019 年 10 月 24 日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2020》，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继 2018 年从此前第 82 位跃至第 46 位，再度升至第 31 位，跻身全球前 40，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芮泽表示：“中国为改善中小企业的国内营商环境做出了巨大努力，保持了积极的改革步伐，在多项营商环境指标上取得了令人赞许的进步。”

2019 年中国的营商环境评估在满分 100 分中得分 77.9，世界银行打分依据是北京、上海两市及有关部门 2018 年 5 月 2 日至 2019 年 5 月 1 日期间推出的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措施，中国有 9 个指标领域的改革举措获世界银行认定，其中 8 项指标排名上升。

以办理建筑许可为例，中国全球排名从 2018 年的 121 位跃升至 33 位，提升了 88 位，京沪两市推出的简易低风险建筑项目免于环评备案改革、建立分类监管和审批制度及压缩供排水报装时间等改革举措，推动两地平均办理建筑许可全流程耗时缩至 111 天，获该指标质量指数满分 15 分，高于东亚地区 132 天和 9.4 分的平均水平。此外，中国保护中小投资者指标全球排名比 2018 年提升 36 位至第 28 位，办理破产排名提升 10 位至第 51 位，跨境贸易排名提升 9 位至第 56 位，纳税排名提升 9 位至第 105 位，获得电力提升 2 位至第 12 位，执行合同排名提升 1 位至第 5 位，开办企业排名提升 1 位至第 27 位。

（三）IMF：中国运用财政政策缓解贸易争端影响

IMF 在 2019 年 10 月 16 日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与《财政监测报告》，强调了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与全球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同时建议中国调整政策保持金融稳定并实现长期平衡。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提到，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性仍然显著，主要威胁仍是杠杆率。中国的中小企业利润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但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大型企业的盈利能力较弱。在《财政监测报告》新闻发布会上，IMF 预计中国经济增长将放缓，财政刺激措施将扩大赤字。IMF 财政事务局局长贾斯帕（Victor Gaspar）表示，中国近几个月来的

积极财政措施帮助缓解了贸易争端的影响，IMF 对此表示欢迎。中国通过提升消费者购买力，促进了从出口到内需、从投资到消费的转变，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要的一部分。

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IMF 分析包商银行、锦州银行与恒丰银行 2019 年被接管、重组和注资的案例称，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银行资金流动性与资金量及偿付能力的风险。许多中国的股份制银行与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都依靠批发融资，并持有很大一部分风险性非贷款资产。另外，包商、锦州与恒丰这三家银行都有资本金低和盈利能力弱的问题，与许多其他中国中小型银行所面临的挑战类似。其次，银行之间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投资工具之间的联系将扩大危机传递。依赖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融资的银行，自身也往往是主要投资人或投资工具的担保人，而这些银行本身也是类似的定期存单与其他银行债务和资本工具的主要投资人。这样的联系引入了循环性和相关性，一旦危机发生，将加剧冲击的传递。最后，银行发行与购买的投资工具期限错配加剧脆弱性。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常需要依赖于短期批发资金和来自其他银行的注资，来为像对地方政府贷款这样的长期投资项目提供信贷。

对此，IMF 建议中国尽快推出银行风险处置机制，改革资产管理行业与银行的关系。IMF 强调，权衡保持市场流动性与引入交易对手偿债能力风险之间的关系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而官方对银行的隐性担保增加了这一任务的难度。

（四）IMF 亚太部主任：中国货币政策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

IMF 亚太部主任李昌镛在 2019 年 IMF 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召开之际，接受了央视记者的专访。他表示，在整个亚洲贸易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速符合预期，而且中国目前所实行的货币政策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

在有关亚太经济的发布会上，李昌镛主任表示，2019 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全球最富有经济增长活力的亚太地区也面临着显著放缓的压力。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 年中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回落至 6.0%。李昌镛认为，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而言，出现温和的增速放缓是恰当的，是符合预期的，更重要的是保证增长质量及可持续性。对中国目前实行的货币政策，他表示赞赏，认为中国坚持灵活的汇率政策及加速金融市场的开放对经济发展有益。他还提到中美贸易的紧张局势给亚太经济的增速带来影响，但对中美达成实质性的第一阶段协议表示赞赏，希望双方能够尽快在更多领域达成协议。

责任编辑：李 蕊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估计值	2019 年 预测值	2020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 年 11 月)				
世 界	3.8	3.6	3.0	3.4
发达国家	2.5	2.3	1.7	1.7
美 国	2.4	2.9	2.4	2.1
欧元区	2.5	1.9	1.2	1.4
日 本	1.9	0.8	0.9	0.5
发展中国家	4.8	4.5	3.9	4.6
印 度	7.2	6.8	6.1	7.0
俄罗斯	1.6	2.3	1.1	1.9
巴 西	1.1	1.1	0.9	2.0
世界银行(WB,2019 年 6 月)				
世 界	3.1	3.0	2.6	2.7
发达国家	2.3	2.1	1.7	1.5
发展中国家	4.5	4.3	4.0	4.6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19 年 11 月)				
世 界	3.2	3.2	2.5	2.5
美 国	2.4	2.9	2.3	1.8
欧元区	2.7	1.9	1.1	1.0
日 本	1.9	0.8	1.0	0.2
印 度	7.2	6.8	5.8	6.7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估计值	2019 年 预测值	2020 年 预测值
世 界	5.7	3.6	1.1	3.2
出 口				
发达国家	4.7	3.1	0.9	2.5
发展中国家	7.3	3.9	1.9	4.1
进 口				
发达国家	4.7	3.0	1.2	2.7
发展中国家	7.5	5.1	0.7	4.3

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9 年 11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估计值	2019 年 预测值	2020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 年 11 月)				
世 界	3.2	3.6	3.4	3.6
发达国家	1.7	2.0	1.5	1.8
发展中国家	4.3	4.8	4.7	4.8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Forecasts,2019 年 11 月)				
世 界	2.5	2.9	2.6	2.6
美 国	2.1	2.4	1.8	2.0
欧元区	1.5	1.8	1.2	1.2
日 本	0.5	1.0	0.6	0.7
印 度	3.6	3.4	3.5	3.9

注: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8 年		2.5	1.7	3.0
	10 月	2.5	2.2	3.1
	11 月	2.2	2.0	2.6
	12 月	2.0	1.6	2.2
2019 年				
	1 月	2.0	1.5	2.2
	2 月	2.0	1.5	2.4
	3 月	2.2	1.7	2.7
	4 月	2.1	1.8	2.6
	5 月	2.3	1.7	2.6
	6 月	1.9	1.6	2.3
	7 月	2.1	1.5	2.6
	8 月	1.9	1.4	2.5
	9 月	1.8	1.2	2.3
	10 月	2.1	1.1	2.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8 年		3.6	2.1	4.9			
	10 月	4.2	2.4	5.3	52.0	51.8	51.8
	11 月	2.4	0.7	3.8	51.9	51.8	51.8
	12 月	1.8	0.1	3.4	51.4	51.9	51.2
2019 年							
	1 月	1.8	1.1	3.2	50.7	50.8	50.1
	2 月	1.8	0.5	3.2	50.6	50.6	50.0
	3 月	2.4	0.0	5.3	50.5	50.3	49.9
	4 月	1.8	-0.2	3.4	50.4	50.6	50.1
	5 月	2.4	0.2	3.6	49.8	50.1	49.5
	6 月	1.2	-1.1	3.5	49.4	49.5	49.0
	7 月	1.2	-0.7	3.2	49.3	49.4	49.2
	8 月	0.6	-1.3	2.6	49.5	50.0	49.0
	9 月	1.2	-0.6	3.4	49.7	50.1	49.4
	10 月				49.8	50.3	50.0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和 Markit 公司。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7 年		2.4	2.6	0.7
	4 季度	3.5	4.6	2.4
2018 年		2.9	3.0	1.7
	1 季度	2.5	1.7	1.9
	2 季度	3.5	4.0	2.6
	3 季度	2.9	3.5	2.1
	4 季度	1.1	1.4	-0.4
2019 年				
	1 季度	3.1	1.1	2.9
	2 季度	2.0	4.6	4.8
	3 季度	2.1	2.9	1.6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4.2	3.5	4.7
	4 季度	8.7	10.1	14.0
2018 年		4.6	3.0	4.4
	1 季度	5.5	0.8	0.6
	2 季度	5.2	5.8	0.3
	3 季度	0.7	-6.2	8.6
	4 季度	2.7	1.5	3.5
2019 年				
	1 季度	3.2	4.1	-1.5
	2 季度	-1.4	-5.7	0.0
	3 季度	-1.0	0.9	1.5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7 年		2.4	2.6	0.7
	4 季度	2.8	2.9	0.8
2018 年		2.9	3.0	1.7
	1 季度	2.9	2.8	1.4
	2 季度	3.2	3.2	1.7
	3 季度	3.1	3.4	2.2
	4 季度	2.5	2.6	1.5
2019 年				
	1 季度	2.7	2.5	1.8
	2 季度	2.3	2.6	2.3
	3 季度	2.1	2.5	2.2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4.8	3.5	4.7
	4 季度	5.1	5.5	5.6
2018 年		4.6	3.0	4.4
	1 季度	4.6	4.1	4.7
	2 季度	5.2	5.2	3.9
	3 季度	5.0	2.4	5.7
	4 季度	3.5	0.4	3.2
2019 年				
	1 季度	2.9	1.2	2.6
	2 季度	1.3	-1.7	2.6
	3 季度	0.8	0.2	0.9

注: 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比 折年率	同比		
2018 年			1.3	3.9	267.9
	10 月			3.8	27.7
	11 月			3.7	19.6
	12 月	0.1	1.0	3.9	22.7
2019 年					
	1 月			4.0	31.2
	2 月			3.8	5.6
	3 月	3.5	1.7	3.8	15.3
	4 月			3.6	21.6
	5 月			3.6	6.2
	6 月	2.3	1.8	3.7	17.8
	7 月			3.7	16.6
	8 月			3.7	21.9
	9 月	-0.3	1.4	3.5	18.0
	10 月			3.6	12.8

注: 除年度数据以外,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 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8 年	25329		3.0	34530		4.5	-9200
	9 月	2097	1.0	2658	1.2	10.0	-561
	10 月	2101	0.2	2668	0.4	9.0	-567
	11 月	2080	-1.0	2616	-1.9	3.8	-536
	12 月	2057	-1.1	2665	1.9	3.7	-608
2019 年							
	1 月	2070	0.7	2602	-2.4	2.2	-531
	2 月	2091	1.0	2598	-0.1	0.1	-507
	3 月	2109	0.9	2635	1.4	2.5	-526
	4 月	2058	-2.4	2577	-2.2	0.2	-520
	5 月	2103	2.2	2662	3.3	3.3	-558
	6 月	2062	-1.9	2618	-1.7	1.3	-555
	7 月	2074	0.6	2614	-0.1	0.1	-540
	8 月	2078	0.2	2629	0.5	0.1	-550
	9 月	2060	-0.9	2584	-1.7	-2.8	-525

注: 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 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7 年		2773	3004	-231
	3 季度	646	703	-57
	4 季度	374	608	-234
2018 年		2536	-906	3442
	1 季度	528	-481	1009
	2 季度	6	-1209	1215
	3 季度	1239	560	679
	4 季度	763	224	539
2019 年				
	1 季度	817	-156	972
	2 季度	617	729	-113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7 年		2.5	1.6	1.5
	4 季度	0.8	0.3	0.3
2018 年		1.9	1.4	1.1
	1 季度	0.3	0.5	0.1
	2 季度	0.4	0.1	0.3
	3 季度	0.2	0.2	0.2
	4 季度	0.3	0.4	0.4
2019 年				
	1 季度	0.4	0.4	0.4
	2 季度	0.2	0.2	0.3
	3 季度	0.2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2.6	5.2	3.9
	3 季度	- 4.7	1.3	- 2.3
	4 季度	0.9	2.3	1.6
2018 年		2.3	3.5	2.8
	1 季度	0.2	- 0.5	- 0.1
	2 季度	1.7	1.1	1.4
	3 季度	0.5	0.4	0.9
	4 季度	1.5	1.0	1.0
2019 年				
	1 季度	0.2	0.9	0.4
	2 季度	0.5	0.0	0.2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8 年			0.4	8.2	1338.7
	9 月	0.0	0.2	8.0	1307.3
	10 月			8.0	1310.0
	11 月			7.9	1295.7
	12 月	0.0	0.0	7.9	1285.0
2019 年					
	1 月			7.8	1279.4
	2 月			7.8	1271.1
	3 月	0.1	- 0.1	7.7	1255.9
	4 月			7.6	1249.4
	5 月			7.6	1242.1
	6 月	0.0	- 0.1	7.5	1235.8
	7 月			7.6	1237.5
	8 月			7.5	1230.2
	9 月	0.1		7.5	1233.5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7 年		2.4	1.6	1.5
	4 季度	3.0	1.7	1.5
2018 年		1.9	1.4	1.1
	1 季度	2.6	1.7	1.3
	2 季度	2.2	1.5	1.3
	3 季度	1.6	1.1	0.9
	4 季度	1.2	1.2	1.0
2019 年				
	1 季度	1.3	1.1	1.3
	2 季度	1.2	1.2	1.3
	3 季度	1.2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2.7	5.1	3.9
	3 季度	2.8	5.8	4.2
	4 季度	2.0	6.8	4.1
2018 年		2.3	3.5	2.8
	1 季度	3.9	4.4	3.3
	2 季度	- 2.0	4.3	0.6
	3 季度	3.4	3.3	3.8
	4 季度	4.0	1.9	3.3
2019 年				
	1 季度	4.0	3.4	3.8
	2 季度	2.8	2.4	2.6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	(%)		(%)	(%)	口额
2018 年	22829		4.0	20878		6.9	1951
9 月	1914	- 0.9	0.0	1777	0.2	8.2	138
10 月	1937	1.2	11.2	1817	2.3	15.4	120
11 月	1924	- 0.7	2.3	1780	- 2.0	5.8	144
12 月	1934	0.5	- 1.8	1784	0.2	3.4	151
2019 年							
1 月	1955	1.1	2.2	1787	0.4	4.0	168
2 月	1945	- 0.5	5.9	1752	- 1.7	6.0	193
3 月	1962	0.8	2.9	1792	2.3	6.4	170
4 月	1931	- 1.6	5.4	1775	- 0.9	6.7	156
5 月	1954	1.2	7.0	1768	- 0.4	5.2	186
6 月	1938	- 0.8	- 5.3	1762	- 0.4	- 4.2	177
7 月	1937	- 0.1	6.0	1766	0.2	2.6	171
8 月	1943	0.3	- 2.7	1746	- 1.1	- 4.2	197
9 月	1956	0.6	5.2	1772	1.5	2.1	183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8 年		- 2780	- 2568	- 211
	9 月	- 1037	- 1020	- 16
	10 月	27	139	- 112
	11 月	- 399	- 740	340
	12 月	- 1578	- 2438	860
2019 年	1 月	604	676	- 72
	2 月	- 11	199	- 210
	3 月	- 237	31	- 268
	4 月	490	214	276
	5 月	161	90	71
	6 月	- 531	- 777	246
	7 月	14	- 167	182
	8 月	- 249	- 202	- 46
	9 月	154	140	14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7 年		1.9	1.1	0.3
	4 季度	0.3	0.5	0.1
2018 年		0.8	0.4	0.8
	1 季度	- 0.1	- 0.1	0.3
	2 季度	0.5	0.3	0.0
	3 季度	- 0.5	- 0.1	0.2
2019 年	4 季度	0.4	0.3	0.7
	1 季度	0.5	0.0	0.0
	2 季度	0.4	0.6	1.2
	3 季度	0.1	0.4	0.5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3.0	6.8	3.4
	4 季度	0.2	1.9	2.6
2018 年		1.1	3.4	3.4
	1 季度	- 0.1	0.9	0.6
	2 季度	1.8	0.7	0.8
	3 季度	- 2.6	- 1.8	- 1.2
2019 年	4 季度	2.1	1.1	3.8
	1 季度	0.2	- 2.0	- 4.1
	2 季度	1.0	0.5	2.1
	3 季度	0.9	- 0.7	0.2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7 年		1.9	1.1	0.3
	4 季度	2.4	1.2	0.5
2018 年		0.8	0.4	0.8
	1 季度	1.3	0.2	0.5
	2 季度	1.5	0.1	0.7
	3 季度	0.1	0.6	0.7
2019 年	4 季度	0.3	0.5	1.3
	1 季度	0.9	0.5	0.9
	2 季度	0.9	0.8	2.1
	3 季度	1.3	1.3	2.5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3.0	6.8	3.4
	4 季度	3.0	6.7	5.1
2018 年		1.1	3.4	3.4
	1 季度	1.9	5.2	3.6
	2 季度	2.4	5.9	3.0
	3 季度	- 0.9	1.6	2.8
2019 年	4 季度	0.9	1.1	4.1
	1 季度	1.3	- 2.1	- 1.2
	2 季度	0.8	- 2.2	0.3
	3 季度	4.1	- 1.2	2.0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8 年		0.7	1.61	2.4
	9 月	- 0.7	1.63	2.4
	10 月	3.9	1.62	2.4
	11 月	- 0.7	1.63	2.5
	12 月	- 0.6	1.63	2.4
2019 年	1 月	2.0	1.63	2.5
	2 月	- 2.0	1.63	2.3
	3 月	- 3.2	1.63	2.5
	4 月	- 0.5	1.63	2.4
	5 月	0.6	1.62	2.4
	6 月	- 1.4	1.61	2.3
	7 月	0.6	1.59	2.2
	8 月	- 3.8	1.59	2.2
	9 月		1.57	2.4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2018 年	814788		4.1	827033		9.7	-12245
10 月	70200	3.8	8.2	74141	6.8	20.0	-3941
11 月	67726	-3.5	0.1	71621	-3.4	12.5	-3895
12 月	66823	-1.3	-3.9	68869	-3.8	1.9	-2046
2019 年							
1 月	62376	-6.7	-8.4	65417	-5.0	-0.8	-3041
2 月	66385	6.4	-1.2	66254	1.3	-6.5	131
3 月	65614	-1.2	-2.4	67622	2.1	1.2	-2008
4 月	65681	0.1	-2.4	67191	-0.6	6.5	-1510
5 月	62407	-5.0	-7.8	67614	0.6	-1.4	-5206
6 月	65531	5.0	-6.6	65719	-2.8	-5.2	-187
7 月	65278	-0.4	-1.5	66482	1.2	-1.1	-1204
8 月	63483	-2.7	-8.2	64474	-3.0	-11.9	-991
9 月	64393	1.4	-5.2	65036	0.9	-1.5	-643
10 月	63287	-1.7	-9.2	63635	-2.2	-14.8	-347

注: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8 年		28590	175788	-147198
	9 月	5807	17588	-11781
	10 月	428	8197	-7769
	11 月	4223	27158	-22935
	12 月	1277	11285	-10008
2019 年				
	1 月	1078	71933	-70855
	2 月	2506	12932	-10426
	3 月	12726	27056	-14330
	4 月	3811	21532	-17721
	5 月	3840	19795	-15955
	6 月	111	15801	-15690
	7 月	2354	14715	-12361
	8 月	3385	23599	-20214
	9 月	1913	8156	-6243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7 年		3.0	1.9	1.4	1.1	7.2	1.6
	4 季度	2.9	1.6	1.4	2.2	7.7	0.9
2018 年		1.9	1.4	0.8	1.1	6.8	2.3
	1 季度	2.2	1.1	0.7	1.2	8.1	1.9
	2 季度	1.8	1.3	0.1	0.9	8.0	2.2
	3 季度	2.0	1.6	1.3	1.3	7.0	2.2
	4 季度	1.6	1.5	1.1	1.1	6.6	2.7
2019 年							
	1 季度	1.4	2.1	0.0	0.5	5.8	0.5
	2 季度	1.6	1.3	0.9	1.0	5.0	0.9
	3 季度		1.0				1.7

注: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7 年		3.1	2.0	3.8	3.1	5.9	5.1
	4 季度	2.8	1.5	3.5	3.5	5.7	5.2
2018 年		2.7	2.1	3.0	2.6	4.7	5.2
	1 季度	2.8	1.6	4.6	3.2	5.3	5.1
	2 季度	2.9	3.0	3.6	3.3	4.5	5.3
	3 季度	2.1	2.5	2.8	2.4	4.4	5.2
	4 季度	2.9	1.4	1.2	1.8	4.7	5.2
2019 年							
	1 季度	1.7	1.2	0.6	1.8	4.5	5.1
	2 季度	2.0	-0.9	0.4	2.4	4.9	5.1
	3 季度	2.0	-0.3	-2.9	2.9	4.4	5.0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8 年		5.8	4.1	27.1	12.3	4.1	4.8
	10 月	5.8	4.1		11.7		4.7
	11 月	5.6	4.0		11.6		4.8
	12 月	5.6	4.0	27.1	11.6	3.5	4.8
2019 年							
	1 月	5.8	3.9		12.0		4.9
	2 月	5.8	3.9		12.4		4.9
	3 月	5.8	3.8	27.6	12.7	3.5	4.7
	4 月	5.7	3.8		12.5		4.7
	5 月	5.4	3.8		12.3		4.5
	6 月	5.5	3.9	29.0	12.0		4.4
	7 月	5.7	3.8		11.8		4.5
	8 月	5.7	3.9		11.8		4.3
	9 月	5.5	3.8	29.1	11.8		4.5
	10 月	5.5					4.6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 尼西亚
2018 年		3.9	3.3	2.8	3.7	3.3	5.2
	10 月	3.9	3.2	2.8	3.7	3.3	
	11 月	3.8	3.3	2.8	3.7	3.3	
	12 月	3.8	3.4	2.8	3.7	3.3	5.3
2019 年							
	1 月	4.4	3.6	2.8	3.7	3.3	
	2 月	3.7	3.3	2.8	3.7	3.3	
	3 月	3.8	3.2	2.8	3.7	3.4	5.0
	4 月	4.1	3.5	2.8	3.7	3.4	
	5 月	4.0	3.5	2.8	3.8	3.3	
	6 月	4.0	3.6	2.8	3.7	3.3	
	7 月	4.0	3.7	2.9	3.7	3.3	
	8 月	3.1	3.7	2.9	3.7	3.3	
	9 月	3.4	3.8	2.9	3.7	3.3	5.3
	10 月	3.5	3.6	3.1	3.7		

注:(1)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8 年	4504	4705	-201	4866	6737	-1871
9 月	373.3	384.9	-11.6	421.1	541.8	-120.7
10 月	397.3	406.2	-8.9	432.5	606.2	-173.7
11 月	372.7	382.7	-10.1	395.3	599.1	-203.8
12 月	348.5	356.1	-7.6	334.1	507.2	-173.1
2019 年						
1 月	342.9	369.0	-26.1	371.5	596.0	-224.5
2 月	324.4	358.4	-34.0	380.9	565.3	-184.4
3 月	393.2	414.2	-21.0	447.2	638.1	-190.9
4 月	372.0	397.4	-25.3	389.1	523.7	-134.6
5 月	414.3	413.8	0.5	403.7	522.8	-119.0
6 月	384.1	390.3	-6.3	379.4	506.7	-127.4
7 月	373.2	389.7	-16.5	373.4	596.2	-222.8
8 月	370.2	399.6	-29.4	336.2	575.5	-239.3
9 月	370.9	381.5	-10.6	382.5	617.1	-234.7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8 年	940	933	6	2393	1886	507
10 月	84.2	88.2	-4.0	219.0	167.5	51.5
11 月	84.1	81.8	2.3	209.4	174.8	34.6
12 月	71.6	60.0	11.6	193.5	134.8	58.7
2019 年						
1 月	64.0	73.6	-9.5	180.9	169.8	11.0
2 月	70.9	68.1	2.8	158.9	131.6	27.4
3 月	76.1	72.6	3.5	177.0	136.7	40.4
4 月	73.2	75.7	-2.5	194.4	141.8	52.6
5 月	79.0	77.9	1.1	206.5	155.7	50.8
6 月	74.0	71.1	2.9	180.6	135.3	45.3
7 月	80.3	82.5	-2.2	198.7	183.9	14.9
8 月	80.3	76.0	4.4	186.9	162.4	24.5
9 月	74.4	70.9	4.4	189.2	170.8	18.4
10 月				182.3	176.3	6.0

表 33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8 年	3248	5145	-1897	4431	2487	1944
10 月	269.8	441.1	-171.3	413.0	214.9	198.1
11 月	265.0	431.7	-166.7	402.5	212.7	189.8
12 月	279.3	410.1	-130.8	408.4	224.1	184.3
2019 年						
1 月	263.6	410.9	-147.3	308.1	164.3	143.8
2 月	266.7	362.6	-95.9	347.0	182.5	164.5
3 月	325.5	434.4	-108.9	369.9	209.7	160.2
4 月	260.7	414.0	-153.3	366.9	221.3	145.6
5 月	299.9	453.5	-153.6	322.1	199.5	122.6
6 月	250.1	402.9	-152.8	327.6	200.4	127.2
7 月	263.3	397.6	-134.3	330.4	222.5	107.9
8 月	261.3	395.8	-134.5	338.4	218.3	120.1
9 月	260.3	368.9	-108.6	350.4	208.9	141.5
10 月	263.8	373.9	-110.1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8 年	6052	5350	697	4507	4766	-259
10 月	548.6	484.8	63.8	413.6	442.9	-29.3
11 月	514.8	468.1	46.7	386.1	409.3	-23.2
12 月	482.1	440.3	41.8	375.5	356.9	18.6
2019 年						
1 月	461.8	451.1	10.7	326.2	372.6	-46.4
2 月	394.8	366.2	28.6	364.1	350.7	13.4
3 月	470.1	419.9	50.2	390.2	375.3	14.9
4 月	488.1	449.9	38.2	394.5	380.8	13.7
5 月	457.1	436.7	20.5	418.3	408.0	10.3
6 月	440.4	401.1	39.2	379.5	353.9	25.6
7 月	460.8	437.4	23.5	393.0	404.2	-11.2
8 月	440.8	424.7	16.1	404.3	396.6	7.8
9 月	447.2	387.4	59.8	372.2	373.4	-1.2
10 月	467.8	413.9	53.9			

表 3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8 年	5685	6266	-582	3359	2863	496
10 月	511.1	558.8	-47.7	294.2	261.0	33.2
11 月	498.5	542.2	-43.8	276.8	229.8	47.0
12 月	455.5	508.5	-52.9	283.7	237.0	46.7
2019 年						
1 月	474.9	472.3	2.6	271.2	262.5	8.7
2 月	314.2	360.5	-46.3	203.2	152.8	50.4
3 月	467.3	526.5	-59.2	284.8	254.4	30.4
4 月	440.6	474.3	-33.8	255.7	229.1	26.6
5 月	455.5	499.7	-44.2	275.6	230.9	44.7
6 月	408.6	473.3	-64.7	282.2	243.4	38.8
7 月	443.6	487.3	-43.7	281.2	244.6	36.5
8 月	462.4	494.9	-32.5	288.1	228.2	59.9
9 月	461.5	491.8	-30.3	281.0	249.7	31.3
10 月				289.9	250.4	39.5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8 年	2475	2176	299	1802	1887	-85
10 月	231.8	192.6	39.2	158.9	176.7	-17.7
11 月	202.9	184.1	18.8	148.5	169.0	-20.5
12 月	199.8	174.7	25.0	142.9	153.7	-10.8
2019 年						
1 月	207.5	179.5	28.0	139.3	149.9	-10.6
2 月	163.4	136.3	27.1	125.6	122.3	3.3
3 月	206.2	171.0	35.3	141.2	134.5	6.7
4 月	207.1	180.8	26.3	131.1	154.0	-22.9
5 月	204.6	182.5	22.1	148.3	146.1	2.2
6 月	183.0	157.8	25.3	117.9	115.0	3.0
7 月	213.4	178.7	34.6	154.5	155.2	-0.7
8 月	194.3	168.2	26.1	142.8	142.0	0.9
9 月	185.7	165.7	26.1	141.0	142.6	-1.6
10 月				149.3	147.7	1.6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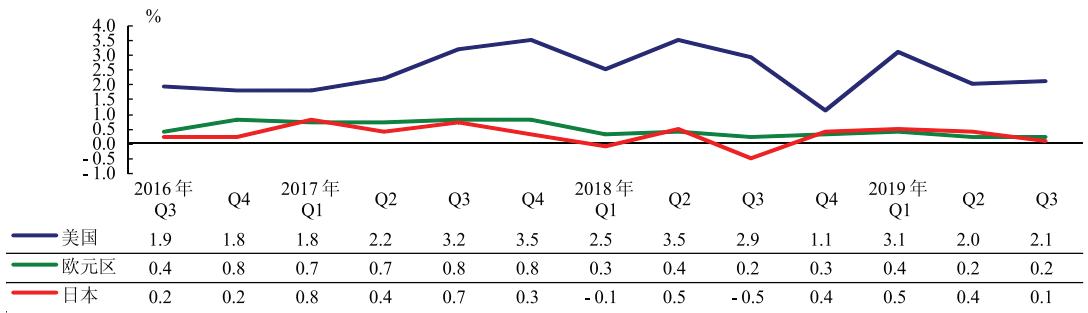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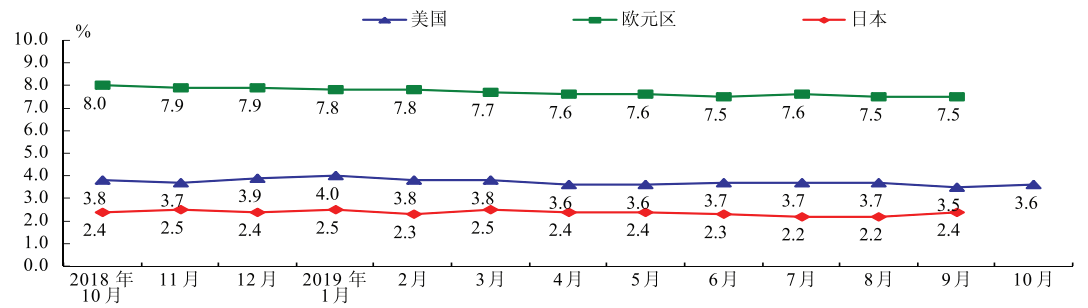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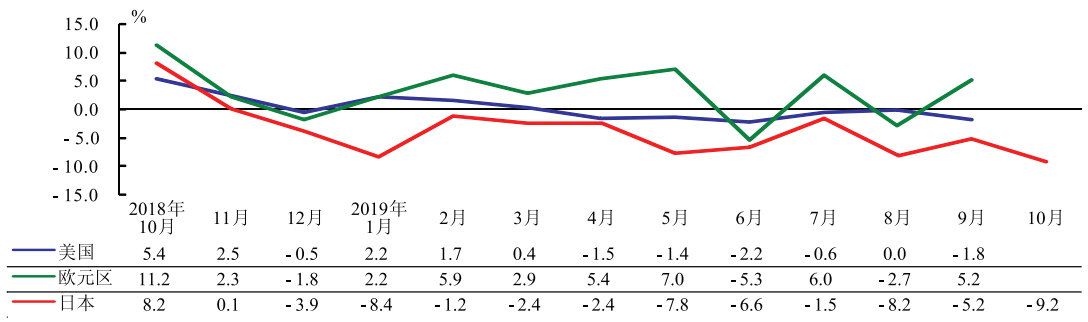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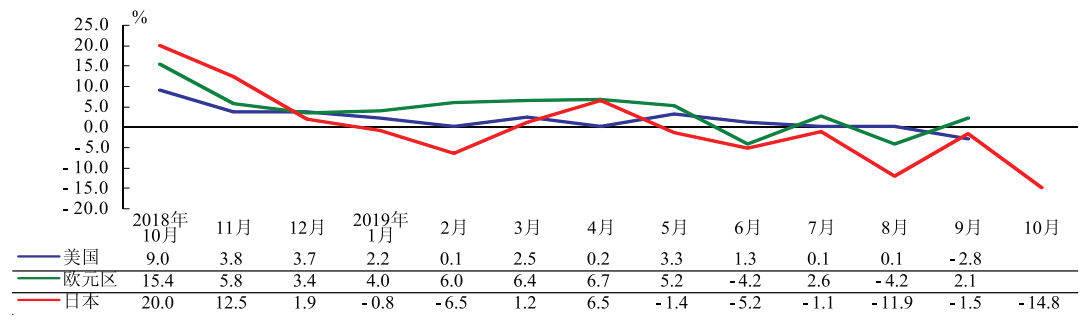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ABSTRACTS

(1)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Oppose Decoupling,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nd Jointly Advance Economic and Trade Negotiations

Zeng Peiyan

At present, despite the phenomenon of anti-globalization occurred, the uncertainty and risks of the world economy have increased dramatically. Some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n advocate “Decoupling” from China. Howev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still an unstoppable development trend. “Decoupling” is essentially an extreme manifestation of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unilateralism. If allowed to proceed unchecked, it will be a disaster for China,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From a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 “Decoupling” harms others without benefiting it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e, “Decoupling” will artificially cause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o brea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Decoupling” does not meet the tre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governance, “decoupling” is detrimental to the supply of global public goods. Opposing “Decoupling” and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are not only the “Hobson’s choice” in the interest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the common expectation of the entire world.

(2) Digitalization and Blockchain Reshape the Global Financial Ecosystem

Huang Qifan

Today is a digital age, wi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ris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ransform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original instrumental role into the backbone of driving financial change. The digital “five-genes” and the financial industry continue to collide and merge, not only changed the clearing methods, settlement methods and the sovereign currency issuance mechanism among individuals, enterprises, and countries, but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operation, and brought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human progress.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new financial formats such as quantitative investment and intelligent investment adviso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icing and claims settlement, financial cloud services, and blockchain certificate keeping are evolving, and will lead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nto a new era.

(3) “The Belt and Road” Will Bring a Better Tomorrow for Mankind

Chen Wenling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spans different regions,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and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nd has become an open and inclu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platform, carrier and channel. So far, 136 countries and 3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have signed 195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United Nations, the Group of Twenty, APEC and other regional organizations will jointly buil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core. The concept is written in relevant results and documents. “The Belt and Road” has transformed from idea to action, from vision to reality, and from initiative to global public goods. The progress has exceeded almost everyone’s expectations. Building a world with lasting peace, common prosperity, shared development, universal security, openness, tolerance, cleanliness and beauty is not only a vision of the world brought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ut also a dream that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The world economic structure will continue to adjust and evolve, countries have reached an era of resonance with the global frequency, knowing this era which full of contradictions and hopes, stand on the high ground of human morality, we will unswerving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so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ll be more released, and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ll be shared by different countries, different classes and different people, and jointly promote to establish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ered on win-win cooperation and welcome a better tomorrow for mankind.

(4)European Economic Situation Analysi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Dong Yan, Huang Meng

From 2017 to the first half of 2018, the European economy achieved its fastest growth rate in a decade. However, after mid-2018, the two major factors of insufficient endogenous power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have caused the European economic growth rate to fall sharply. In 2019, the weakness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slowing trade, the slow progress of structural reforms, the unknown prospects of the European Financial Union, and the ob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Euro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and Europe should continue to expand areas of cooperation, work together to oppose protectionism, seek common ground of interests,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5)Drawing on the Operating Model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the Belt and Road” Urban Cooperation

Qiu Aijun, Wang Jin

In today’s globalized world,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adopt an international operating model, and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As an organization engaged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their models and experiences have positiv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Belt and Road” urb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several representat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ere selected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ly in-depth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ir project operating models; and providing suggestions on how to use the operating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cities.

(6)China’s Software Export Status and Trend Outlook

Du Zhenhua, Mi Shiyue

The size of software export capabilitie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reflects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software industry. After a trough in 2016, China's software export growth rate has begun to change from double-digit growth to single-digit growth, and has begun a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cloud transformation improvement project from quantitative expansion to quality improvement. Therefore, it must solve cloud outsourcing, establish standardized software and service systems, software-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ystems, and software engineers fac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ovide more software export and offshore service outsourcing for the futur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such as smart manufacturing,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cloud services, etc.

(7) Improving Asia-Pacific SMEs' Polici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Value Chains——A Comparison with EU

Liu Junsheng

Many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in Europe and Asia-Pacific region play a key role in economic growth, employment generation and exports increase. However, they are more vulnerable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refore, APEC and ASEAN, each of them has developed a system of policies on SMEs. SMEs witness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while they encounter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t is impending to improve Asia-Pacific SMEs' policies. As a stereotype, EU has developed sound SMEs' policies. Compared with EU, SMEs' polic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re much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guidelines, policy contents, evaluation mechanisms and the supporting environment. It is important and beneficial for improving SMEs' polic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rough suc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8) Innovative Exploration of Strengthening and Enhancing State Capital in the New Era——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Li Jinbo, Li Dan

The report of the Nine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s forward "strengthening the state-owned capital." Shanghai has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 in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state-owned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It has clarifi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rporate functions, changed functions and strengthened supervision, adjusted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state-owned assets, established a state-owned asset mobility platform, vigorously promoted mixed reforms and securitization, and improved incentives and restraint mechanisms. The measures have transformed state-owned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to the backbone of Shanghai'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enhanced Shanghai's urban competitiveness. In order to further deepen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nationwide, it can conduct and promote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Shanghai,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combine classification reform and classification governance, and strive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substantial capital allocation and focus on people's enthusiasm and innovation, and develop the traditional capital to become stronger and better for the new era and continue to explore new paths.

Editor: Zhao Ze